



北京大学

本科生毕业论文

英国工党与冷战的形成（1945-1949）
——左翼政党为何推行右翼对外政策？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old
War (1945-1949)——Why Did the Left-Wing Party
Pursue Right-Wing Foreign Policy?

姓 名：代娜

学 号：2100015123

院 系：国际关系学院

专 业：国际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学方向）

指导教师：梅然 副教授

二〇二五年 五 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毕业论文导师评阅表

论文题目 (中文)	英国工党与冷战的形成 (1945-1949) ——左翼政党为何推行右翼对外政策?				
论文题目 (英文)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old War (1945-1949) — Why Did the Left-Wing Party Pursue Right-Wing Foreign Policy?				
导师姓名	梅然	职 称	副教授	论 文 成 绩 (百分制)	95
导师评语 (包含对论文的性质、难度、分量、综合训练等是否符合培养目标的等评价)	冷战的形成是战后初期历史上的最重大事件，英国对此包括对于作为冷战形成一大标志的北约建立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但是，当时英国的执政党是首次独立执政的工党，而该党作为体现“工人阶级利益”的左翼政党，先前有着明显的社会主义、和平主义色彩以及一定的亲苏倾向。具有如此特征的一个左翼政党为何积极推行组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苏军事同盟的政策？本文的这个围绕冷战形成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且带有悖论色彩的选题具有不言而喻的学术价值和学术趣味。而且，明确针对该问题的研究迄今也是比较缺乏的，这也意味着，本文就问题和结论而言，都必然具有值得肯定的新意。 代娜同学也表现出了非常认真和投入的写作态度，查阅和利用了不错一手资料，包括英国外交档案、议会辩论记录、工党的政党会议文件以及工党领导人的个人文件。这进一步凸显了本文的原创性和价值，对本科同学而言也甚值赞许。 本文章节安排合理，逻辑和文字清晰，基本观点合理有序且如前述具有值得肯定的新意（比如对于工党的意识形态转换及其内部权力结构以及外交大臣贝文的分析，工党的意识形态背景及其演变本也是一个较复杂和有难度的话题），格式符合基本规范。当然，对于这样一个较宏大的问题，本文在不少具体问题上不乏深化的空间。本文完全符合预期目标，且应属质量上乘的本科生毕业论文。 导师签名: 				

摘要

冷战的爆发是二战结束后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而北约的成立成为冷战最终形成的标志之一。在这一过程中，英国作为西方仅次于美国的大国，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45年，英国工党首次在战后单独执政，然而，作为一个左翼社会主义政党，工党在其执政初期的对外政策却呈现出明显的悖论，尤其是在传统上支持和平主义和亲苏立场的背景下。本文聚焦战后初期工党对外政策的转向，探讨了工党如何在首次执政期间，由支持苏联的“左翼”立场转向积极推动反苏政策，并推动北约的建立，从而加速了冷战的形成。

本文通过对工党政府在1945至1949年间对外政策演变的梳理，分析了艾德礼政府与战前工党在对苏政策上的差异，揭示了战后工党对外政策的转向。结合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分析法，本文从个体、国家与国际体系三个层面，探讨了工党对外政策转向的多维动因。研究认为，工党在冷战初期的对外政策转向，既受到国际体系变化和国家安全需求的压力，也离不开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的推动。同时，战后工党内部“内阁集权-议会党团主导”的政党结构安排又进一步为贝文扫清了障碍。但更深层次上，这一转向与工党自身政治身份的重塑密切相关。工党通过展现国家责任感并重塑自身形象，成功实现了从“工人阶级政党”向“全民政党”的转型。这一过程不仅改变了工党的对外政策取向，也塑造了英国在冷战初期的战略定位。

关键词：英国工党；英苏关系；冷战；北约

Abstract

The outbreak of the Cold War marked a significant turning poin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fter World War II,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O became one of the key milestones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Cold War. In this process, the United Kingdom, as the second-largest Western power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driving this development. In 1945,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for the first time, governed independently in the post-war period. However, as the left-wing socialist party, its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its governance presented a clear paradox, especially considering its traditional stance of pacifism and pro-Soviet inclination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hift in the Labour Party's foreign policy in the early post-war years, exploring how the party, during its first period in office, transitioned from the pro-Soviet "left-wing" position to actively promoting the anti-Soviet stance and advocating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O, thereby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Cold Wa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the Labour government's foreign policy between 1945 and 1949, contrasting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Attlee government with the pre-war Labour Party's stance towards the Soviet Union, thereby revealing the shift in post-war foreign policy. Using the three-level analysis framework fro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theory, the paper examines the multi-dimensional motivations behind the Labour Party's foreign policy shif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individual, the state,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Labour Party's foreign policy shift in the early Cold War was influenced not only by the pressures of changing international dynamics and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but also by the efforts and influence of Foreign Secretary Ernest Bevin. At the same time, the post-war Labour Party's "cabinet centralization-parliamentary party group dominance" party structure further cleared the way for Bevin. At a deeper level, this shift was closely tied to the Labour Party's internal political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By rebranding itself and demonstrating a sense of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the Labour Party successfully transitioned from a "working-class party" to a "national party".

This process not only changed the party's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 but also shaped the UK's strategic positioning in the early Cold War period.

Keywords: British Labour Party; Anglo-Soviet relations; Cold War; NATO

仅供学习和交流

目录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问题及其意义	1
第二节 文献综述	1
一、冷战起源的既有解释	1
二、英国工党在冷战形成中的角色研究	3
第三节 研究资料：原始档案与其他文献	9
第四节 研究方法视角	10
第五节 章节安排、主要观点及创新	11
第一章 英国工党的左翼背景	14
第一节 工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14
一、工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	15
二、工党的社会主义实践	18
第二节 工党外交事务中的和平主义倾向	22
第三节 工党与苏联的关系	29
第二章 英国工党在冷战形成过程中的对外政策	36
第一节 北约建立前工党的对外政策	36
一、战后初期工党内部的亲苏氛围	36
二、工党领导层的现实主义转向	38
第二节 北约建立时期工党的对外政策	43
一、英美同盟的逐步建立	43
二、北约的建立	46
第三章 英国工党右翼对外政策的原因	49
第一节 工党自我定位的变化	49
一、工党的“边缘性”起点与合法性焦虑	49
二、从“工人阶级代言人”到“全民政党”	51

第二节 贝文的外交理念与政策推动	53
一、“左翼身份”与“右翼外交”	53
二、贝文在冷战形成中的关键作用	55
第三节 工党政党结构与党内博弈	57
一、内阁集权与议会党团主导的工党政党结构	57
二、战后工党内部的博弈与妥协	59
第四节 战后英国的经济衰退与苏联的扩张	61
一、英国相对实力的衰退	61
二、苏联的战后扩张	63
结论	66
参考文献	68
致谢	75

绪论

第一节 研究问题及其意义

冷战的出现是二战后国际秩序重构过程中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地缘政治事件。作为对抗性阵营形成的标志性成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建立不仅将欧洲划分为东西方两大阵营，更标志着全球权力格局从多极向两极的根本性转变。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英国作为战后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力量，通过其对外政策深刻影响了冷战的制度化进程。从 1947 年推动杜鲁门主义出台，到 1949 年主导北约的创建，英国工党政府的战略选择成为冷战早期西方阵营行动的关键推手。然而，这一角色的特殊性在于：主导英国对外政策的执政党并非传统意义上以反共意识形态为立场的保守党，而是 1945 年首次以绝对多数上台的工党——一个以社会主义为纲领、历史上长期对苏联持友好态度且外交理念中蕴含着和平主义传统的左翼政党。

这就提出了一个具有悖论色彩的问题：为何英国工党，一个具有左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且历史上曾被认为具有亲苏倾向的政党，在其首次单独执政期间，却推行了反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而加速东西方对立与冷战形成的对外政策？换言之，工党作为一个左翼社会主义政党，为何在 1945–1949 年间主动推行了实质上偏向右翼的强硬对外政策？本文将聚焦于二战结束至冷战格局最终形成的重要阶段，尤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成立之前的这一关键时期，追踪英国工党政府对外政策转向的具体过程，考察英国如何一步步由战时盟友转向将苏联视为主要威胁，并最终积极参与冷战阵营的形成。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深入探讨这一对外政策转向背后的深层动因，力图为理解工党在战后初期所做出的一系列关键性决策提供新的解释视角。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冷战起源的既有解释

关于冷战起源的学术讨论大致可以分为四种主要立场：传统派、修正派、后修正派（或称调和派）与国际派。传统派观点盛行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主张苏联尤其是斯大林对冷战的爆发负有主要责任，认为苏联在战后推行进攻性和扩张性的对外政策，例如在东欧的军事存

在、拒绝履行雅尔塔协定中关于波兰自由选举的承诺、在伊朗问题上拒绝撤军以及在捷克政变和柏林封锁中的作为，逐步暴露其扩张主义本质，从而迫使美国采取防御性的应对措施以维护自由世界的安全。与之相对，20世纪60至70年代盛行的修正派则强调美国的扩张主义政策是冷战爆发的根本原因，指出苏联在战后国力严重受损，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相当的克制，而美国则借助其军事和经济优势，试图构建一个以自身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其对外政策实质上服务于国内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后修正派或调和派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以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为代表，主张应从国际体系结构的视角理解冷战，将责任归咎于某一方是片面的。该派认为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冲突的不可避免性，美苏双方在安全困境中彼此误解和防备，导致冷战呈螺旋式升级。此外，部分学者还借助现实主义理论、决策过程模型及制度主义等方法，分析冷战中美苏战略误判、国内政治约束、官僚体制惯性及领导人认知偏差等因素，强调冷战起源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冷战研究自1990年代苏东剧变后进入新的阶段，更多前华约国家学者的参与以及档案资料的有限解密，推动了所谓“国际派”或“新冷战史”视角的形成，使得冷战起源的研究呈现出更为开放、多元与国际化的特征。^①

在中国学术界，关于冷战起源的研究自20世纪末以来不断深化，逐步形成了较为多元的解释路径，呈现出理论视角的多样性与分析重心的复杂性。总体来看，国内学者关于冷战起源的探讨主要可以归纳为四类代表性观点。第一，单边责任论强调美国主导了冷战的开启，其全球扩张战略与制度输出倾向引发紧张局势，苏联则多为被动回应；第二，互动结构论认为冷战源于美苏在东欧、德国、伊朗等地区的持续摩擦与战略误判，是双边安全焦虑与制度对立的累积结果；第三，英国主导论强调英国在冷战初期发挥了政策引导与认知建构作用，是“联美制苏”战略的关键推手；第四，多因结构论主张冷战起源于意识形态分歧、国家安全焦虑、战后权力结构重构、原子武器的出现、国际机制失效以及地缘战略误判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系统性互动，并受到现实主义外交理念的进一步强化。^②

进入21世纪之后，国内学界对冷战起源的分析在保持原有结构性关注的基础上，也有新的解释路径被提出。比如梁振丽和周海芳从文化心理入手，认为美苏双方均有深植于历史、宗教与政治传统中的“大国使命感”。美国出于“上帝选民”观念，试图以自由民主价值观重塑世界秩序；而苏联则承载着俄国东正教文明传统与帝国责任意识，强调其领导世界的历

^① 以上国外学术界关于“冷战起源”研究成果的总结参考：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172页；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邓峰：《冷战起源研究的国际渊流与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2期，第89-91页；Arthur Schlesinger Jr.,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Foreign Affairs*, Vol.46, No.1, 1967, pp.22-52.

^② 以上国内学术界关于“冷战起源”研究成果的总结参考：白建才、田华：《二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冷战史的研究》，《世界历史》，1999年第2期，第82-84页。

史使命。这种文化认同与价值体系的根本对立，为双方冲突提供了深层心理支撑。^①沈志华则将经济因素视为冷战的重要诱因，他指出战后苏联在重建贷款谈判中屡遭美国拒绝，暴露了美苏间在经济制度与利益认知上的深刻分歧。战时租借援助在战后迅速中断、马歇尔计划的推出，更使苏联警觉美国可能借经济援助之名谋求政治控制，从而加速其在东欧推行全面卫星化战略。^②这一分析突破了意识形态解释的单一性，揭示了冷战根源中的经济博弈逻辑。则是强调了多个经济因素在美苏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总体上，中国学术界关于冷战起源的研究逐渐从“单因果-责任归属型”分析，发展为“多因素-结构互动型”研究模式，体现出理论深度的提升与国际学术语境的接轨。

综上所述，冷战起源的研究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谱系，从最初的责任归因转向结构性与多因解释，既关注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等宏观变量，也不断引入文化心理与经济制度等中观与微观视角。这些研究为理解冷战的系统性成因提供了丰富范式，但多数聚焦于美苏两极关系或美国的对外战略，较少深入探讨英国，尤其是工党政府在冷战初期的独立作用。事实上，作为战后欧洲秩序的积极塑造者和“联美制苏”战略的重要推动者，英国工党政府在冷战格局的形成中发挥了超出传统二元视角的关键作用。因此，本文将在继承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分析英国政府如何在冷战初期推动冷战格局的形成，特别关注英国工党在这一过程中所展现的能动性，从而丰富现有研究中关于英国角色的视角。

二、英国工党在冷战形成中的角色研究

（一）国外学术界研究成果

在冷战初期，英国工党政府在冷战格局的形成和北约的建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但相对被忽视的角色。随着艾德礼政府时期官方文件的逐步解密，学者们开始突破传统的聚焦于美苏两国作用的分析框架，重新审视英国工党政府在冷战形成过程中的独特作用。特别是通过分析英国在中东的政策、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以及推动北大西洋公约签订的过程，研究逐渐揭示了工党在这一关键历史时期所发挥的作用和其所扮演的关键角色。目前，现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大致分为三个主要议题：一是对艾德礼政府战后对外政策的研究；二是对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在冷战形成中的作用的研究；三是对战后英美关系转变的研究，及其如何促使工党政府选择支持冷战的立场。

^① 梁振丽、周海芳：《美苏文化差异对冷战起源的影响》，《知识经济》，2010年第13期，第92页。

^② 沈志华：《美国对苏贷款问题历史考察（1943-1946）——关于美苏经济冷战起源的研究（之一）》，《俄罗斯研究》，2019年第6期，第31-59页；沈志华：《“无条件援助”：租借与战时美苏经济关系——关于美苏冷战起源的经济因素（讨论之三）》，《清华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第1-59页；沈志华：《铁幕落下：马歇尔计划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关于美苏冷战起源的经济因素（讨论之七）》，《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4期，第3-47页。

1. 艾德礼政府战后对外政策

大多数学者倾向于系统性地研究工党整体的对外政策,而艾德礼政府时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随着研究的深入,关于该时期政策的分析成果逐渐丰富,尤其在冷战初期英国外交的战略选择、与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的关系以及帝国遗产的延续等方面,学界已有较为广泛的探讨。

迈克尔·R·戈登 (Michael. R. Gordon) 在《工党对外政策中的冲突与共识》 (*Conflict and Consensus in Labour's Foreign Policy*) 一书中围绕英国工党对外政策的发展逻辑展开深入剖析,从工党党内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建构的角度分析了艾德礼政府首次面临现实外交权力的全面考验。指出 1945 年的外交现实迫使政府放弃理想主义,转向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传统战略。这一变化虽务实,却与党员信念严重脱节,引发了党内对政府“背叛”的指责。尽管在 1947 年前后形成一定程度的新共识,但对社会主义外交理念的公开否定始终未能完成。1950 年代起,党内围绕对外政策的争论愈加激烈,原教旨主义与修正主义分庭抗礼,党陷入深度僵局。^①丽安依·维克斯 (Rhianon Vickers) 在《工党与世界 (第一卷)》 (*The Labour Party and the World*) 中指出,艾德礼政府的对外政策反映了英国在霸权衰落与冷战格局中的困境。面对二战后的经济危机和全球军事负担,政府内务实派与帝国惯性派存在矛盾:艾德礼主张削减海外开支优先重建经济,而贝文坚持维持“大国”地位,认为中东、东南亚是抵御苏联扩张的战略屏障。殖民地政策上,工党采取“加速退让”与“选择性镇压”策略,印度和缅甸独立虽然被视为非殖民化,但实为妥协;而马来亚的殖民镇压则通过反共名义延续,同时维持经济控制,体现新帝国主义特征。冷战战略上,贝文推动北约成立,参与马歇尔计划,将英国绑定于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秘密启动核计划以维系“大国象征”。党内左翼批评政府背离社会主义,但随着冷战意识形态极化,工党加强反共立场,清除亲苏势力。艾德礼的政策遗产塑造了英国“依附性自主”的基调,深陷帝国遗产与中等强国的矛盾,理想主义最终屈服于冷战现实。^②约翰·卡拉根 (John Callaghan) 在《工党与对外政策》 (*The Labour Party and Foreign Policy: A history*) 一书中也对艾德礼政府的对外政策政策进行了深入探讨。他指出,1945 年工党以压倒性优势上台后,艾德礼政府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英国经济因战争严重受损;另一方面,战后国际秩序重构使英国需要在美苏两极崛起的背景下维持其全球强国地位。尽管政府内部对帝国模式有保留意见,但决策层仍坚持将帝国-联邦体系和英镑区贸易集团视为权力核心。这种“帝国惯性”导致对外政策出现矛盾:在安全领域,英国无法独自重建欧洲均势,最终通过与合作将北约作为遏制苏联的工

^① Michael. R. Gordon, *Conflict and Consensus in Labour's Foreign Polic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285-289.

^② Rhianon Vickers, *The Labour Party and the World, volume 1 (The Evolution of Labour's Foreign Policy, 1900-51)*,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59-187.

具；在殖民地治理上，尽管民族主义运动高涨，工党仍将苏联视为首要威胁，采取有限改革和军事镇压以维护帝国利益。卡拉根认为，艾德礼政府的战略本质是通过依附美国，延缓帝国衰落，体现了战后英国“中等强国”身份认知与霸权遗产之间的矛盾。^①

2. 欧内斯特·贝文在冷战形成中的作用

关于贝文在冷战初期对英国对外政策走向的影响，学界普遍认为其个人在对苏幻想向现实对抗的重大转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1945年后英国外交的核心人物，贝文不仅推动了马歇尔计划和北约的建立，更深刻影响了英国对美关系的重塑与对苏政策的强硬。

彼得·韦勒（Peter Weiler）分析了英国由在美苏之间保持平衡，逐步转向与美国结盟的过程，强调这一转变与英国对美经济依赖加深及对苏警惕升级密切相关。他突出贝文作为外交大臣在推动马歇尔计划和北约建立中的核心作用，指出工党政府正是在贝文主导下，在战后经济困境和国际地位下滑的双重压力中，对全球战略进行了实质性调整，以应对日益紧张的冷战局势。^②罗伯特·弗雷泽（Robert Frazier）则聚焦贝文在1947年撤回对希腊援助事件中的角色。尽管传统观点认为撤援出于财政困境，弗朗西斯·威廉姆斯（Francis Williams）曾主张贝文故意制造真空以引美接手，但外交部档案显示，撤援更是财政部主导的长期政策调整结果，出于持续财政压力而非短期危机。虽然贝文并未预见该决定对美政策转向的深远影响，但他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反映出其在战后英美权力再分配中的战略考量。弗雷泽据此否定“英国开启冷战”之说，认为英国的行为虽非刻意推动，但从结果上看的确是在贝文主导下成为冷战格局加速形成的重要催化因素。^③阿维·沙莱姆（Avi Shlaim）重新审视了英国在冷战初期的角色，特别是在1948-1949年柏林封锁危机中的战略选择，挑战了将英国视为美国附庸的传统观点。他强调，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在此次危机中展现了显著的独立性与决策主导权。贝文率先提出通过空运维持柏林供应，并推动美国扩大运输规模，最终以日均8000吨的“空中奇迹”打破封锁。在柏林危机中，贝文的强硬立场甚至超过了美国，他坚决拒绝与苏联就德国问题谈判，坚持推进西德建国，并迫使美国坚定立场。这一“鹰派”姿态修正了传统对英国“温和调停者”的认知，凸显其作为冷战初期积极塑造者的角色。贝文的战略选择，不仅确保了柏林的空运成功，也促成了西德融入西方阵营，并加速了北约的成立。他认为，英国并非被动跟随美国，而是独立决策并承担风险，在冷战初期发挥了关键作用，深刻影响了西方阵营的整合与冷战地缘格局。^④

^① John Callaghan, *The Labour Party and Foreign Policy: A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2007, pp.191-223.

^② Peter Weiler, "British Labour and the Cold War: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Labour Governments, 1945-1951,"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26, No.1, 1987, pp.54-82.

^③ Robert Frazier, "Did Britain Start the Cold War? Bevin and the Truman Doctrine,"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27, No.3, 1984, pp.715-727.

^④ Avi Shlaim, "Britain, the Berlin Blockade and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0, No.1, Winter, 1983-1984, pp.1-14.

在关于欧内斯特·贝文 (Ernest Bevin) 在冷战形成中作用的研究中, 几部权威传记提供了更为深入的视角, 进一步揭示了他在战后英国对外政策转型中的关键角色。最具代表性的是艾伦·布洛克 (Alan Bullock) 在其三卷本传记《The Life and Times of Ernest Bevin》中, 详细描绘了贝文的政治生涯, 特别是他作为外交大臣期间的决策过程。布洛克认为, 贝文是 19 世纪英国外交传统的最后继承者之一, 他通过坚定的反共立场和与美国的紧密合作, 推动了英国在冷战初期的对外政策转型。他强调, 贝文在推动美国介入欧洲事务、建立北约以及应对苏联扩张方面, 展现了非凡的战略眼光和政治手腕。^①

雷蒙德·史密斯 (Raymond Smith) 和约翰·扎梅蒂卡 (John Zametica) 则是重新评估了 1945-1947 年克莱门特·艾德礼在英国对外政策中的角色, 挑战了他“冷战战士”的传统形象。指出艾德礼更倾向于国际主义, 主张通过联合国与多边合作维护和平, 反对过度依赖军事手段, 也对传统帝国战略持保留态度。在中东防务、苏伊士运河等问题上, 他曾多次质疑将苏联视为必然敌人的立场, 并与军方及外交大臣贝文产生明显分歧。然而, 正是在贝文的主导下, 英国最终确立了以反苏为核心的冷战外交方针。贝文坚定认为苏联构成现实威胁, 强调以实力维护英国安全地位, 并推动大规模扩军、北约构建及对美靠拢。在贝文强势的政策推动下, 加之国内安全焦虑与军方压力上升, 艾德礼虽对某些关键问题持不同意见, 最终仍接受了强硬路线。史密斯与扎梅蒂卡据此认为, 艾德礼虽非冷战政策的积极塑造者, 但贝文才是英国冷战战略的真正设计者与推动者, 前者更多处于应对与妥协的位置。因此, 对艾德礼的“冷战战士”标签需作出修正, 而贝文的独立决策作用则应获得更充分的关注与肯定。^②

3. 战后英美关系与冷战的形成

战后英美关系经历了深刻变化, 尽管英国在战后仍试图维持“大国”地位, 但其经济困境和殖民体系的动摇, 使其不得不在安全与利益之间作出选择, 最终日益依附于美国。这一转变不仅反映在外交战略的调整上, 也深刻影响了冷战格局的演变。学界普遍认为, 英美之间的不对等联盟关系在战后初期已现端倪。

特里·H·安德森 (Terry H. Anderson) 在《美国、英国与冷战 (1944-1947)》(The United States, Great Britain, and the Cold War: 1944-1947) 一书中指出美英在二战中因丘吉尔与罗斯福的私交而密切合作, 但战后对苏政策分歧日益明显。英国主张联合遏制苏联扩张, 而美国则一度希望通过调解避免对抗。1946 年, 伊朗危机与丘吉尔“铁幕演说”刺激美国舆论转

^① Alan Bullock, *The Life and Times of Ernest Bevin: Minister of Labour 1940-1945 (Volume 2)*,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67; Alan Bullock, *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 London: Rowland Phototypesetting Ltd, 1983.

^② Raymond Smith and John Zametica, "The Cold Warrior: Clement Attlee Reconsidere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1, No.2, 1985, pp.237-252.

向，使孤立主义逐渐退潮。1947年，英国因财政困境宣布无法继续支持希腊和土耳其，敦促美国接手，最终促成“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标志着美国正式承担全球领导责任。安德森强调，冷战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苏联在东欧和中东的扩张、英国推动美方介入、以及美国自身从战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战略转变。尽管英国在推动美方转向中扮演关键角色，但冷战格局最终由美国主导确立，英国则由霸主退居为“战略伙伴”。安德森由此揭示，“特殊关系”虽体现合作，但始终伴随权力重构与主导权的转移。^①扬·梅利森（Jan Melissen）和伯特·泽曼（Bert Zeeman）则是从英、美、西欧三者之间的关系角度来解读战后英国在冷战形成中的角色。他们指出，在1945-1951年这段时间英国工党政府在西欧政策方面的核心议题是是否错失了建立独立于美苏之外的“第三力量”的机会。外交大臣贝文推动了西欧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合作，试图在冷战初期寻求英国在欧洲的战略独立性。但是英国未能抓住欧洲一体化的关键机会，而是优先考虑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以及帝国利益的维系。这一决定对英国后来的对外政策以及与欧洲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②约翰·纽辛格（John Newsinger）则重新评估了英美关系中工党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指出艾德礼政府以“特殊关系”名义对美深度依附，实则延续了英国的帝国主义传统。工党政府在冷战逻辑驱动下优先推进军事化而非社会改革：秘密发展核武、允许美军在英设永久基地、推动北约成立，使英国沦为美国全球战略的“前哨”与“代理人”。这一外交选择不仅加剧财政危机、压缩福利空间，也促使英国积极参与朝鲜战争等美主导行动，掩盖从属地位。此外，工党对非殖民化承诺虚多于实，在东南亚与地中海地区通过武力镇压民族主义运动，与美国“反共优先”的战略深度协同。纽辛格强调，所谓“进步政府”实质上是冷战军事-帝国主义工程的执行者，其遗产至今深刻影响英国外交走向。^③

（二）国内学术界研究成果

在国内有关冷战起源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一种以美苏对抗为主轴的叙事结构，英国在其中的角色往往被视为次要或被动。然而，上世纪末期以来，学界逐渐开始关注英国在冷战早期的战略作用，尤其是战后英国工党政府在塑造美苏关系走向、推动西方联盟建构方面的积极作为。这一研究路径不仅突破了“美苏二元论”的框架，也丰富了对冷战起源复杂性与多边动力的理解。相关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强调英国作为冷战“设计者”或“推手”的战略主动性，另一类则聚焦于工党政府在现实主义逻辑驱动下的对外政策转型。

第一类研究突出英国在冷战爆发中扮演的“塑造者”角色，认为英国并非被动卷入美苏对

^① Terry H. Anderson, *The United States, Great Britain, and the Cold War: 1944-1947*, Columbia & Lond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81, pp.176-182.

^② Jan Melissen and Bert Zeeman, "Britain and Western Europe, 1945-51: Opportunities Lost?"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3, No.1, Winter, 1986-1987, pp.81-95.

^③ John Newsinger, "War, Empire and the Attlee government 1945-1951," *Race & Class*, Vol.60, No.1, 2018, pp.61-76.

抗的次要国家,而是在关键历史节点主动引导美国走向对苏对抗,从而推动冷战格局的确立。白建才在分析冷战的起源时,特别强调了英国在冷战爆发中扮演了“推手”角色。尽管二战削弱了其国力,但凭借历史形成的反苏立场与娴熟的外交策略,英国主动引导尚未定调的美国走向对抗。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将苏联扩张塑造成西方共同威胁,而希腊-土耳其危机的责任转嫁则迫使美国接过“自由世界领袖”旗帜,最终催生“杜鲁门主义”。英国的策略本质是“借力打力”——以退为进,利用美国霸权实现自身战略目标。这一过程表明,冷战不仅是美苏对抗的产物,更是英国传统均势外交与衰落后“代理人战略”的共同结果。^①黄亚红的研究更是将英国“联美抗苏”的战略起点前移至1944-1946年,通过对波兰问题、伊朗危机等事件的分析,揭示出英国早在二战结束前就已将苏联视为主要威胁,并试图通过波兰问题、伊朗危机等事件引导美国明确对苏立场,从而完成战略同盟的构建。外交大臣贝文通过“第三门罗”政策与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推动国内对苏强硬立场,促成冷战政策的形成。这都表明英国在冷战中的角色不仅是反应性的,更是主动塑造者,通过具体冲突将美国纳入西方共同战略,最终确保自身安全。^②滕淑娜则从大国身份的角度出发,指出战后英国在国力衰退的背景下,依然力图维系传统国际影响力。艾德礼政府在为英国争取更大利益方面显示了其灵活的外交技能,能够适时地抓住机遇,把美国与英国的“特殊关系”再次加强,促进了美国对外政策的转折,“冷战”启动之时英国借机谋取利益。^③

第二类研究则将分析重点放在战后工党政府的对外政策转型上,探讨其为何从原本的亲苏立场走向现实主义的亲苏政策。这类研究认为,工党政府的对外政策并非简单的意识形态背离,而是对苏联扩张与英国衰退现实的理性回应。刘建飞指出,尽管工党有长期亲苏传统,但在面对苏联在东欧和中东的扩张行为后,外交大臣贝文逐渐将苏联视为对欧洲安全的最大威胁,并推动英国与美国结盟以维持地区均势。这一反苏立场本质上是出于现实主义,目的是维护英国的国家利益和欧洲均势,而非追求美国式的全球对抗。这一转变尤其体现在对华政策上,工党支持新中国但反对扩大朝鲜战争,显示其与美国的战略分歧。^④叶江进一步指出,工党政府对苏政策的转变不仅源于外部威胁,根本原因在于战后衰落的英国经济和英国统治阶级长期以来政治上的反苏态度。在希腊危机爆发后,英国无力单独承担干预责任,只能依赖美国援助,从而推动了“杜鲁门主义”的出台。美国援助的依赖使英国在外交上逐渐丧失独立性,并最终在德国问题上倒向美国阵营。^⑤倪学德则从外交传统的延续性出发,认

^① 白建才:《论冷战的起源》,《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第35-42页。

^② 黄亚红:《试论英国冷战政策的形成(1944-1946)》,《世界历史》,1996年第3期,第34-41页。

^③ 滕淑娜:《试论二战后艾德礼工党政府的对美外交与“冷战”的起源》,《聊城大学学报》,2007年底4期,第42-47页。

^④ 刘建飞:《从战后初期英国工党的对苏政策看冷战的起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8年第1期,第2-9页。

^⑤ 叶江:《战后英国工党政府与冷战起源(1945-1948)》,《史林》,1991年第1期,第66-72页。

为工党政府虽为左翼政党，但在欧洲感知到的来自苏联的威胁之后，其外交上依旧延续了战前保守党政府的现实主义路径，最终形成了“联美抗苏”的英美特殊关系。^①

第三节 研究资料：原始档案与其他文献

本研究重视对第一手历史资料的系统挖掘与分析，力图在既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原始政府档案、政党会议记录与政治人物的个人文献，深入还原英国工党在冷战初期对外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决策逻辑与战略思维。为此，本文主要依托以下几类原始资料：

首先，“英国议会文件集” (U.K. Parliamentary Papers) 与“英国对外政策文件”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DBPO) 数据库构成本研究的核心档案来源。议会文件集提供了工党政府在 1945 至 1949 年期间外交、安全等重大议题上的议会辩论与政策讨论，反映出政府内部与议会之间在外交方向与对苏战略上的互动与争议。DBPO 数据库所收录的英国外交部机密文件、电报、备忘录及会议记录，则为本文揭示贝文及其主导下的外交决策过程提供了关键材料，尤其在分析伦敦外长会议、伊朗危机和希土危机等事件中具有高度史料价值。这些材料使本文得以精准还原英国政策制定者对苏联威胁的认知变化以及与美国战略协调的真实过程。

其次，工党年会的官方记录 (Report of the annual conference) 与历次竞选宣言 (Labour Party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s) 是本文分析工党意识形态的重要一手资料。本文系统梳理了 1906 年至 1945 年间工党的竞选宣言，结合工党年会辩论记录，力图还原其在长期反对党时期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理念与对外政策观。这些文本不仅展现了工党如何将“和平主义”“国际合作”与“阶级正义”嵌入其外交话语，也反映了其如何在时代变迁中调整自身的国家战略构想。通过对工党在战前、战时以及战后初期的纲领性叙述进行比对，本文揭示了其在社会主义信念与现实国家利益之间所展开的观念调适，为理解其战后对苏政策的认知基础与战略转向提供了思想史与制度史层面的支撑。

此外，本文重点参考了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 (Ernest Bevin) 的传记与相关回忆录，以深入剖析他在战后英国对外政策中的核心地位与实际主导作用。作为工党政府中最具影响力的外交决策者，贝文不仅延续了英国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传统，更是在关键历史节点上推动了从合作走向对抗的政策转型。他的对苏认知、对英美同盟的战略定位以及“第三力量”的构想，直接影响了英国在冷战格局中的位置。相关传记和档案资料不仅揭示了贝文个人的思想轨迹与政策判断，也展示了其如何在工党政府内部确立外交主导权，抵御党内左翼的亲苏主张，并在与美国互动中发挥超越“从属角色”的影响力。通过这些资料，本文能够从决

^① 倪学德：《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对外政策的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策者视角具体把握英国工党的对外政策形成的过程逻辑,进而凸显英国并非冷战被动参与者,而是在初期战略格局形成中扮演了“推手”的关键角色。

通过上述一手资料的系统运用与交叉分析,本文力求跳脱宏大叙事的笼统推断,以具体史料为依据,揭示英国工党政府对冷战格局形成所发挥的关键推动作用。

第四节 研究方法 with 视角

本文采用定性研究,以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同时,结合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内外互动视角与层次分析法,系统探讨英国工党战后初期对外政策转向的深层动因。

(一) 历史分析法

本文运用历史分析法,以细致解读原始史料为基础,追溯 1945 年至 1949 年间工党政府外交决策的背景与演变过程。具体材料来源主要依托 U.K. Parliamentary Papers 和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DBPO) 两个数据库,系统收集了议会辩论记录、政府报告、内阁会议纪要、外交文电等第一手资料。同时,辅以政要回忆录、人物传记、工党的竞选宣言及当代学术研究,对不同来源材料进行交叉印证与批判性分析,力求避免资料来源的单一性偏误。通过历史脉络的细致重建,本文不仅描绘事件的表面进程,更试图揭示政策形成过程中不同政治力量、官僚机构、领导人物之间的互动机制,以及对外政策调整背后的深层结构性因素。在具体操作上,本文强调对史料进行解释性而非叙述性使用,即不仅呈现事实,更关注事实背后的意图、立场和认知逻辑,以期揭示政策转向的真正动力。

(二) 比较分析法

在时间维度上,本文采用纵向比较分析方法,将 1945 年后艾德礼政府工党的对苏态度与战前、战时工党的外交立场进行系统对照。通过比较政策文件、政党宣言、领导人言论与实际外交行动,梳理工党外交思想与实践的连续性与断裂性,从而突出战后政策右倾转向的特殊历史条件与政治意义。通过这种纵向比较,本文不仅揭示出 1945 年前后工党对外政策的具体变化,还能够进一步剖析促成这种变化的国内外变量,为解释其悖论性转型提供经验性支撑。

(三) 内外互动视角

本文的研究问题本身即涉及国内政党政治逻辑与国际体系变动之间的动态联系,因此采用内外互动的分析视角作为基本框架。在分析中既关注工党在英国国内政治环境中为争取合法性和执政稳定而做出的战略调整,也关注国际力量结构(特别是美苏对抗格局)对英国对外政策选择空间的塑造。本文力图超越将对外政策变化单纯归因于经济、地缘政治或意识形态某一维度的传统解释,而是通过考察内外变量的交互作用,提出一个更为综合、动态的解

释路径。

（四）层次分析法

理论框架上，本文借鉴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层次分析法（Three Levels of Analysis），从个体（贝文）、国家（政党与社会压力）、国际体系（国际力量格局变化）三个层次，综合分析工党政策转向的深层动因。通过考察不同层面因素的交互作用，探索工党如何在内外压力下调整自身政治定位，并最终在冷战初期形成鲜明的反苏外交路线。

第五节 章节安排、主要观点及创新

（一）章节安排

本文正文部分共分为三章，依循由理念到实践、由历史脉络到原因分析的逻辑结构，系统探讨英国工党在 1945 年至 1949 年期间为何推行与其意识形态相悖的右翼对外政策。

第一章聚焦于英国工党的左翼背景，勾勒其作为左翼社会主义政党的基本政治定位及其对外政策的早期倾向。该章分为三个部分，首先追溯工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过程，强调其源自工会运动与费边社等渐进派思潮的影响，确立了以公有制、国家干预和社会福利为核心的民主社会主义理念；其次，探讨工党对外事务中的和平主义传统，从早期反战言论、对国际联盟的支持到强调裁军与多边合作，展示其对均势政治与军事干涉的持续质疑；最后，分析工党长期以来的亲苏立场，尤其是在战前及战争期间对苏联的正面认知与阶级团结想象，指出这种态度如何在战后初期构成其外交政策的惯性基础。这一章旨在揭示，在 1945 年执政之前，工党在意识形态、历史经验与外交倾向上均与右翼现实主义存在深刻分野，为后文分析其政策转向的“悖论性”提供理论与历史背景。

第二章梳理工党执政后对外政策的具体演变过程，尤其是其对苏态度如何在战后短短数年内发生显著转变，并最终参与并推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创建。本章首先分析战后初期工党党内仍保有的亲苏氛围，尤其是基层党员与传统左翼派系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实验的同情与对和平共处的期待；进而探讨贝文领导下的外交路线如何逐步向现实主义转向，特别是在伊朗危机、希土危机等关键事件中，政府如何重新评估苏联的战略意图，并在安全逻辑驱动下推进对美合作。随后，详细论述工党政府在推动北约建立中的关键作用，从英美关系的重构、对马歇尔计划的接受，到作为首批签约国参与构建集体安全体系，展现工党如何在短期内完成外交理念的实质性重组。该章意在说明：尽管工党具备左翼传统，但其在冷战初期的政策实践却呈现出明显的右转趋势，这一过程不仅关乎国际局势的客观变化，也关乎执政党的战略选择与政权合法性塑造。

第三章着眼于对上述政策转向背后动因的深入分析。借助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三层次分析

框架, 本文从三个维度展开讨论: 第一节聚焦于工党作为政党的自我认知与政治身份重塑过程, 指出其从“工人阶级代言人”向“全民政党”的跃迁过程中, 日益强调国家责任与治理能力, 从而在对外政策上选择了有助于巩固执政合法性的现实主义立场; 第二节剖析外交大臣贝文在外交决策中的主导作用, 揭示其个人政治经验、意识形态立场与国际认知如何塑造了工党政府的对苏政策走向; 第三节从工党党内结构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出发, 分析工党内部结构和博弈斗争对政府的外交立场产生制约与推动作用, 揭示贝文及其他工党领导人如何在党内外压力下调整对苏政策, 从而加快英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冷战阵营的步伐; 第四节从宏观结构出发, 分析战后英国相对实力的急剧衰退、经济困境与帝国秩序的崩解如何迫使工党政府在安全与国家地位维护之间作出战略性选择, 转向依附于美国的冷战阵营。该章旨在综合考察多重变量之间的互动机制, 从而为工党政策转向提供一个结构—行为结合的解释框架。

(二) 主要观点及新意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 英国工党在 1945 年至 1949 年间之所以推行明显右倾的对外政策, 并最终推动北约的建立, 既是对冷战初期国际体系压力的回应, 也是其执政合法性建构逻辑与意识形态调适的体现。这一政策转向, 并非单纯源于国际局势变化或个别政治人物的强势推动, 更深层次上体现出工党在战后身份重塑过程中对国家责任角色的主动认领, 以及为摆脱“阶级政党”定位而采取的对外战略转型。也就是说, 工党的“右翼外交”不仅是对苏联扩张压力的反应, 更是一种服务于国内政治正当性与政党国家化进程的战略行为。

本文的新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研究问题的定位具有反思性与结构性结合的特征。本文聚焦于一个较少被充分展开且具有悖论性色彩的问题——英国工党这一左翼社会主义政党在冷战初期为何推行右翼对外政策, 并将问题具体锁定在 1945-1949 年北约成立前夕的关键阶段, 避免了过宽泛的主题处理, 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清晰的时间框架。

第二, 解释路径上引入“政党自我定位”视角。不同于以往主要基于国家利益、地缘政治压力或经济困境的单一解释, 本文引入了政党自我认知与政治身份重塑的视角, 强调工党在国内合法性建构压力下, 为了确立自己作为“国家治理者”的形象, 主动调整对外政策立场, 从而推动了英国在冷战初期的对苏对抗。这一解释路径有助于更立体地理解战后英国对外政策转型的内在逻辑。

第三, 在方法与材料使用上力求交叉结合与实证严谨。本文结合了历史分析法与纵向比较分析法, 广泛运用 U.K. Parliamentary Papers 和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DBPO) 数据库中的第一手政府档案, 系统梳理战后初期英国工党对外政策演变的过程与细节。同时, 本文借鉴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内外互动视角与层次分析框架, 从微观个体、国家内部政治与国

际体系三个层面交叉考察工党政策转向的原因,实现了在丰富史料支撑与理论逻辑推演之间的紧密结合。这种方法的综合应用,使得本文不仅能够细致还原历史过程,也能在更高层次上把握政策演变背后的深层机制。

仅供学习和交流

第一章 英国工党的左翼背景

在分析英国工党的外交政策之前，必须首先厘清“左翼”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具体内涵。20 世纪上半叶，左翼政党的身份认同主要建立在以下三项基本特征之上：以国家干预和社会公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帝国主义与军备竞赛的反对所体现的和平主义传统，以及出于阶级连带与反法西斯斗争而形成的对苏联的政治同情。^①这些特征并非源于抽象理念，而是根植于工业社会中工人运动的现实诉求，以及一战与二战经验所带来的深刻反思。在战后初期的历史背景下，左翼主张强调社会平等、反对军事扩张和推动国际合作，是与右翼现实主义、保守主义帝国观相对立的政治立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具有结构性和历史深度的左翼身份，与当代语境下被泛化甚至贬义化的“白左”标签完全不同。后者常被用于指代脱离现实、理想主义过度的文化与政治立场，而工党的左翼特征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不公与战争创伤的回应，具有明确的制度诉求与群众基础。因此，本文在分析工党的对外政策悖论时，必须首先回到这一历史语境之中，厘清其左翼身份的思想根基与政治意义。

第一节 工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1900 年 2 月，英国的各大工会、社会主义团体与合作社在伦敦召开特别会议，正式成立“劳工代表委员会”（the 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 LRC）。1906 年，该组织更名为“工党”（Labour Party），议会工党随之正式形成，并逐步发展为英国议会中的重要政治力量。工党的成立，是 19 世纪末英国社会主义思潮发展和工人政治诉求增强的必然结果，其核心意识形态根植于英国社会主义思想传统和劳工运动的交织。在工党大部分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始终是主流的意识形态。在成立初期，工党内部并非单一意识形态主导，而是融合了劳工主义、工会主义、社会主义和激进自由主义等多种思想流派，呈现出较强的多元化特征。1918 年，工党党章“第四条”的确立，标志着社会主义正式成为工党的核心意识形态，特别强调通过国有化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控制。这一意识形态在二战后的艾德礼政府时期得到了全面实践，具体体现为关键产业的国有化、大规模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以及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形成了鲜明的民主社会主义特征。

^① 姬文刚：《中东欧左翼政党发展 30 年：回顾与展望》，《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 年第 6 期，第 109-111 页。

本部分将围绕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展开讨论。首先，分析工党的成立背景及其工会出身，以揭示其工人阶级立场的特殊属性；其次，探讨其意识形态的确立过程，阐述社会主义如何成为工党的主流理念；最后，结合工党的社会主义实践，考察工党如何在现实政治中贯彻这一意识形态。

一、工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

英国工党的诞生本质上是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工人阶级政治觉醒与工会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其前身“劳工代表委员会”（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 LRC）于 1900 年成立，主要由工会、合作社社会主义团体及合作社构成。正如贝文所形象描述的那样：“工党乃是从工会运动中破茧而出的。”工党成立的初衷，便是以议会斗争为手段，维护日益壮大的劳工运动的权益。大多数工会领导人更关心工资增长与工作条件改善，他们希望通过“自由的集体谈判”在现存资本主义框架内实现目标，而非推翻整个社会制度。因此，早期工党更偏向于工会主义（Labourism），其政治斗争的主要目标是为工人争取更好的福利，而非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①

尽管工会及工会主义对早期的工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工党并非仅仅只是工会的议会代理人，只是当时的现实情况是工会无论是从组织上还是资金上都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成立之初由 12 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中有 7 人来自工会，剩余 5 人来自各社会主义团体，其中独立工党和社会民主联盟各 2 人、费边社 1 人；^②工会始终是工党全国机构和选区政党的主要资金来源，由于缺乏大量个人党员和商业盟友的支持，工党在近一个世纪内几乎完全依赖工会作为其唯一且主导性的资金供给者。^③

但是，实际上在工党成立之前，英国社会主义思想已有悠久的传统，并深深烙上了英国特色。与德国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或法国充满革命倾向的社会主义不同，英国社会主义更多与工会运动、工会主义和劳工主义紧密交织。^④它不仅是一种政治经济理论，更是一种融合了道德观和政治观的社会思潮。到工党成立之前的 19 世纪末，英国主要产生了劳工马克思主义、费边社会主义和伦理社会主义三大流派。^⑤这三大社会主义流派在劳工代表委员会中分别由社会民主同盟（The 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费边社（The Fabian Society）和独立工党（The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所代表。其中，社会民主同盟受马克思主义影响，

^① 比尔·考克瑟等：《当代英国政治》，孔新峰、蒋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02 页。

^② R. T. Mckenzie, *British Political Parties*, UK: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1963, p.458.

^③ Brian Brivati and Richard Heffernan, *The Labour Party: a centenary history*, England: Macmillan Press Ltd, 2000, pp.9-10.

^④ Geoffrey Foote, *The Labour Party's Political Thought*, UK: Palgrave Publishers Ltd, 1997, p.18.

^⑤ 张志洲：《英国工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迁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8-99 页。

强调阶级斗争；费边社主张依靠议会和国家干预，通过渐进改革实现社会主义；独立工党则倡导一种带有宗教伦理色彩的社会主义，相信普遍的人类兄弟之情而非阶级斗争所导致的革命。^①在劳工代表委员会的组织目标讨论上，社会民主联盟代表提出决议，要求建立“一个独立于资产阶级政党之外的明确政党，以阶级斗争为基础，并以实现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的社会化为最终目标”。但是这一激进主张令当时的多数代表难以接受。最终，独立工党的代表凯尔·哈迪的折中方案获得全体通过——敦促在议会中建立独立的“劳工团体”（而非政党），并设立党鞭；同时承诺该团体“与任何暂时致力于推动直接有利于劳工立法的政党合作”——或“反对具有相反倾向的法案”。凯尔·哈迪（James Keir Hardie）这一方案不仅争取到了工会代表支持，同时又为与自由党保持合作留下空间。^②

随后的几年里，工党内部有关社会主义性质的提案不断地被提出。1908年的工党第八届年会上，社会民主联盟成员的提案明确表达了要推翻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目标，他指出工党的最终目的应该是“推翻资本主义的现行竞争制度，创立一切生活资料均归公共所有和管理的制度”。同时，机械工会的一位成员也提出“工党应以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社会化，由民主国家根据整个社会利益加以管理，从而使劳工彻底摆脱资本主义和地主制度的束缚”，该提案在大会上获得了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工党党内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③

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英国实行事实上的“战时社会主义”，政府对关键经济领域实施管控和干预，自由主义首先在经济层面开始衰落。而自由党的分裂进一步削弱了其政治影响力，使自由主义在政治领域也受到动摇。与此同时，经历战争洗礼的工党在1918年已发展成熟，并通过改组，在英国政坛逐步站稳了脚跟。1918年2月，工党在年会上正式通过了由费边社代表人物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起草的新党章。在党纲的目标条款中，“第四条”明确表述了工党的核心目标：“基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并通过对每项工业及服务业施行可获得的最优公众管理与监督机制，确保体力或脑力劳动者能够充分享有其劳动所创造的全部成果，并在此框架下推行可行的最为公平合理的分配方案。”^④6月举行的另一次会议上工党正式接受了由韦伯起草的题为《工党与社会新秩序》（*Labour and the New Social Order*）的新政策声明，其中包括关于最低生活标准和扩大社会服务的建议，

^① 比尔·考克瑟等：《当代英国政治》，孔新峰、蒋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页。

^② G. D. H. Cole,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Working Class Movement 1789-1947*,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48, p.262.

^③ 张志洲：《英国工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迁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4页。

^④ “第四条”译文参考 C. R. 艾德礼：《工党的展望》，吴德芬、赵鸣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4页。原文参见 The Labour Party Constitutions of 1918, Cited by G.D.H Cole, *A History of The Labour Party from 1914*, Labour in War-Time Appendix II, p.72.

其资金将通过直接征税与工业国有化相结合的方式筹措,^①即“国民最低标准”、“工业的民主监督”、“国家财政革命”和“用于公共利益的余额”四项原则,这个声明极为重要,形成了以后三十年(到1950年大选为止)工党政策的基础。^②

1918年工党内部的这两大新发展,标志着工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正式形成。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在回望工党的历史时指出1918年的党纲是“一个毫不妥协的社会主义者的文件”,是在“主张一种在生产和分配方面慎重规划的合作”。^③佩林(Pelling)指出“第四条”第一次明确的使工党获得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基础;^④G·D·H·科尔(G.D.H. Cole)则指出,1918年的这些文件“明确将工党与社会主义目标相绑定,且这种社会主义理念与费边社及其他‘渐进派’社会主义者的主张一脉相承”,构成了1945年工党政府大刀阔斧推行政策的基石;^⑤比尔(Beer)认为由于工党党章中具有生产资料公有的明文规定,“该党已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工党了”;^⑥埃贡·韦特海默(Egon Wertheimer)认为1918年工党方完成了“从社会改良向社会主义的转型”。^⑦

“第四条”所倡导的公有制、公众管理和公平分配理念,正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长期追求的核心目标。这一主张不仅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提出了批判和否定,还构想了替代性的制度模式,旨在从生产资料的归属、劳动者在生产体系中的角色以及财富分配方式等方面为超越传统的资本主义秩序提供实践路径。^⑧1918年的“第四条”正式标志着以费边社会主义为代表的英国社会主义开始占据工党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并且在此后几十年时间里逐渐成为工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统,工党在意识形态上是属于左翼社会主义政党。标志着以费边社会主义为核心的英国社会主义开始在工党意识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纲领性的转向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体系的系统性批判,更以“工业国有化”等原则构建起了工党社会主义的实践框架。费边社所倡导的渐进主义路径——即通过议会民主与国家干预实现社会转型——在此后数十年间逐渐演变为工党意识形态的正统范式,使其成为欧洲左翼政治版图中极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

^① Tudor Jones, *Remaking the Labour Party*, London: Routledge, 1996, pp.3-4.

^② 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江南造船厂业余学校英语翻译小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48页。

^③ C. R. 艾德礼:《工党的展望》,吴德芬、赵鸣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6页。

^④ 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江南造船厂业余学校英语翻译小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页。

^⑤ G.D.H Cole, *A History of the Labour Party from 1914*,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48, p. 56.

^⑥ 马克斯·比尔:《英国社会主义史》(下卷),何新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47页。

^⑦ E. Wertheimer, *Portrait of the Labour Party*, London: Putnam, 1929, p.50.

^⑧ 张志洲:《英国工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迁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0页。

二、工党的社会主义实践

正如弗朗西斯·威廉姆斯 (Francis Williams) 所说: 随着新党章和《工党与社会新秩序》被接受, 工党的成长期结束了。“现在, 工党终于成为一个成年的政党, 确定了自己的目标; 也终于意识到自己必须做些什么, 才能使这个目标深入人心。”^①在 20 世纪整个 20 年代, 工党一直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争取在下院获得多数席位以确保能够组阁执政, 实施生产资料公有制、推动广泛的国家社会服务的理想。^②

在工党 1922 年的竞选宣言中, 明确表示“煤矿、铁路实施国有化”, 并强调“工人参与产业管理”; 1923 年又明确提出“恢复人民在土地 (包括矿产资源) 方面丧失的权益”, 并在农业方面“推动并支持生产与销售领域的合作化模式”。^③1924 年工党的竞选宣言则对一些社会主义目标的构想更加明确与具体, 比如提出要“通过大规模特殊拨款推动农村地区增建低租金农舍”, “加速发展完全国有化且由公共控制的铁路-运河一体化系统”。^④1924 年大选之后, 拉姆齐·麦克唐纳 (James Ramsay MacDonald) 领导组建了首个工党政府, 但这次执政是依赖自由党人的支持, 无法推行财富再分配、国有化等实质性的社会主义政策。尽管多数党员和选民坚信“社会主义是唯一解药”, 但现实政治博弈中, 他们清醒意识到这些激进改革在短期内毫无实施可能。^⑤但值得一提的是, 在第一个任期里工党推出了《惠特利住房法案》(Wheatley Housing Act), 由地方政府和国库共同提供补贴来修建住房, 并以低租金出租, 解决战后住房危机的同时刺激经济发展。^⑥

1928 年, 工党发布了《工党与国家》(Labour Party and Nation)。在草案序言中, 麦克唐纳写道: “工党与其他政党不同, 我们无意缝补腐朽制度的破衣烂衫, 而是致力于将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 草案开篇即宣称工党是“社会主义政党”。最终的文件中工党明确表达了其主张国家干预与调控的政策理念, 承诺一旦执政, 将推动基础工业的公有化, 并扩大社会服务的覆盖范围。^⑦1929 年的竞选宣言中, 工党重申“将实施煤矿与矿产国有化”以及“土地必须收归公共管理”, 提出“建立公平税收分配体系”。^⑧工党在此次大选中

^① Williams Francis, *Fifty years' march*, London: Odhams Press, 1949, p.284.

^② 刘成: 《英国工党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和变化的原因》, 《欧洲》, 2002 年第 2 期, 第 33 页。

^③ Iain Dale, ed., *Labour Party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s: 1900-1997*,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19-26.

^④ Ibid., pp.27-31.

^⑤ 亨利·佩林: 《英国工党简史》, 江南造船厂业余学校英语翻译小组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第 60 页。

^⑥ Kaethe K. Liepmann, “English Housing Policy Since the War,”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27, No.3, 1937, p.508.

^⑦ G.D.H Cole, *A History of the Labour Party from 1914*,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48, pp.205-206.

^⑧ Iain Dale, ed., *Labour Party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s: 1900-1997*,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32-38.

第一次成为多数党，尽管不是绝对多数。然而麦克唐纳仍然需依靠自由党的支持来组建少数派政府，关键立法常遭下院自由党或上院保守党阻挠而被搁置。随后，1931年国际金融危机席卷而来，内阁又面临着严重的内部分裂，最终麦克唐纳于8月23日辞职。^①1931年的竞选宣言中工党重申《工党与国家》中阐述的原则，作为少数派政府执政的两年里取得的成就——通过实施国家干预政策，促成了大规模公共工程，提高了农业、运输业、煤炭业和其他主要工业的效率；住房和养老金立法得到了广泛的推广，教育和医疗服务也得到了有力促进。同时，宣言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重建势在必行”，并强调：“资本主义文明的衰落迫在眉睫，必须坚定推进社会主义重建，这正是工党的历史使命。”^②但是工党在此次大选中失败了。

在韩德逊担任工党领袖后，开始党内队伍整顿和组织建设工作，工党逐渐走出阴影，重获生机。于是工党决心在党章确定的社会主义目标的指引下，继续加快步伐走下去。1934年10月，工党通过新纲领《为了社会主义与和平》（*For Socialism and Peace*），以取代之前的《工党与国家》。这一纲领的出台显著提升了国有化在工党政策中的优先地位，明确主张将土地、银行、煤炭、钢铁、交通运输、电力和供水等关键部门纳入国有体系，并提出设立国家投资委员会，以统筹国家投资和工业发展战略。《为了社会主义与和平》标志着工党在政策方向上对“麦克唐纳主义”的明确背离。与《工党与国家》中模糊软弱的措辞相比，1934年的纲领在国有化重点领域的界定上更加清晰，并引入国家主导的经济规划机制，展现出更为积极主动的政策取向。然而，尽管在策略上发生了转变，工党的核心理念依然保持延续，特别是在对“国家中心论”的坚持上：工党始终视国家机器为实现社会主义转型的主要工具，这种对中央计划体制的高度依赖在新纲领中达到顶峰。^③1935年工党的竞选宣言中，提出“大胆的社会主义重建政策”（*A bold policy of Socialist Reconstruction*），制定了比之前几次竞选宣言中都要详细的计划，明确主张对银行、煤炭、交通运输、电力、钢铁及棉纺织业等关键产业实施国有化，以确保在国家利益主导下的高效运作；农业领域将推行土地公有制，终结土地私有制对农村发展的束缚；纳入国家计划框架通过根治性措施解决贫困地区问题，为失业者提供充分保障，并通过国家发展计划大规模吸收闲置劳动力。^④1936年工党通过了煤炭国有化细则；次年3月发布了《工党的现实纲领》（*Labour's Immediate Programme*），明确多数党政府五年任期内的施政计划。纲领承诺通过国家投资委员会统筹经济规划，推动

^① 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江南造船厂业余学校英语翻译小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7-70页。

^② Iain Dale, ed., *Labour Party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s: 1900-1997*,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39-44.

^③ Andrew Thorpe, *A History of British Labour Part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pp.83-84.

^④ Iain Dale, ed., *Labour Party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s: 1900-1997*,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45-47.

英格兰银行（不含商业银行）、煤炭、电力与交通国有化，实施工业区位国家管控，推行40小时工作制、带薪休假，废除贫困审查，并将义务教育年龄逐步提升至15岁乃至16岁，同时改善医疗服务。^①尽管多数内容延续自《为了社会主义与和平》，但其显著特点在于首次以具体、可操作的方案取代了以往空泛的政策愿景。《工党的现实纲领》标志着工党开始以一套详尽的执政蓝图示人，体现了党内思想趋于一致的深化趋势。这一变化亦可视为对1928年《工党与国家》因缺乏具体操作路径而广受批评的直接回应。尽管政策内容有所更新，工党的基本立场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它仍然是一个坚定信奉“国家主义”的政党，坚持以“自上而下”的路径推进社会主义转型。^②因此，工党的社会主义实践在本质上可被称为一种“威斯敏斯特的社会主义”——由国家主导、由中央操控的社会重构方案。

在1935年的新议会党团领导班子选举竞争中，艾德礼在两次投票中脱颖而出接任工党党魁，他利用其他可能当选的候选人的对抗，扩大了权力，逐步巩固了在党内的地位，并渐渐赢得了贝文（Ernest Bevin）和其他下院外的工会领袖们的敬重。^③艾德礼在二战初期就开始着力重塑工党的政策方向。1940年1月17日，他告诫党内成员，工党必须提出明确的替代性纲领，并亲自参与制定战时政策框架。同年3月，艾德礼审阅了题为《工党国内政策》（*Labour's Home Policy*）的草案，认为其仅是战前政策的复述，缺乏现实针对性。他在致地方政府分委会秘书格兰特·麦肯齐（Grant McKenzie）的信中强调：“战争加剧了社会所有问题。唯有通过国家经济计划，才能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显然，要赢得战争，必须充分调动国家资源，而这离不开统筹管控。政府已不得不介入资本主义混乱以建立秩序……”此段论述几乎逐字成为1940年4月发布的《工党国内政策》核心段落。艾德礼与多尔顿（Hugh Dalton）合作完成终稿，但整体基调严格遵循艾德礼的愿景。文件宣称，战争为社会主义者提供了契机：“我们或将利用这场战争，为更公正、更包容的生活奠定基础。”纲领内容虽多为工党传统主张——如公共所有制、国家经济计划、公共工程、医疗改善、福利提升、住房与教育改革——但战争的紧迫性赋予其新的历史合法性。该文件标志着艾德礼政治理念的官方表述，并为后续战时政策提供了话语框架。^④1941年初，工党成立“战后重建中央委员会”，由此催生出拉斯基（Laski）起草、1942年2月发布的《旧世界与新社会》（*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 Society*）。该书延续《工党国内政策》的核心逻辑，坚持“计划与管控必须延续”，并规划了战后社会的五大支柱：充分就业、社会保障、经济重建、教育改革与全

^① Andrew Thorpe, *A History of British Labour Part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p.95.

^② Andrew Thorpe, *A History of British Labour Part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pp.96-97.

^③ 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江南造船厂业余学校英语翻译小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5页。

^④ Stephen Brooke, *Labour's War: The Labour Part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43.

民医疗服务。^①同年末，英国政府成立“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部际协调委员会”，由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担任主席，负责审查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并提出改革建议，随后出台了影响深远的《贝弗里奇报告》，呼吁要建立覆盖全民、统一高效的社会保障制度，消除“五大社会弊病”——贫困、疾病、愚昧、肮脏和懒散。^②这成为了工党 1945 年执政后的政策指导，推动了《国民保险法》《国民健康服务法》等立法。1944 年 12 月，工党会议以决议形式突破全国执委会（NEC）的保守建议，将原有模糊的“国家指导主要产业政策”表述替换为明确承诺：“对土地、大型建筑、重工业及银行、交通、能源行业实行公有制”。E. 丹宁顿夫人（Mrs E. Denington）直言：“如今所有人都看清，无序的资本主义意味着失业、堕落、营养不良与苦难，而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终将引发战争。威廉·贝弗里奇爵士试图用新方案为旧恶狼披上羊皮，但狼性未改——唯有彻底消灭它才能解决问题。”^③

在 1945 年的竞选宣言《让我们面对未来》（*Let us face the future*）中，直接出现了“工党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并为此深感自豪”的表述，并表示工党在国内的终极目标是建立“大不列颠社会主义共同体”（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of Great Britain）——一个自由、民主、高效、进步且具有公共精神的国家，其物质资源将被有序组织起来，服务于全体英国人民。同时指出当时“一些基础产业已经成熟甚至过度成熟，已经到了到了需要收归公有、由国家直接管理以服务全民的阶段。许多提供优质服务的小型企业可以继续发挥其有益作用，而对于那些尚未适合公有化的大型产业，则必须通过建设性监督，要求它们以国家需求为重，不得通过限制性垄断或卡特尔协议损害国家利益——不能为了维护自身资本结构与利润，而牺牲全民的生活水平”。因此，进一步提出燃料和电力、内陆运输、钢铁等行业的公有化；要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征用和使用方面的严重问题，为国家计划服务，实施土地国有化；将迅速推动立法，在必要的广阔领域为所有人提供社会保险。^④1945 年 7 月，工党在大选中第一次获得了绝对胜利，作为一个主张社会主义的政党，它首次在英国这一资本主义传统最深厚的国家中赢得议会多数席位。共有 1200 万选民投票支持工党，这在当时无疑是一项前所未有的突破。艾德礼政府上台后，迅速启动雄心勃勃的公有制计划，旨在通过国家干预重塑英国经济结构。国王乔治六世在公开讲话中明确支持工党“扩大工业和服务业公有制”的纲领，为工党的国有化政策提供了王室背书。面对英国缺乏国有化法律框架的现实，工党政府率先启动立法工程：1946 年通过的《英格兰银行法》将中央银行收归国有，标志着国家开始掌控金融命脉；同年颁布的《煤矿工业国有化法》终结了私人资本对能源基础行业的控制，随

^① Ibid., pp.108-110.

^② 贝弗里奇：《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组织翻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17 页。

^③ Paul Addison, *The Road to 1945: British Politics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Pimlico, 1994, p.256.

^④ Iain Dale, ed., *Labour Party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s: 1900-1997*,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55-59.

后两年间《电力法》《煤气法》《运输法》相继出台，逐步将电力、燃气、铁路及公路运输等战略领域纳入国家管理体系。至1949年争议性极强的《钢铁工业国有化法》通过时，工党已构建起覆盖金融、能源、交通等关键领域的公有制法律体系，其立法效率与改革力度在英国宪政史上前所未有。1946年工党政府又颁布了《英格兰银行法》，将英国银行全部股份收归国有，此后英国政府就能通过英格兰银行利用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运行。^①

综上所述，在1920至1940年代的历史进程中，英国工党始终不渝地致力于将党章“第四条”确立的社会主义目标转化为政治实践。无论是历次大选竞选纲领的明确宣示，还是重要政策文件的相继出台，抑或是两次执政期间的具体施政表现，都清晰地表明：工党不仅在理念上认同社会主义，更在实践中持续贯彻社会主义路径。因此，将工党视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党，并非空泛标签，而是建立在其历史实践与政策取向基础上的实质判断。

第二节 工党外交事务中的和平主义倾向

20世纪初，工党诞生于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的余晖中，承袭了维多利亚时代末期自由派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反战传统。工党在1906年竞选宣言中掷地有声地指出：“战争是让富人更富的阴谋。”^②这一立场反映出了工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基本价值取向。阿瑟·韩德逊（Arthur Henderson）曾指出：“工党以‘世界社会主义’为信仰基石，主张国际利益高于狭隘民族主义，认为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工党的对外政策始终贯彻和平主义与国际主义原则，强调通过制度化的国际合作解决全球问题，反对旧有的均势政治与军事对抗思维。工党自诩为英国唯一真正践行国际主义的政党，虽与自由党共享部分自由主义传统，但其政策深度植根于劳工运动的阶级联合意识。相较于其他政党口头支持国际联盟，工党更愿通过限制主权、推动裁军等实质行为来实现制度化的持久和平。”^③总体而言，工党的对外主张以一种带有康德主义色彩的国际观为理论基础，主要体现为五个核心维度：其一，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现实，但坚信通过共同利益与普遍价值推动体系性改革是可能的；其二，强调国际共同体意识，主张超越狭隘的国家利益认知；其三，倡导将民主原则与道义规范作为国际政策与全球治理的基础；其四，批判均势政治与秘密外交所带来的冲突风险；其五，揭示军备扩张与军备竞赛对国际秩序的破坏性。在此基础上，工党的社会主义特质进一步体现在其对国际工人阶级团结的持续强调，尤其重视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阶级连带关系。^④基于这一思想传

^① 刘成：《理想与现实——英国工党与公有制》，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0-42页。

^② Iain Dale, ed., *Labour Party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s: 1900-1997*,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10.

^③ Arthur Henderson, *Labour's way to peace*,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35, pp.23-29.

^④ Rhianon Vickers, *The Labour Party and the world, volume 1 (The Evolution of Labour's Foreign Policy, 1900-51)*,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94.

统与价值体系,工党大多数时间在对外政策方面都是呈现出一种和平主义倾向,并将其视为自身政治理念在国际层面的自然延伸。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工党认为自己是一个主要关注国内政策问题的政党。^①尽管彼时在议会中尚未成熟的工党更关注国内事务,但是关注少未必表示缺乏关注,对于对外政策工党一直都态度是宣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战的,其独立工党(ILP)派系的核心成员更秉持和平主义信念。1911年工党在莱斯特召开裁军特别会议,并定期出席和平协会年度大会。^②工党也在年会上定期通过决议谴责军国主义和战争——1912年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调研“参战国发动总罢工对遏止军事冲突的实际效果”;1913年大会则呼吁“工人阶级的妻子与母亲们通过向子女灌输工人国际团结的真谛,协力粉碎军国主义与战争机器”;至1914年大会,又一项获得通过的决议要求:抵制征兵制与军备扩张,敦促英国工会联盟(TUC)“协调本国及他国劳动者的联合反战行动”,并进一步号召民众“运用政治权力推动对外政策民主化,以全球劳动者联盟取代现行武装和平体系”。大会主席汤姆·福克斯宣称:“工党的使命就是揭穿任何伪装的战争叫器,警示并武装各国工人阶级对抗共同敌人。”^③

1914年8月4日,英国自由党政府正式对德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此真正波及到英国本土。对此,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NEC)于8月5日以8票对4票通过决议,谴责称此次战争源于“外交大臣为维系均势而推行的对外政策”,谴责格雷(Edward Grey)“未经国民知情便以国家荣誉担保支持法国参战”,并声明“工运重申反对导致战争的旧政策,当前职责在于尽早恢复和平”。^④在数日内工党内部支持参战的声音越来越大,议会工党也决定支持政府追加战争预算,麦克唐纳因此辞去党内职务。但是麦克唐纳也随即和四名反战的自由党党员组织了一个名为“民主监督协会”的团体,该团体要求对对外政策进行民主监督,提出无条件和平、成立维护和平的国际组织和裁军等要求。^⑤1917年成为工党对政府战争政策立场的重要转折点。年初俄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专制,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随即倡议召开斯德哥尔摩国际社会主义会议,旨在推动通过谈判实现停战。工党领导人韩德逊随即访问俄国,并在此行后表态赞成英国派代表参会。然而,劳合·乔治政府指责韩德逊对俄关系的观点,并拒绝为代表团发放护照,会议因此流产。^⑥但是与此同时,自1917年至1918年,苏维埃政府陆续公布协约国之间签订的秘密条约,引发英国国内工运的强烈震荡。条约内容暴

^① Lucian M. Ashworth, "Rethinking a Socialist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No. 75, Spring 2009, p.30.

^② Rhianon Vickers, *The Labour Party and the world, volume 1 (The Evolution of Labour's Foreign Policy, 1900-51)*,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p.44.

^③ Ibid., pp.56-57.

^④ Rhianon Vickers, *The Labour Party and the world, volume 1 (The Evolution of Labour's Foreign Policy, 1900-51)*,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p.57.

^⑤ 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江南造船厂业余学校英语翻译小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9页。

^⑥ 同上,第43-44页。

露出战前英法等国的领土扩张计划，与政府宣称的“正义战争”形成鲜明反差。^①工党内部由此产生强烈的道义愤慨，普遍认为战争已背离初衷，滑向帝国主义扩张的泥淖。一些地方工党组织更是严厉谴责秘密条约“践踏所有参战的正当理由”，批评其体现出“容克式的帝国主义逻辑”。工会也因担忧战后福利倒退、政府未同步征用财富而不满。这一系列事件促使工党主流逐渐转向更加明确的和平主义立场。^②自1917年起，工党的政治派系与产业工运重新建立协作关系，开始共同思考战后秩序的构建，并最终形成纲领性文件《战争目标备忘录》（*Memorandum on War Aims*），宣布建立持久的和平是英国工党的主要战争目标。该备忘录由麦克唐纳、韩德逊与韦伯起草，提出一整套超越现实主义逻辑的和平方案，获得了广泛支持，并于当年12月的特别代表大会上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备忘录》内容涵盖多项前瞻性主张：推动各国民主化，废除帝国主义与秘密外交，倡导对外政策的民主监督，反对义务兵役制与军备竞赛，取缔军火利益集团；同时呼吁建立国际联盟、常设国际法院与具有立法权的国际机构，以制度化方式保障和平；在民族问题上，主张民族自决，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并建议将非洲殖民地置于国际联盟托管之下。^③该文件几乎全票通过，不仅标志着工党内部在对外政策上长期存在的裂痕得以弥合，也表明其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整体构想已趋成熟，试图以和平主义的理念引领战争后的世界重建。总体来看，工党在一战中的表现，虽无法完全拒绝现实主义约束，却始终努力在战争逻辑中维系和平价值，其和平主义倾向以一种现实妥协中的理想坚持延续下来。

在1918年制定的新党章中，工党将其国际主义理念制度化，并在纲领中明确提出：“本党将与各国工党及社会主义组织开展合作，协助推动建立一个旨在维护自由与和平的国家联盟，构建解决国际争端的调解与司法仲裁机制，并促成切实可行的国际立法。”^④1918年的竞选宣言中工党更是将“和平”放在了第一条，宣言指出：胜利已然实现，英国工党在此进程中功不可没。工人阶级不仅构成了海陆军士兵的主体，更在国内承担了战争的重负；而体现于工党战争目标中的民主外交，既是赢得战争的最强助力之一，也必将成为重建世界秩序的核心力量。工党所追求的和平，乃是以国际合作为基石的和平。我们坚决反对秘密外交与任何形式的经济战，并主张将《国际劳工宪章》作为和平条约的核心组成部分，将其纳入“自由民族联盟”（League of Free Peoples）的根本架构之中。^⑤与此同时，工党还设立了一个准学术性质的机构——国际问题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Questions,

^① Kenneth E. Miller, *Soci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in Britain to 1931*,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1967, p.57.

^② Ibid., pp.57-58.

^③ Arthur Henderson, *The aims of Labour*, New York: B. W. Huebsch, 1919, Appendix I, pp.99-110.

^④ 原文参见 The Labour Party Constitutions of 1918, Cited by G.D.H Cole, *A History of The Labour Party from 1914*, Labour in War-Time Appendix II, p.73.

^⑤ Iain Dale, ed., *Labour Party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s: 1900-1997*,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16.

ACIQ), 以系统化推进其对外政策的研究与讨论。该委员会很快成为党内基本政治理念交锋与重塑的关键平台, 其发布的研究报告为工党后续的外交立场和政策转型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随着战争结束后大量关注国际事务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向左翼靠拢, 并与原有的社会主义知识社群在该委员会中汇合, ACIQ 逐渐演变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共同参与、共塑工党国际主义政策走向的重要熔炉。^①英国工党也逐步将其外交理念置于更广阔的国际语境之中。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于 1918 年 1 月发表“十四点原则”演讲后, 英国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工会代表大会议委员会与合作社议会代表委员会随即召开联席会议, 联合发布声明, 高度评价威尔逊“卓越的道德品质与宏阔的政治远见”, 并明确表达了对其原则的支持。声明指出: “威尔逊总统的纲领与英国工党的主张在核心理念上高度契合, 具体细节分歧无需赘述。”^②1918 年 1 月 23 日, 工党年度大会进一步通过决议, 表示“欢迎英国首相与威尔逊总统关于战争目标的声明, 前提是这些声明须符合英国劳工运动的战争目标, 且有助于实现体面而民主的和平。”在随后的数周内, 工党领袖韩德逊致信威尔逊, 表示愿意“竭力遵从”其所提出的任何路线。^③随着战争的结束, 工党也积极参与国际工人运动重建的进程。1919 年 1 月, 工党出席了国际劳工与社会主义者在瑞士伯尔尼召开的会议, 着手重建战前的第二国际(史称“伯尔尼国际”)。会议通过的决议欢迎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参与, 并宣称: “此次会议确信, 自今而后, 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联合将成为消灭军国主义、捍卫国际民主的最有力保障。”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已证明国际团结之脆弱, 英国工党仍坚持表达对国际社会主义团结可能性的信念。^④

在 1922 年的竞选宣言中, 工党再次在开篇强调“和平”这一核心理念。宣言指出: 要实现持久和平, 首要之务是修正《凡尔赛和约》中那些加剧国际不公的条款。同时进一步强调: 工党将致力于构建一个包容性更强、权责更明晰的国际联盟, 赋予其通过司法仲裁与调解处理国际争端的权力。在此基础上, 该联盟应推动军备限制协议的达成, 并以实现全面裁军为最终目标。^⑤1924 年的竞选宣言中, 工党详细陈述了自己为和平所作的持续努力, 并更为明确具体地表述了自己的和平主义立场: “英国乃至全球的当务之急是维护国家间和平, 并恢复工商业活力。”^⑥随后 1924 年大选胜利, 麦克唐纳组阁成立第一个工党政府。执政伊始, 麦克唐纳即将国内的经济困境与国际形势紧密联系起来, 认为“贸易与和平密不可分

^① Casper Sylvest, “Interwar Internationalism,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and the Histori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8, No.2, 2004, p.413.

^② Kenneth E. Miller, *Soci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in Britain to 1931*,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1967, p.75.

^③ Ibid., pp.75-76.

^④ Rhianon Vickers, *The Labour Party and the world, volume 1 (The Evolution of Labour's Foreign Policy, 1900-51)*,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p.71.

^⑤ Iain Dale, ed., *Labour Party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s: 1900-1997*,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19.

^⑥ Ibid., p.27.

——只有欧洲恢复稳定、赔款问题解决，国内失业问题方能化解。”^①工党首先是处理了法德关系这一欧洲安全核心问题。在实际操作中，工党政府首先着力于修复法德关系这一欧洲和平的核心问题。1924年7月，麦克唐纳在伦敦主持召开了一次由法国、德国、美国及英国代表参加的会议，尽管这是一场非正式会晤，但其开放、友善的氛围广受各方欢迎，也为随后《道威斯计划》的达成奠定了基础。^②麦克唐纳的调停风格被视为一种不同于传统强硬手段的和平主义实践，体现出工党在处理国际关系中的全新姿态。与此同时，工党政府履行了其竞选承诺，正式推动外交透明化。新政府宣布将废除秘密外交的做法，所有与外国签署的条约必须提交下议院审议，为期21天后方可正式批准。麦克唐纳强调，这一机制的建立“将使秘密条约和条约中的秘密条款变得不可能”，不仅增强了议会的监督职能，也体现了工党希望通过民主程序规范外交行为的理念。^③在国际制度层面，工党政府积极回应关于集体安全的讨论。尽管支持国际联盟的整体理念，麦克唐纳政府拒绝了1923年国际联盟大会提出的《互助条约草案》。该草案要求成员国在他国遭受侵略时提供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全面支持，并据此推动全球裁军。然而，麦克唐纳认为，该条约的安全保障机制过于薄弱，不足以支撑实质性裁军承诺，反而可能促使英国扩军，从而背离其和平主义初衷。相较之下，工党更倾向于支持1924年提出的《日内瓦议定书》，该议定书强调通过调解与仲裁机制解决国际争端，在战争爆发前遏止冲突升级。工党不仅公开支持该议定书的核心原则，还于1925年3月17日通过决议，称“本党认为英国应竭尽所能推动《日内瓦议定书》原则的接纳及裁军会议的召开。我们支持该议定书，因其提供了当前实现裁军、以仲裁替代战争解决争端的唯一可行方案。”^④虽然工党第一次执政仅维持九个月，但其在对外政策上所体现出的开放姿态与和平导向，已被党内外普遍视为一种全新的外交精神。正如工党当时所宣称，这一短暂的执政时期，是“大不列颠推动各国人民和平与和解政策的开端”。^⑤

1928年，工党在其政策文件《工党与世界》（*Labour and the World*）中，明确提出，建立和平、自由与正义的国际秩序，必须从根源上消除各国间争端。其手段包括：放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通过调解与全面仲裁处理冲突、推进裁军、强化国际联盟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协调作用，并与非联盟国家建立互助机制。^⑥这一主张在1929年大选宣言中得到进一步强调。工党将“和平”列为选举中的核心议题之一，重申其执政期间的和平外交为“所有和平爱好者所能信赖”，并宣称希望继续推动1924年所确立的“崇高国际地位”。在政

^① David Marquand, *Ramsay Macdonald*, London: Jonathan Cape Ltd., 1977, p.295.

^② Richard W. Lyman, *The First Labour Government: 1924*, London: Chapman & Hall, 1957, p.163.

^③ Rhianon Vickers, *The Labour Party and the world, volume 1 (The Evolution of Labour's Foreign Policy, 1900-51)*,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p.86.

^④ Ibid., pp.87-88.

^⑤ Labour Party (Great Britain), Conference, *Report of the 25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Labour Party*, London: The Party, 1925, p. 252.

^⑥ G.D.H Cole, *A History of the Labour Party from 1914*,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48, p.206.

策层面，工党主张签署国际联盟认可的《仲裁、调解与司法解决总议定书》，强调“全面裁军已刻不容缓”，并积极响应美国裁军倡议，推动尽快缔结《裁军条约》和召开全面裁军会议。^① 1929年至1931年，工党第二次执政。这一时期，工党政府在麦克唐纳，尤其是在外交大臣韩德逊的领导下，较为连贯地推行了一种可以被称为“国际联盟政策”（League Policy）的外交路线。该政策意图通过限制军备、缓解国际间突出不满（尤其是欧洲）、倡导仲裁解决争端、构建联合安全保障机制等措施，为维护国际秩序奠定基础。在实践中，政府试图将国际联盟塑造为替代战争机制的载体，并赋予其集体安全的功能，使其成为抵御未来冲突的重要制度支柱。^② 1931年的竞选宣言宣称：“工党始终站在国际和平运动的最前沿”，并强调工党通过仲裁与裁军所取得的外交成就“为英国赢得了世界道义领导地位”。工党承诺在即将召开的裁军会议上提出削减武装力量与军费的具体方案，重申裁军是通向真正和平与安全的唯一路径。^③ 至1935年，面对全球局势恶化与集体安全体系面临危机，工党在竞选宣言中呼吁“彻底扭转当前自毁式的对外政策”，主张与国际联盟及一切致力于和平的非联盟国家展开全面合作。工党坚定支持集体安全体系，要求国际联盟立即介入非洲战争，恢复和平谈判，并重启全面裁军进程。^④

从工党1924年和1929—1931年两次执政的外交实践可以看出，其始终坚持和平主义立场，努力将理念转化为政策行动。正如艾德礼在《工党的展望》中所言，“工党的（外交）政策已经由韩德逊先生概括为对世界和平的忠诚。这种忠诚包括坚持仲裁的责任——坚持我国政府要用和平的方法解决一切与它有关的纠纷；赞助制裁的责任——支持集体的行动；以及反对战争的责任——拒绝支持我们自己的政府，如果它是侵略者或者抗拒仲裁并且卷入了战争。”^⑤ 1934年，工党在绍司波特年会（Southport Conference）上通过了纲领性文件《战争与和平》，全面阐述其和平主义外交理念，并确立为未来执政的外交方针。该声明至今仍被视为工党的正式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声明的核心内容是：工党的对外政策应建立在国际联盟主导的集体安全体系之上，但不应将国际联盟仅仅视为传统对外政策的工具或国家军备的附属保障。相反，工党将其视为迈向“世界联邦”的初步尝试，即一个以合作、和平与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这一框架下，工党否定以权力均衡为基础的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主张国家主权应服从于全球责任。声明强调，和平秩序必须建立在社会正义的基础上，为此必须推动跨国的经济合作，并实现全球层面的资源分配、运输体系、劳动时间与

^① Iain Dale, ed., *Labour Party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s: 1900-1997*,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35.

^② H. R. Winkler, "The Emergence of a Labor Foreign Policy in Great Britain, 1918-1929,"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28, No.3, 1956, pp.247-248.

^③ Iain Dale, ed., *Labour Party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s: 1900-1997*,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42.

^④ Ibid., p.46.

^⑤ C. R. 艾德礼：《工党的展望》，吴德芬、赵鸣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5页。

劳动条件的协调与治理。^①

1938年，保守党政府首相张伯伦与希特勒签署《慕尼黑协定》，工党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认为协定是“对和平民主人民的可耻背叛”。工党批评政府在未经过议会讨论的情况下，擅自接受“让一个主权国家听命于德国统治者”的安排。在下议院关于欧洲局势及协定的为期三天辩论中，时任工党领袖艾德礼直言：“过去几天发生的事件，是本国与法国有史以来所遭遇的最大失败之一，无疑，这是希特勒的巨大胜利。”^②这一立场表明，尽管工党一贯主张和平解决争端，但并不容忍以姑息主义换取短暂和平的妥协策略。随着纳粹扩张愈发不可遏制，1939年9月3日，张伯伦通过广播向全国宣布英国对德宣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工党坚持中立、反战的态度不同，工党在二战初期表现出广泛的支持。这一转变源于其对局势的判断——即与纳粹政权已不存在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尽管支持战争，工党在战事初期对政府模糊不清的战争目标持批评态度。1939年11月16日，艾德礼在下议院会议上呼吁政府明确战争的长期目标，指出“人民需要知道我们为何而战”，并要求政府阐明其对战后世界秩序的设想。^③工党于1940年2月发表《工党的战争目标》（*Labour's War Aims*）声明，提出具有前瞻性的外交蓝图。声明不仅描绘了战后国际关系的理想图景，还提出具体政策建议，包括建立新的国家联合体、反对帝国主义剥削，并以社会主义与民主为基础构建持久和平的新世界秩序。此后，工党进一步推进战后重建的构想。^④1941年8月6日，工党设立专门委员会研究战后国际安排，并于1942年春发布中期报告《旧世界与新社会》（*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 Society*）。该报告指出，“1939年的旧世界已死”，其理念和制度“早已过时”，在国际关系方面，必须放弃国家主权，由一个新的、更强大的国际联盟构成上层建筑，并通过它建立一个以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新的世界社会。^⑤1943年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任命休·道尔顿（Hugh Dalton）起草《国际战后安排》（*the International Post-War Settlement*），文件中提出：“必须立即着手建设一个所有民族团结追求共同利益的世界秩序”，并强调各国人民“在和平、安全、自由和对人类科学成果的公平分享方面具有共同的根本利益”。^⑥1944年工党年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改文件。艾德礼在推动决议通过时重申，国际和平的实现必须依靠三大支柱——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政策的实

^① 同上，第116-117页。

^② Rhiannon Vickers, *The Labour Party and the world, volume 1 (The Evolution of Labour's Foreign Policy, 1900-51)*,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35-136.

^③ House of Commons Hansard, Commons Sitting of Thursday, 16th November, 1939, Volume 353, <https://parlipapers.proquest.com/parlipapers/docview/t71.d76.cds5cv0353p0-0006?accountid=13151>, 访问时间: 2025年3月27日。

^④ Labour Party (Great Britain), Conference, “Labour, the War, and the Peace,” *Report of the 40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Labour Party*, London: The Party, 1940, Appendix 2.

^⑤ G.D.H Cole, *A History of the Labour Party from 1914*,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48, p.414-419.

^⑥ Labour Party (Great Britain), Conference, “The International Post-War Settlement”, *Report of the 44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Labour Party*, London: The Party, 1944, pp.4-9.

践以及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紧密协作。^①在 1945 年《让我们面对未来》(Let us face the future) 的竞选宣言中,工党开篇就直指一战后英国民众“轻信反工党政客的空头承诺”,将和平拱手让给“靠战争牟利的冷酷之徒”,导致国家的社会与经济政策严重脱离民众利益。工党强调不会重蹈覆辙,宣称“我们不做空头许诺,但坚信唯有工党计划能为人民赢得持久和平。”^②

综上所述,工党的和平主义倾向并非偶然的政治姿态,而是深植于其意识形态内核与国际主义传统的必然选择。从一战前对秘密外交与军国主义的批判,到两次执政期间对国际联盟机制的务实探索;从对《凡尔赛和约》不公条款的修正诉求,到二战后对全球合作新秩序的蓝图设计,工党始终将和平视为对外政策的伦理基石与行动指南。尽管其政策在现实政治中屡受制约,如 1924 年《日内瓦议定书》的失败,但工党从未放弃通过裁军、仲裁与多边合作重塑国际秩序的尝试。这种从道义原则到制度实践的持续努力,不仅塑造了工党作为“国际主义政党”的独特身份,更在英国外交史上刻下了鲜明的和平主义烙印。归根结底,工党的和平主义倾向是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部分投射。

第三节 工党与苏联的关系

作为英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工党与苏联之间自 20 世纪初期起便保持着某种特殊而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源于意识形态上的天然共鸣,更体现在工党对苏联发展道路的持续关注与反应之中。正如比尔·琼斯(Bill Jones)所言:1917 年后的三十年间,工党曾与苏联有过一段“热恋”,工党曾经将苏联视为世界的希望。^③从 20 年代起,工党将苏联视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艰难的生存斗争被视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防线;进入 30 年代,苏联经济的剧烈转型以及对新型政治与社会制度的探索吸引了工党内部的广泛兴趣与赞誉;尽管 1939 年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引发了不安,到了 1941 年,战争中的苏联又重新成为工党称颂的对象。^④总体来看,工党与苏联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复杂却密切的互动轨迹,既有理想主义的认同,也有现实政治下的波动。然而总体而言,工党在英国政党体系中始终展现出比自由党和保守党更为积极的对苏态度。

英国工党一向有一种倾向,即放眼世界,从其他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政党中汲取经验教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曾被视为工党组织建设的典范;而在

^① Rhiannon Vickers, *The Labour Party and the world, volume 1 (The Evolution of Labour's Foreign Policy, 1900-51)*,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47.

^② Iain Dale, ed., *Labour Party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s: 1900-1997*,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51-52.

^③ Bill Jones, *The Russia complex: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and the Soviet Un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7, Preface, vii.

^④ Ibid., vii.

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在原沙皇俄国的建立进程迅速吸引了工党的关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苏联逐渐成为塑造工党政治思想的重要参照对象。苏联政权的社会主义实验及其对战后世界秩序的影响，对工党的政治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①1917年2月俄国第一次革命后不久，英国劳工组织在伦敦阿尔伯特音乐厅举行盛大集会，一万两千多人一起高呼支持革命，并一致投票向俄国人民致以贺电，表达对旧政权终结的欢迎和对新政权的认同。^②这种情绪在随后数月中持续升温。5月，彼得格勒苏维埃推动临时政府向协约国发布关于战争目标的声明，呼吁“尽快实现全面和平”，并强调不以吞并、赔款或领土扩张为目标。紧接着，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宣布有意召开一次国际社会主义者大会，邀请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代表前往斯德哥尔摩，试图“通过国际无产阶级的努力完成俄国革命所开启的和平事业”。面对这一倡议，英国工党执行委员会决定推迟原定的协约国间工人会议，并派遣代表团（包括麦克唐纳等人）前往彼得格勒了解苏维埃的具体意图。在工党内部，以阿瑟·韩德逊为首的领导层最初积极推动参会，认为此次会议不仅有助于巩固俄国革命中的温和派势力，还可能有效遏制德国在和平议题上的单边主导地位。在韩德逊推动下，工党通过党内投票表决，最终以184.6万票赞成、55万票反对的结果决定组建代表团。然而，这一决定遭到英国政府的强烈反对。时任首相劳合·乔治以“战时不得与敌国接触”为由，拒绝为代表团签发护照，并迫使工党撤回决定。^③1917年6月，来自英国各地的一千多名社会主义者齐聚利兹，参加一场特殊会议。这场会议旨在庆祝沙皇制度的终结，也标志着俄国事件对工党思想（尤其是对外政策）产生了催化作用，英国工党与苏联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④《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称此次集会为“英国劳工运动首次通过代表大会的形式，对俄国社会主义者的成就表达无保留的赞许”。^⑤麦克唐纳出席会议并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向俄国革命致贺，并断言这将使“主动权重回英国有组织的劳工手中”。工党机关报《劳工领袖》（Labour Leader）也称利兹会议为“英国劳工运动的壮丽示威”，其中将格拉斯哥誉为“英国的彼得格勒”，并声称：“格拉斯哥与彼得格勒、克莱德河与涅瓦河……通过国际兄弟情谊紧密相连”。^⑥

随着布尔什维克于1917年11月夺取政权，并宣布即将开始和平谈判，工党内部对自由

^① Jonathan Davis, “Labour’s political thought: the Soviet influence in the inter-war years,” in Paul Corthorn and Jonathan Davis, eds.,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and the Wider World: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London: I.B. Tauris, 2008, p.64.

^② Stephen R. Graubard, *British Labour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192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1956, p.18.

^③ Stephen R. Graubard, *British Labour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192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1956, p.22-31.

^④ Bill Jones, *The Russia complex: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and the Soviet Un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7, Preface, p.1.

^⑤ Ibid., p.66.

^⑥ Ibid., p.66-67.

党政府的对外政策愈发失望。12月，工党召开会议并于28日发布了战争目标声明，明确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战争，呼吁建立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国际高等法院（International High Court）与国际立法机构（International Legislature），并谴责帝国主义扩张动机。^①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成功在思想上也极大鼓舞了工党内部的左翼力量。列宁提出的“工人享有其全部劳动成果”、“工人应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等口号，后来成为1928年工党党纲“第四条”（Clause IV）的核心内容之一。苏维埃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由此开始影响工党的理念与政策构想，尤其在一战结束后这一趋势愈发明显。同时，英国政府在苏波战争中的立场，进一步引发了工党对苏联的同情与声援，集中体现为“别碰俄国”（Hands off Russia）运动。运动中最为典型的事件，是伦敦码头工人拒绝将军火装上前往波兰的“乔利·乔治号”（Jolly George）货船，从而拒绝协助协约国支持的反布尔什维克军事干预。^②后来，英国工会大会（TUC）与工党代表团于1920年两度访问苏联，并受到苏联政府接待。彼时苏联宣称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工党对此表示浓厚兴趣，尽管对其“社会主义”的定义并不完全认同。俄国的实践模式受到党内众多理论家与理想主义者的关注，部分工党成员希望借鉴其制度设计来破解资本主义困境。访问苏联的人员回国后撰写的书籍、文章与报告也为工党在二战前后制定其社会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③

麦克唐纳政府组阁上台执政后，在对外政策上的一大举措就是对苏联给予正式的外交承认。这项承认于1924年2月1日实施，仅比工党上台晚了一个多星期。作为承认进程的一部分，麦克唐纳邀请苏联代表来伦敦出席一场会议，讨论一项拟议的承认条约。该条约内容包括：为苏联提供贷款、对俄国革命期间及其后遭受损失的英国债权人给予赔偿、以及英俄贸易的基本框架。^④对于麦克唐纳来说，解决英国国内的失业问题并通过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协助稳定战后的欧洲和平是他最关心的问题，而苏联是实现这一外交与经济战略的关键一环。因此，他认为恢复与克里姆林宫的经济与外交关系至关重要。他曾对苏联驻英代表赫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表示：“我多年来一直主张承认苏联政府，因此今天在这里接待您，对我而言是个人的满足。”麦克唐纳的行动得到了苏联方面的赞扬。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马克西姆·季维诺夫（Maksim Litvinov）在《真理报》上表示，麦克唐纳不仅理解苏联政府所面临的外交问题，而且得出了恰当的结论。^⑤虽然麦克唐纳在对苏联的外交

^① Stephen R. Graubard, *British Labour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192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1956, p.47.

^② Jonathan Davis, “Labour’s political thought: the Soviet influence in the inter-war years”, in Paul Corthorn and Jonathan Davis, eds.,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and the Wider World: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London: I.B. Tauris, 2008, pp.67-68.

^③ Ibid., p.71.

^④ Rhannon Vickers, *The Labour Party and the world, volume 1 (The Evolution of Labour's Foreign Policy, 1900-51)*,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p.89.

^⑤ Jonathan Davis, “Labour’s political thought: the Soviet influence in the inter-war years”, in Paul Corthorn and Jonathan Davis, eds.,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and the Wider World: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ism and*

承认上所持的是一种更为务实的立场,更多是将苏联视为战后英国经济复苏的潜在贸易伙伴,而非出于简单的意识形态上的社会主义认同,但英国工党政府依然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正式承认苏联的西方政权。虽然在英苏关系方面未取得具体成果,但能与一个“被放逐的国家”进行谈判,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突破。从外交实践效果来看,此举在当时被广泛解读为英国工党与苏联关系密切的象征,不仅引发国内右翼舆论的强烈反弹,也为保守党日后利用“季诺维也夫信件”等事件发起政治攻击、质疑工党“亲共”立场提供了便利条件,间接促成了工党政府在执政仅九个月后即被迫下台的结局。

1927年英国与苏联断交后,工党明确表示,将在有机会时恢复外交关系并重启贸易谈判。《工党与国家》(Labour and the Nation)指出,工党政府将继续反对苏联干预他国内政,但也将立即采取措施与苏联建立外交和商业关系,“通过条约或其他方式解决任何未决问题,并尽一切努力促进与苏俄贸易的复兴”。^①工党1929年大选宣言亦宣称将恢复与克里姆林宫的外交和经济联系。^②《新领袖报》(The New Leader)呼应了麦克唐纳的期望,呼吁恢复外交关系:“首先,这是正义与常识的基本体现;其次,俄国贸易的发展迫在眉睫;第三,与俄国恢复正常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③

1929年工党重返执政,而之前一次与苏联的外交接触恰好就为其积累了与克里姆林宫打交道的宝贵经验。彼时,已经有更多工党人亲身见证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进程,例如沃尔特·西翠恩(Walter Citrine)于1925年访问苏联,乔治·兰斯伯里(George Lansbury)则在1926年前往。这些代表团的报告增进了工党对苏联体制的了解,并鼓舞了那些希望让苏联“回归国际社会”的工党成员。这份报告还丰富了工党的经济构想,因为苏联经济当时已摆脱战时共产主义的极端状态,并转向一种更为混合的经济形态,即“新经济政策”(NEP)。根据该政策,苏联经济中重新引入一定程度的私人贸易,同时国家仍然控制着“经济的制高点”,如大型战略性工业、银行业和交通运输业。与1920年战时共产主义仍盛行时相比,工党的访苏者们普遍认为此种转变是一个进步。他们将新经济政策视为苏联政权的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组成部分,称其“具有真正的活力,并激发了和平所带来的经济复苏”。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的理念在工党内部日益获得支持,人们认为战争时期的经验表明,相较于市场机制,经济规划更加有效可靠。^④所以,当工党面对1929年“大萧条”下国内无力扭转

Foreign Policy, London: I.B. Tauris, 2008, p.69.

^① Labour Party (Great Britain), Conference, “Labour and the Nation,” *Report of the 28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Labour Party*, London: The Party, 1928, p.49.

^② Iain Dale, ed., *Labour Party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s: 1900-1997*,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35.

^③ Jonathan Davis, “Labour’s political thought: the Soviet influence in the inter-war years”, in Paul Corthorn and Jonathan Davis, eds.,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and the Wider World: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London: I.B. Tauris, 2008, pp.70-71.

^④ Ibid., pp.69-70.

的经济持续恶化的颓势时，苏联在经济社会领域的重大进步及其构建新社会的雄心，为马克思主义解决方案提供了有力佐证，工党内部有影响力的派系开始将苏联视为资本主义废墟中唯一进步的经济力量。此时，访问俄国不再如 1920 年代般招致社会污名，相反，批评布尔什维克国度者更可能被排斥。^①

1929 年第二次组阁时，麦克唐纳再次任命韩德逊为外交大臣，延续 1924 年确立的亲苏外交方针。彼时，苏联庞大的市场仍被视为纾解英国经济困境的重要契机，而与克里姆林宫合作而非对抗，则被视为维护欧洲和平与稳定的现实选择。韩德逊既具备对俄事务的深刻理解，又坚定支持通过国际联盟实现集体安全的理想，这一背景深刻影响了工党政府在 1931 年倒台前的对外政策取向。他明确指出：“拥有庞大人口的俄国不可能被永久忽视；只有通过与其建立外交及其他形式的交往，才能将其重新带回国家大家庭之中。”^②尽管面临国内政治结构和社会舆论的多重阻力，韩德逊始终坚持推进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他的对苏政策主要包含两个维度：其一是在短期内推动双边贸易以缓解国内经济压力；其二是在长期层面促成苏联加入国际联盟，以增强该组织的代表性与维稳功能。1929 年 11 月，英国议会批准恢复与苏联的正式外交关系，实现了韩德逊政策的关键突破。苏方任命格里戈里·索科尔尼科夫为驻英大使，而亨德森则出于务实考量，未选择党内人士，而是委任资深职业外交官埃斯蒙德·奥维爵士出任驻苏大使。^③据学者安德鲁·威廉姆斯指出，奥维在后续塑造工党政府对苏态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为政府提供了持续而可靠的信息来源，也对部分工党知识分子的亲苏倾向产生了深远影响。^④在外交关系正常化的基础上，亨德森于 1930 年 4 月与苏方签署贸易协定。根据协议，苏联将从英国进口价值 700 万英镑的商品，同时向英国出口高达 3400 万英镑的苏联产品。^⑤

1931 年选举失败后，工党展开党内重组。安德鲁·索普指出，党当时面临三条路径：将失败视为偶发事件；坚持渐进式改革但需澄清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或转向激进路线，抛弃麦克唐纳式的“和平演进论”。^⑥最终，工党选择了第三种道路。大萧条令渐进主义显得苍白无力，党内左翼将失败归咎于妥协资本主义的政策，这种观点被广泛接受。^⑦在这样一个激进氛围中，苏联社会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吸引力，不少工党成员开始亲自前往苏联，试

^① Neal Wood, *Communism and British Intellectua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43.

^② F. M. Leventhal, *Arthur Henders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55-156.

^③ Jonathan Davis, "Labour's political thought: the Soviet influence in the inter-war years", in Paul Corthorn and Jonathan Davis, eds.,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and the Wider World: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London: I.B. Tauris, 2008, p.72.

^④ Andrew J. Williams, *Labour and Russia*,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28-129.

^⑤ Jonathan Davis, "Labour's political thought: the Soviet influence in the inter-war years", in Paul Corthorn and Jonathan Davis, eds.,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and the Wider World: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London: I.B. Tauris, 2008, p.72.

^⑥ Andrew Thorpe, *Britain in the 1930s: the Deceptive Decad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p.26

^⑦ Ibid., p.27.

图从中寻找摆脱困境的制度样本。其中，道尔顿（Dalton）于1932年7月以新费边研究局（NFRB）代表团成员身份访苏，这次经历“比他生命中的任何其他事件更深刻地改变了他对内政的看法”，因为在此之前，他“几乎没有认真考虑过重构经济的可能性”。^①此次访问对道尔顿本人及工党经济理念的影响深远。他所体验的苏联经济体制格外重要，因为他日后担任艾德礼战后政府财政大臣时，决然抛弃了斯诺登的经济正统思想，转而支持国家对经济的干预。^②在访问结束后，新费边研究局代表团发表了《苏联十二项研究》（*Twelve Studies in Soviet Russia*）报告，详述计划经济的运作方式。工党在1934年发布了纲领《为了社会主义与和平》（*For Socialism and Peace*），强调计划的重要性，以及建立社会化工业基础的必要性。钢铁、煤炭和水等主要产业的公有制已成为工党的正式主张。^③尽管该文件中并未直接提及苏联的计划，但其影响显而易见，毕竟这份文件正是由道尔顿起草的。总体而言，1930年代的经济困境激发了工党内部围绕计划经济的广泛讨论，多样的政策模型探索与剧烈的时代变革，最终促使工党确立起统一而明确的行动纲领。在这一过程中，苏联的实践经验发挥了重要影响。对多数工党成员而言，苏联不仅是计划经济的现实范例，更展现了通过国家干预重塑社会结构的可能性。正因其成功摆脱经济危机的现实成效，苏联模式成为工党构思“计划”理念的重要参照。在此背景下，工党与苏联的联系日益密切，党内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与好感不断上升。众多工党理论家和领导人亲赴苏联考察，积极汲取其制度设计和经济建设经验。

然而，二战的爆发使苏联在工党心中的形象一度崩塌。对于长期以来将与苏联合作视为集体安全战略支柱的工党及工会领导人而言，1939年苏德在莫斯科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无异于一次深刻的背叛。《每日先驱报》严厉指责苏联“在关键时刻临阵脱逃，选择与侵略成性的纳粹主义结盟”，^④“甚至比慕尼黑事件对和平和欧洲自由的背叛更大”。然而，这种谴责的性质很有启发性。其敌对语气仅限于条约本身，几乎没有提到对苏联本身的批评，好像它最近的行为是偶然的，是一个不幸但短暂的失常。^⑤苏联随后入侵芬兰，情感联系几乎彻底破裂，谴责几乎是普遍的。工党全国劳工委员会对此表示“深切的恐惧与愤慨”，道尔顿更在下议院谴责其为“一场不可原谅的侵略”。工党还出版了题为《芬兰：斯大林与

^① Ben Pimlott, *Hugh Dalton*, London: Jonathan Cape Ltd, 1985, p.208.

^② Jonathan Davis, “Labour’s political thought: the Soviet influence in the inter-war years”, in Paul Corthorn and Jonathan Davis, eds.,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and the Wider World: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London: I.B. Tauris, 2008, p.75.

^③ Labour Party (Great Britain), Conference, “For Socialism and Peace: the Labour Party’s Programme of Action,” *Report of the 34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Labour Party*, London: The Party, 1934, p.6.

^④ Bill Jones, *The Russia complex: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and the Soviet Un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7, Preface, p.34.

^⑤ Michael. R. Gordon, *Conflict and Consensus in Labour’s Foreign Polic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88.

希特勒的罪恶阴谋》的小册子，公开将斯大林定位为希特勒的同谋。^①但是 1941 年 6 月 22 日，希特勒入侵苏联，打破了此前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从这一时刻起，苏联成为反对纳粹主义斗争的盟友，斯大林呼吁立即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以减轻红军在本土与德军作战所承受的压力。“今日苏联协会”这一共产党组织发起了呼吁英国政府开辟第二战线的运动，并在全英国范围内举行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集会。在工党内部，这一运动由奈·贝文（Nye Bevan）领导，他与共产主义者同台演讲，违反了工党的相关规定。^②尽管围绕第二战场的争议凸显了工党内部对苏联的分歧，但苏联在战争中表现出的牺牲精神与军事承受力，极大提升了其在英国舆论中的形象。工党领导层虽对亲苏情绪保持警惕，却也逐渐认识到与苏联合作在战后重建中的潜力。在工党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构想中，越来越多的言辞强调战后国际合作与经济规划，并主张建立以社会主义民主理念为基础的新国际体系，其中与苏联的合作被视为实现“新世界秩序”的重要一环。

综上所述，工党与苏联的关系是一种介于理想主义认同与现实政治考量之间的复杂互动。从最初对俄国革命的热情支持，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两度推动外交承认，再到对苏联经济与社会实验的密切关注，工党始终保持着相较于其他英国主流政党更为开放与积极的对苏态度。尽管其对苏联模式的认同并不意味着完全接受布尔什维克路线，但苏联的存在显著影响了工党的政策理念与国际视野。20 世纪上半叶，工党与苏联曾经历一段相对友好的“蜜月期”，在文化、学术及工会网络层面建立起多层次的互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也长期被工党视为探索自身政策路径的重要参照对象，尤其是在社会福利、计划经济与国家干预等议题上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启发。

^① Ibid., pp.35-36.

^② Rhiannon Vickers, *The Labour Party and the world, volume 1 (The Evolution of Labour's Foreign Policy, 1900-51)*,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45.

第二章 英国工党在冷战形成过程中的对外政策

冷战初期的国际秩序并非在战后立即成型,而是在一系列区域危机与政策选择中逐步明确。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成立,是这一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作为西方国家在和平时期首次缔结的军事联盟,北约不仅标志着美欧关系的制度化整合,也象征着以苏联为潜在敌手的集体安全结构正式建立,从而确立了冷战时期西方阵营的战略框架。自此之后,国际关系的基本分野不再是战时盟友之间的合作机制,而是以意识形态与安全利益为基础的集团对抗结构。在这一背景下,英国工党政府的对外政策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本章将以1949年北约成立为重要时间节点,依时间顺序梳理工党在战后初期的外交路线演变,分别考察其在北约建立之前的亲苏与和解倾向,以及在北约成立过程中的政策调整与安全战略重塑,进而揭示工党政府对外政策转向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节奏。

第一节 北约建立前工党的对外政策

一、战后初期工党内部的亲苏氛围

1945年战争结束的钟声响起之际,胜利的余音与和平的希望在英国回荡。对于刚刚赢得大选、走上执政舞台的工党而言,这不仅是国内变革的契机,也是一种国际愿景的延伸。苏联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盟友,在工党许多成员眼中,并非威胁的来源,而是建设和平秩序的伙伴。艾德礼在《工党的展望》中谈到对外政策时指出:“如果工党在我们这个国家当权,它就能够与法国和苏联以及那些主要受社会主义精神鼓舞的小国一同遵行一种以丰富利用而不以充分限制为基础的国际经济合作政策,这个政策将迅速地影响世界经济情况。”彼时的工党政府中,不乏对莫斯科抱有好感与信任的声音,一种对战后大国合作、英苏协作的乐观情绪,弥漫在政界与舆论之间。

长期以来,工党内相当一部分议员始终坚信,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以殖民扩张与市场争夺为导向,其结构性逻辑最终导致帝国主义战争。在这一视角下,对外政策被视为国内制度的延伸:只有打破资本主义体制,才能终结战争循环。因此,社会主义政府应与理念相近的国家,尤其是苏联,开展合作,共同推动集体安全与国际工人运动。这种世界主义理想激发了战后初期对联合国的广泛期待,不少工党议员在其就职演说中表达了对建立“世界政府”机

制的热情，并将其视为实现持久和平的关键路径。^①工党的许多演说者也开始强调，英苏合作的未来系于工党能否在战后第一时间执政。他们认为，丘吉尔必须立即下台，否则一旦欧洲旧秩序崩溃，保守党可能因恐惧革命浪潮而铤而走险，试图通过武力重建防线、限制苏联的影响。避免这一“反动的后卫战”就成为了工党的历史使命。要赢得这场斗争，工党必须说服民众：唯有自己的胜利，才能保障对苏友好与持久和平。这一理念也被凝练为一句在1945年大选前广为流传的口号，即贝文在布莱克浦会议上提出的“左派理解左派”（Left understands left）。^②《每日工人报》7月9日则引用了贝文的观点，称俄罗斯人无疑会更喜欢工党政府，因为“左派能够以同志情谊和信任与左派交流”。^③

在战后最初的几个月里，随着社会主义意识不断强化，工党议会党团内部对美警惕的情绪也在迅速蔓延。对许多社会主义者来说，美国作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代表，其经济与外交力量与社会主义道路存在结构性矛盾。W.G.科夫在1945年9月的论述尤为典型，他警告说：“如果工党政府与美国结盟，社会主义将在英国灭亡——因为我重复一遍，美国已经变成了侵略性的帝国主义。”^④1945年8月租借法案的突然终止，左翼广泛地将其解释为试图摧毁英国社会主义的早期发展。12月的英美贷款协议附带苛刻条件，引发《论坛报》将其斥为“野蛮的交易”，《新政治家》则称其为“对美国资本主义的毁灭性绥靖”。^⑤相较之下，苏联在社会主义外交设想中的地位更为核心。工党左翼普遍认为，苏联在战争中表现出的牺牲与胜利证明了其计划经济体制的优越性；1939至1941年间的对德协议被解读为战术权宜，而非价值背叛。即便芬兰战争与波兰问题在道义上引发一定疑虑，但随着工党在英国实现社会主义的胜利，这些问题被有意识地边缘化了。在许多新议员看来，现在正是与苏联“重新开始”的良机，一个在社会主义价值观引导下的英国政府，理应能够舒缓苏联的不安，实现彼此互信。即使面对苏联在东欧的控制扩张，也常被工党内部解释为对美帝国主义压力的“自卫性回应”。^⑥

工党政府上台执政初期，议会内部亲苏立场屡见不鲜。1945年11月22日的议会外交事务辩论中，英苏关系成为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大卫·柯克伍德（David Kirkwood）明确指出，英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个对外政策的构建，必须以一个令人信服的基础为前提：“我们必须尊重并承认这位伟大盟友的正当利益，同时也应要求对方对我们的利益予以

^① Bill Jones, *The Russia complex: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and the Soviet Un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05-106.

^② Michael R. Gordon, *Conflict and consensus in Labour's foreign polic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89-90.

^③ Ibid., p.99.

^④ Bill Jones, *The Russia complex: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and the Soviet Un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06.

^⑤ Ibid., p.106.

^⑥ Ibid., p.107.

相应尊重。”弗雷德·李 (Fred Lee) 则强调, 工党议员普遍支持对苏友好立场: “我们的席位上坐满了议员, 而他们显然不会参与任何孤立苏联的阴谋, 也不会支持任何不切实际的对苏政策。”托马斯·弗雷德里克·皮尔特 (Thomas Frederick Peart) 则进一步申明英苏合作的必要性。他指出: “战争中建立的伟大联盟必须延续下去, 但我们对苏联的友谊不能仅停留在消极姿态, 而应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推动落实。我们与苏联签署的《友好条约》不能沦为空文, 而应转化为实质性的政策。”他警告称, 议会必须“拒绝任何企图建立英美集团、对抗苏联的企图”, 因为这种集团政治将破坏战后和平秩序的构建。弗雷德里克·科克斯 (Frederick Seymour Cocks) 对西方在巴尔干事务中的干预表示担忧, 认为此类行为正在侵蚀英苏关系, 阻碍整个欧洲的重建进程, 并使工党在竞选中承诺“推动与苏联的友好合作”流于空谈。“没有什么比建立在战时同盟基础上的友谊更短暂易逝; 而只有基于共同信念与共同利益的合作关系, 才最为稳固持久”。^①在次日的对外政策辩论中, 欧内斯特·罗杰斯·米林顿 (Ernest Rogers Millington) 提出,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政府, 英国必须以鲜明的反帝国主义立场来重建对苏信任。他呼吁工党政府以“同志与兄弟”的姿态对苏联释放善意, 阐明以社会主义原则推动国际合作的意图, 以此缓和敌意、修复双方关系。孔拉德·齐利亚库斯 (Konrad Viktor Zilliacus) 则从意识形态出发强调, 只有承认欧洲范围内社会革命与左翼力量的现实, 才能在对苏关系中确立共同的社会目标, 从而使和平成为可能的国际政策。他进一步指出, 在此基础上, 欧洲的统一、重建与稳定才具备现实基础, 西欧民主国家的联合亦方有可能在苏联参与及英美支持下实现。他坚信, 唯有坚持工党长期承诺的社会主义外交路线, 英苏之间的僵局才有可能被打破; 否则, 无论联合国机制, 还是全球和平秩序的建设, 都将沦为空谈。^②可以看出, 工党内部的亲苏声音不仅源于战时结盟所建立的情感纽带, 更深植于对社会主义国际合作的理想追求。许多普通工党议员都主张延续与苏联的合作关系, 反对冷战式的集团对抗与外来干涉, 强调应将意识形态上的共鸣转化为具体可行的外交实践。对于他们而言, 这不仅是兑现竞选承诺的政治责任, 更是塑造战后国际秩序、实现持久和平的现实路径。

二、工党领导层的现实主义转向

尽管战后初期工党内部普遍弥漫着对苏联的好感与亲近情绪, 但党内领导层, 尤其是曾在战时联合政府中担任部长的成员, 早已在执政实践中对对外政策形成了更为现实的认知。

^① House of Commons Hansard, Commons Sitting of Thursday, 22nd November, 1945, Volume 416, Retrieved from <https://parlipapers.proquest.com/parlipapers/docview/t71.d76.cds5cv0416p0-0004?accountid=13151>, 访问时间: 2025 年 4 月 20 日。

^② House of Commons Hansard, Commons Sitting of Friday, 23rd November, 1945, Volume 416, Retrieved from <https://parlipapers.proquest.com/parlipapers/docview/t71.d76.cds5cv0416p0-0005?accountid=13151>, 访问时间: 2025 年 4 月 20 日。

1940年前,他们大多活跃于一个从未以绝对议会多数执政过的反对地位、缺乏稳定执政经验的政党之中,习惯于以理想主义和道德立场批判当权者。然而,联合政府的参与改变了一切——他们从反对派走上权力中枢,成为国家治理的参与者,被迫面对战争时期纷繁复杂的行政事务,也直接卷入涉及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决策。^①这样的经历迫使工党的领导层在执政后重新审视既有的社会主义外交理念,将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置于首位,直面国际体系中赤裸裸的权力现实。对外政策不再是推动社会主义改革的工具,而成为保障国家生存与实力的关键手段。国际体系不再是可以道德批判的抽象对象,而是一个必须理解、应对、甚至操控的现实结构。在这种新语境下,如果工党的传统外交理念无法应对战争带来的新局势,无法提供深刻分析或切实方案,便会被视为无关紧要甚至有害的包袱。

1945年4月,贝文在利兹的演讲中表达出“外交与国防政策超越党派斗争”的个人立场,他强调:“在国防、外交及国际关系问题上,我认为国家意志需要整体表达,各方需共同努力……我甚至不反对向反对党领袖公开所有相关文件,以确保各党基于事实做出正确决策。”^②随后的5月,工党在布莱克浦召开年度代表大会,尽管整体氛围笼罩在对战争即将结束与欧洲重建的乐观预期中,但艾德礼和贝文的发言却展现出不同寻常的克制与警醒。艾德礼在会上力图抑制那种过度理想化的情绪,提醒代表们切勿忽视现实挑战。他指出,旧有的猜疑和分歧依然存在,和平的实现仍需面对意识形态、历史经验与国家利益的根本差异。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合作的目标虽值得追求,但在真正实现前,仍需保持必要的警惕与战略清醒。“总有一天世界也许能摆脱武装力量”,他说,“但那一天远未到来”。^③贝文则更为直接地表达对国际政治现实的担忧。他承认战后欧洲确有激进变革趋势,但强调即便在革命浪潮中,政策制定者仍必须立足于地缘战略、国家利益与现实力量对比。他批评将经济理论或意识形态教条作为判断国际标准过于危险,尤其反对将苏联无条件视为同志国家的盲目倾向。他明确表示:“英苏关系的未来不仅取决于我们的善意,还取决于苏联的态度。若苏联继续在外交谈判中以既成事实迫使我们接受,其结果只能是加深猜疑。”贝文还严厉批评了党内某些人为苏联在东中欧行径辩护的做法,并重申工党对集体安全体制的承诺,“这意味着承担责任,而不是回避现实”。^④甚至有学者指出那句“左派理解左派”的口号,贝文事实上指的是当时法国政治中的左倾趋势,尽管大多数代表回忆起这件事时并不是这样认为的。他们确信他指的是苏联。^⑤担任外交大臣后在下议院的首次演讲中,贝文更是表示倾

^① Michael R. Gordon, *Conflict and consensus in Labour's foreign polic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91-92.

^② Alan Bullock, *The Life and Times of Ernest Bevin: Minister of Labour 1940-1945 (Volume 2)*,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67, pp.349-350.

^③ Michael R. Gordon, *Conflict and consensus in Labour's foreign polic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97.

^④ Ibid., pp.97-98.

^⑤ Ibid., p.98.

向于“延续”前任的外交方针的立场。^①多年后，内政大臣赫伯特·莫里森曾坦言：“当一个人成为大臣时，首先学到的一件事……就是你会接触到许多你宁愿不知道的事实，但这正是理解政府现实的一部分。”^②财政大臣克里普斯是另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战前，他曾是社会主义对外政策的坚定拥护者；然而在政府工作期间，他的立场发生了与其他阁员类似的转变。到1945年时，“他的对外政策观点已与贝文高度一致”。事实上，这种一致性甚至早于贝文出任外交大臣，因为克里普斯是少数几个在战时联合政府中公开支持希腊政策、尽管该政策在党内受到广泛批评的工党议员之一。^③

1945年7月在大选中胜利首次成为多数党上台执政的艾德礼政府，其参与的第一个重大外交事务便是波茨坦会议。尽管工党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倾向左翼，但其对苏联的外交态度却展现出显著的警惕与克制，这一点在会议期间关于东欧问题的讨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8月1日最后一次的会议记录显示，英苏之间的矛盾在波兰边界问题上已经浮现。针对苏联提出由苏联与波兰专家单方面勘定柯尼斯堡及周边地区边界线的建议，贝文明确表示反对，强调边界划定应待和平会议决定，不能由苏联与其扶植的波兰临时政府私下决定。艾德礼本人也指出，“边界的最终确定必须经由多边审议程序完成，不能先入为主地规定由谁进行勘界。”这一立场体现了英国对苏联在东欧扩张行为的深切忧虑，并试图通过坚持多边主义和程序正当性来加以制衡。此外，双方在关于战败国加入联合国以及恢复外交关系的问题上也出现明显分歧。当苏联代表莫洛托夫主张取消关于“签署和平条约之后”方可恢复外交关系的表述时，艾德礼坚持认为“应保持先前协议中的表述一致性”，并强调“正常关系”与“有限接触”不可混为一谈。斯大林对此表示不满，认为该措辞限制了现实中的外交安排，并威胁若英方不作让步将无法发布联合声明。尽管最终英国接受妥协修改了措辞，但这一过程充分揭示了艾德礼政府对苏联的深度戒备。^④贝文在会议上展现的强硬姿态，为未来数年的对外政策定下基调。贝文并未如“左翼理解左翼”情感所期待的那样主动争取苏联合作，亦未援引双方共同的社会主义背景。相反，他以近乎好斗的姿态捍卫英国利益，甚至令美国人怀疑能否与如此专横的外交大臣共事。^⑤可见，虽然艾德礼在波茨坦会议中中途接替丘吉尔代表英国，但其政府在对苏立场上并未出现根本性转变，反而在诸多关键议题上延续了丘吉尔政府

^① Alan Bullock, *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 London: Rowland Phototypesetting Ltd, 1983, pp.71-72.

^② Michael R. Gordon, *Conflict and consensus in Labour's foreign polic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92.

^③ Ibid., p.93.

^④ Record of thirteenth plenary meeting held at Cecilienhof, Potsdam, on Wednesday, 1 August 1945 at 1 0.30 p.m. London: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roquest.com/government-official-publications/record-thirteenth-plenary-meeting-held-at/docview/1923012536/se-2>, 访问时间: 2025年4月21日。

^⑤ Michael R. Gordon, *Conflict and consensus in Labour's foreign polic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103.

时期对苏联的战略戒备与制度约束思维。

随后在9月的伦敦三国外长会议上,贝文和莫洛托夫的争论也以戏剧化的方式暴露出了英苏之间的矛盾。围绕意大利殖民地的托管问题,莫洛托夫坚持苏联有权获得的黎波里塔尼亚,理由是意大利曾参与对苏侵略,苏方有权获得战后补偿。而贝文则明确反对,强调英国及其联邦在北非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牺牲与战略利益,并指出英国在安全问题上的立场与苏联在东欧主张的逻辑是一致的。^①这场争论不仅反映了双方在地缘政治利益上的碰撞,也揭示了英苏在战后秩序构想上的根本分歧。在关于芬兰和其他卫星国和平条约的讨论中,贝文主张通过限制军备、确保设立外交机构等方式建立和平的制度性保障,而莫洛托夫则反对任何可能损害苏联影响力的条款,强调不得“羞辱”芬兰,不应授予西方单方面的外交特权。^②在是否支持这些国家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双方更是互设条件、互不让步。贝文提议将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的入联与意大利、芬兰一并考虑,并强调应体现战后和解的普遍性原则,而莫洛托夫则明确表示,苏联只会在英国同意东欧国家加入的前提下,才支持意大利和芬兰的申请。他更指责英方试图用联合国席位作为政治交换工具,背离联合国宪章精神。贝文则反驳称苏联拒绝意大利入联不过是地缘政治操控的延续,质疑其和平意图。^③此外,在关于战后苏联国民遣返问题的讨论中,贝文坚持英国法律中关于个人申诉权与庇护权的原则,主张必须通过“共识”解决争议,并避免强制遣返。而莫洛托夫则要求将“所有苏联国民”无条件遣返,并批评英方“以法律为借口”庇护逃避者。^④苏联对巨额德国赔偿的要求、在波兰的行动,以及在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推动的政权更替——这些都加剧了本已脆弱的盟友关系,引发了日益加深的怀疑与紧张情绪。贝文与内阁特别警觉的是,苏联对南欧及地中海地区的强烈兴趣,这一问题自1943年起便困扰着英国政府。在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要求英国撤出该地区的大部分力量,并主张苏联控制土耳其海峡及接管前意大利的殖民地,这些提议的阴影随着时间愈发明显。当莫洛托夫在伦敦会议上再次提出这些要求时,贝文愤怒地将其与希特勒的行为相提并论。他多次明确表示,工党政府绝不会同意在没有条

^① Record of eleventh meeting of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 held at Lancaster House, London, on Wednesday, 19 September 1945, at 11 a.m., London: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roquest.com/government-official-publications/record-eleventh-meeting-council-foreign-ministers/docview/1923010124/se-2>, 访问时间: 2025年4月21日。

^② Record of thirteenth meeting of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 held at Lancaster House, London, on Thursday, 20 September 1945, at 11 a.m., London: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roquest.com/government-official-publications/record-thirteenth-meeting-council-foreign/docview/1923014862/se-2>, 访问时间: 2025年4月21日。

^③ Record of thirteenth meeting of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 held at Lancaster House, London, on Thursday, 20 September 1945, at 11 a.m., London: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roquest.com/government-official-publications/record-thirteenth-meeting-council-foreign/docview/1923014862/se-2>, 访问时间: 2025年4月21日。

^④ British record of twentieth meeting of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 held at Lancaster House, London, on Tuesday, 25 September 1945, at 11 a.m., London: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roquest.com/government-official-publications/british-record-twentieth-meeting-council-foreign/docview/1923016805/se-2>, 访问时间: 2025年4月21日。

件的情况下从地中海撤军，并在下议院宣布，苏联的政策意图“扼住英联邦的咽喉”。^①

工党能够感知到的来自苏联的威胁，成为促使其亲苏幻想加速破灭的催化剂。1946 年春的伊朗危机体现了这一点。根据 1942 年《三国条约》（Tripartite Treaty），英苏两国以战时援助为由分区占领伊朗，约定战后 6 个月内撤军。然而，随着二战结束，苏联不仅拒绝履行撤军承诺，反而通过支持伊朗阿塞拜疆省的共产主义分离运动（以“人民党”为代理人），试图在当地建立亲苏政权，并阻挠伊朗政府军进入该地区。1946 年 1 月，伊朗政府向联合国安理会控诉苏联违反《三国条约》与 1943 年《德黑兰宣言》，指控其“干涉内政”并“威胁伊朗主权”。^②对贝文而言，伊朗在英国与地中海和印度之间的通信中具有战略地位，且伊朗富含石油储备。此外，英国一直将伊朗视为抵御苏联在中东和印度势力范围扩张的缓冲地带。^③基于以上考量，贝文最初在 1946 年 1 月以前采取的是相对克制的双边外交路线，试图避免国际化处理。他希望通过与苏联直接谈判促使其按约撤军，并曾设想通过设立英、美、苏三国组成的委员会来调停争端，从而在不诉诸联合国的前提下解决问题。然而，伊朗政府于 1946 年 1 月主动将争端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迫使英国外交策略作出调整。贝文迅速转变立场，借助联合国这一多边平台来对苏施压。他认识到，这是一个引入美国力量、共同遏制苏联扩张的契机。^④对贝文而言，伊朗危机不仅是一次地区性外交事件，更是一次检验英国战后国际地位与影响力的重大考验。他深知，若在此事上退让，不仅将向苏联传递软弱信号，更可能在中东和英联邦内部引发连锁反应。因此，他将这场危机视为恢复英国“北方区域”（Middle East-North Area）战略影响力的重要起点。

1946 年 3 月 5 日，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是冷战意识形态两极化的一个里程碑。尽管艾德礼和贝文对此表示，丘吉尔的演讲是“以私人身份”发表的言论，工党政府对此既未事先知情，也不承担责任。^⑤但是根据贝文的私人秘书罗德里克（Roderick Edward Barclay）回忆，“很可能那时贝文先生已倾向于认同丘吉尔颇为悲观的评估。他随后的行动表明，他认为西欧受到了苏联侵略政策的严重威胁。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政变以及最终的柏林封锁，似乎证实了他对苏联意图的判断。贝文先生深知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国家在军事和经济上的薄弱，于是着手采取可行措施来改善这种状况，以抵制苏联的扩张。第一步是 1946 年 3 月签订《英法敦刻尔克条约》，不久后又签订了《布鲁塞尔

^① Michael R. Gordon, *Conflict and consensus in Labour's foreign polic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104.

^② Zulkanain Abdul Rahman, et al., eds., "Brita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Iranian Crisis of 1946," *Middle-East Journal of Scientific Research*, Vol.18, 2013, pp.1544-1555.

^③ Ibid., p.1548.

^④ Ibid., pp.1548-1554.

^⑤ Henry B. Ryan, "A New Look at Churchill's 'Iron Curtain' Speech,"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22, No. 4, 1979, pp.911-913.

五国条约》。诚然，起初表面目的是防止德国侵略倾向死灰复燃，但重点很快就变了。”^①

总而言之，战后初期的工党领导层在对外政策上的实际表现，已经显著偏离其传统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理念，而呈现出一种更为现实主义的政治姿态。他们不再试图通过国际合作实现意识形态的普世扩展，而是以权力均势与国家安全为核心，制定务实而强硬的战略选择。这种转向不仅构成了对工党一贯政治信条的修正，也从根本上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即使是以和平与合作为名的左翼政党，一旦进入现实的国际权力博弈场，也难以逃脱地缘政治逻辑的重塑与规训。

第二节 北约建立时期工党的对外政策

一、英美同盟的逐步建立

1946年2月，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发出“长电”，对苏联的扩张主义发出警告，这为美国对苏政策的改变提供了证据。同时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弗兰克·罗伯茨（Frank Roberts）也警告说，苏联的扩张主义可能是无止境的，尤其是在“印度和达达尼尔海峡之间对英国安全至关重要的整个地区”。^②战后苏联在东欧迅速推进势力范围、扶植亲苏政权的举措，以及在诸如联合国、欧洲复兴事务中的强硬态度和日益加剧的意识形态对抗，都使得工党领导层在外交实践中能感知到的来自苏联的扩张威胁越来越强烈。与此同时，伊朗危机中联合国安理会尽管说服了苏联撤军，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苏联违反国际法、采取恃强凌弱的策略。这使工党逐渐意识到，苏联并不具备推动联合国有效运作的合作精神，而联合国本身也难以成为工党实现其国际主义理想的集体安全平台。^③在工党眼中，苏联逐渐构成了对战后秩序的重大威胁，面对这一局势，遏制苏联已悄然成为英国外交的目标之一。然而，战后英国自身经济与国力的严重衰退，使其难以凭一己之力承担这一重任。在此背景下，工党领导层，尤其是外交大臣贝文愈发认识到，与美国结成更紧密的合作关系，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必要现实路径。基于这样的判断下，贝文主动寻求与美国在安全认知和战略布局上的协调，英美关系因此日趋紧密，冷战前夕的英美同盟由此逐步成型。

1946年年中，希腊内战不断升级，由希腊共产党领导的“解放”运动发起了推翻现有政府的新尝试。几个月内，这些被英国人谨慎地称为游击队的“匪徒”控制了许多农村地区，并且至少在美国观察家看来，似乎正在希腊建立一个亲苏政权。外交部的观点是，这些“匪徒”可能会导致现任内阁倒台，并被极右翼政府取代，进而引发一场重大危机。英国参谋长

^① Roderick Barclay, *Ernest Bevin and the Foreign Office 1932-1969*, London: Butler & Tanner Ltd, 1975, p.34.

^② John Callaghan, *The Labour Party and Foreign Policy: A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p.199.

^③ Bill Jones, *The Russia complex: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and the Soviet Un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26.

们认为,如果希腊军队在人员、资金和装备方面能够得到加强,那么在几个月的短暂而激烈的行动中,恐怖分子就可以被镇压下去。^①最初的观点是,英国应该在整个1947年继续为希腊军队提供资金。贝文最初的希望是保留部分援助作为与美国谈判的筹码,但最终迫于道尔顿的压力妥协。1947年2月18日,贝文与道尔顿达成协议,同意全面撤出对希腊的援助。^②2月20日,贝文在给驻华盛顿的大使英弗查佩尔勋爵(Lord Inverchapel)的信中表示:指出英国难以继续对希腊提供财政援助,并呼吁美方接手责任。他强调,若要维持对希腊的有效支持,美国必须自4月1日起承担原由英国负担的财政开支,并尽快明确援助计划,以便希腊能在军事与经济上作出决策,确保国家稳定。^③2月21日,英国正式通知美国将停止援助,并要求美国立即接手。不出所料,2月26日美国政府认定除提供援助别无选择。3月1日,艾奇逊召见因弗查佩尔告知此决定。两份备忘录,其一强调英国继续提供临时援助对避免希腊崩溃的重要性;其二表明美国将此视为更大问题的一部分,涉及欧亚其他国家共同关切,提议两国就这些问题展开非正式对话。这一点极为重要,因弗查佩尔当天下午致电艾奇逊询问详情,这为英国影响美国对外政策提供了契机,此类对话早于五角大楼会谈及马歇尔计划相关讨论。^④3月12日由杜鲁门总统在国会发表演说,宣布对希腊和土耳其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杜鲁门主义”随即正式出台,正式标志着美国从孤立主义转向全球干预,公开将遏制苏联扩张作为对外政策核心,冷战由此全面展开。

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阿瑟·克罗克所引述,杜鲁门一直等待一个“适合时机”来推出新的全球战略,而希土危机恰恰成为这一时刻的触发点。而这个“适合时机”的塑造者,正是贝文。^⑤其传记作者威廉姆斯在回忆时指出,贝文发往华盛顿的电报是“精心设计”的声明,旨在使美国完全参与欧洲的防御,“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看到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促使做出一个决定,关于西欧乃至世界的命运都取决于此”。^⑥沃尔特·李普曼先生也表示,“美国在太平洋战争对抗日本时首次意识到自己是主要大国,但直到贝文呼吁干预希腊,美国才充分认识到这种首要地位所涉及的欧洲责任:这是美国对欧洲态度的决定性转折点。”^⑦从结果来看,在美国正式转向反苏立场、杜鲁门主义出台的关键进程中,贝文的作用不容忽视。

^① Robert Frazier, "Did Britain Start the Cold War? Bevin and the Truman Doctrine,"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27, No.3, 1984, p.718.

^② Ibid., pp.720-721.

^③ E. Bevin, To Lord Inverchapel, Washington tel. No.1634, 1947, London: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roquest.com/government-official-publications/lord-inverchapel-washington-tel-no-1634/docview/1923612213/se-2>, 访问时间: 2025年4月24日。

^④ Richard Q. Wevill, *Britain and America After World War II: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Cold War*, London: I.B. Tauris, 2012, pp.181-182.

^⑤ 滕淑娜:《试论二战后艾德礼工党政府的对美外交与“冷战”的起源》,《聊城大学学报》,2007年底4期,第46页。

^⑥ Francis Williams, *Ernest Bevin: Portrait of A Great Englishman*, London: Hutchinson, 1952, pp.263-264.

^⑦ Ibid., p.264.

希土危机为他提供了一个恰到好处的时机——既不为时过早，以至于美国准备不足；也不拖延至晚，以致苏联势力坐实扩张之势。贝文正是在这一微妙的历史节点上，以审慎而果断的姿态推动美国迈出全球干预的第一步。他不仅敏锐捕捉到美方战略犹豫的窗口，也成功借助英国“财政力竭”的现实困境，将对希腊的援助责任顺势“移交”给美国，从而促成后者战略角色的根本性转变。

1946年12月2日，美国与英国正式签署协议，决定合并两国的占领区，形成“双占区”（Bizonia）。1947年1月双占区正式生效，美国越来越多地为英国的占领行动提供支持。次月，美国接受了英国为希腊辩护的理由。10月，英国和美国的参谋长举行了秘密会谈，英方的核心观点是“英国人希望从美国人那里得到的是避免任何会破坏他们在中东地位的事情，并明确（例如向埃及人表明）他们支持英国人保留其地位而不是削弱其作用。特别地，他们认为避免与敌对的阿拉伯团体有联系，以及避免将该地区划分为势力范围，符合两国的利益。”^①从英国的角度来看，“美国政策已经明确倾向于支持英国政策。改变我们政策的不是美国人，而是我们为自己的立场争取到了美国的支持”，英国人越来越将自己西方抵御苏联的前卫。^②到1947年年中，贝文越来越相信，组织某种形式的西方联盟来反对苏联；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这一目标一直是他思想和行动的中心。^③

美国国务卿马歇尔1947年6月5日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表示西欧的经济困难期待美国引领，而且众所周知，华盛顿正在认真考虑一些新的举措，这些举措将满足美国政治状况的需求，同时为欧洲带来新的希望。^④在外交部与贝文密切合作的梅金斯表示，他（贝文）“在等待、在期待马歇尔将军在哈佛演讲中所做的那种行动，因此他准备好接过球并继续跑下去”。^⑤6月17日贝文在访问巴黎，与法国外交部交换意见，表示“我们双方都认识到马歇尔计划的重大意义以及采取主动和尽早准备一份关于实现欧洲重建必要步骤的报告的紧迫性。我们一致认为，这一主动行动应由欧洲各国政府在联合国框架外采取，因为将制定计划的任务委托给欧洲经济委员会只会导致延误”。^⑥贝文很快抓住机会向经济一蹶不振的欧洲提出了一项建议，并立即组织召开了一次欧洲国家会议。由于贝文的倡议，欧洲人很快就

^① Alan Bullock, *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 London: Rowland Phototypesetting Ltd, 1983, pp.472-473.

^② Peter Weiler, "British Labour and the Cold War: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Labour Governments, 1945-1951,"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26, No.1, 1987, p.70.

^③ Ibid., p.71.

^④ G. C. Marshall, Extract from Speech by Mr. Marshall, 1947, London: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roquest.com/government-official-publications/extract-speech-mr-marshall/docview/1923612307/se-2>, 访问时间：2025年4月24日。

^⑤ Richard Q. Wevill, *Britain and America After World War II: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Cold War*, London: I.B. Tauris, 2012, p.191.

^⑥ Bevin, E., Mr. Bevin secretary of state, No. 89 European Reconstruc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fer: report on the Secretary of State's visit to Paris on 17-19, June 1947, London: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roquest.com/government-official-publications/mr-bevin-secretary-state/docview/1923612252/se-2>, 访问时间：2025年4月24日。

能出一个全欧洲的重建计划和一份杜鲁门政府可以向国会推销的所需援助购物清单。^①

从英国的立场来看,马歇尔计划无疑是一项成功的援助举措,它不仅帮助工党政府维持了国内民众的生活水平,还使其得以继续推进一项雄心勃勃、耗资巨大的外交战略。贝文之所以迅速接受马歇尔的提议,不仅是因为英国亟需经济支持,更重要的是他借此推动美国对西欧作出更加广泛而深入的承诺——这一点始终是其对外政策的核心,同时还能对苏联发动冷战。他明确指出,这项援助将成为“打破铁幕最快的方式”,因为援助的吸引力有可能促使东欧国家脱离苏联轨道,转而靠拢西方。^②与此同时,马歇尔计划也促使工党内部部分原本亲苏的党员重新审视政府的对外政策。正如一位工党议员坦言:“过去六个月里,我对美国的看法有了显著变化,许多同僚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随着英苏关系日趋紧张,为了避免被贴上“同路人”的标签,那些曾对政府对外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左翼”异见者逐渐回归党内主流。他们开始收敛对外交路线的批评,转而承认接受马歇尔援助在经济上的现实必要性。^③有学者评价:“保持左翼”(Keep Left)保持着工党历史上最短命的左翼反叛记录,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援助彻底摧毁了它。^④

事实上,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工党并没有在杜鲁门主义出台之后就立即决定追随美国、彻底加入冷战阵营,而是采取了一种“既打又拉”的对苏政策。^⑤1947年6月27日,贝文主动邀请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赴巴黎,与英法两国外长共同商讨如何接受马歇尔计划,以推动欧洲经济重建。尽管会议因莫洛托夫的退出而无果而终,工党政府依然避免与苏联彻底决裂,并将希望寄托于同年11月即将召开的莫斯科外长会议。英国在美国率先吹响冷战号角之后,并未立刻转向全面对抗苏联,其原因不仅在于对国内舆论反弹的顾虑,更在于政府力图在美苏之间寻求一种“第三条道路”从而维护英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外交自主性。^⑥然而,这种折中策略随着1947年11月莫斯科外长会议的破裂而宣告破产,英国对外政策很快完全倒向美国一边,全面加入反苏的西方阵营。

二、北约的建立

1948年1月4日,贝文在致内阁关于英国对外政策首要目标的备忘录中直截了当地指出苏联已经在东欧筑起了一道坚固的“政治和经济防线”,苏联进一步侵蚀西欧的浪潮也难

^① Peter Weiler, *British Labour and the Cold War: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Labour Governments, 1945-1951*,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26, No.1, 1987, p.72.

^② *Ibid.*, p.72.

^③ Rhannon Vickers, *The Labour Party and the world, volume 1 (The Evolution of Labour's Foreign Policy, 1900-51)*,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72.

^④ Tony Cliff and Donny Gluckstein, *The Labour Party: A Marxist history*, London: Bookmarks Publications, 1996, p.248.

^⑤ 叶江:《战后英国工党政府与冷战起源(1945-1948)》,《史林》,1991年第1期,第68页。

^⑥ 同上,第68页。

以阻止，所以“必须组织和巩固西方文明内在的道德和精神力量”，而“这只能通过在欧洲西部创建某种形式的联盟来实现，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并得到美国的支持。”对此，他还指出：“苏联政府会对这项政策做出像他们对马歇尔计划那样野蛮的反应，这将被视为一个针对苏联的进攻性联盟。关于这一点，我只能说我所处的这种局面，半途而废是无用的。如果我们想同时保持和平和我们的安全，我们只能通过动员这样的道德和物质力量来实现，这将在一方创造信心和活力，在另一方激发尊重和谨慎。另一种选择是默许持续的俄罗斯渗透，无助地目睹一个又一个西方堡垒的逐步崩溃。”^①由此可见，贝文关于构建一个遏制苏联扩张的西方集体机制的设想，已逐步趋于明确和系统化。在他看来，面对苏联在东欧的全面渗透与西欧政局的脆弱不稳，英国不能再依赖传统的双边外交手段，而必须着手推动一种以“道德与物质力量”为核心、并由美英共同主导的集体安全框架。

贝文在内阁批准之后开始着手实现他的构想。他先后和法国、比荷卢进行了谈判。到1948年3月1日，外交部常任次长奥姆·萨金特爵士已开始考虑起草一份不排除德国或德国部分地区日后加入条约的可能性的草案。《经济、社会及文化合作与集体自卫条约》（the Treaty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Collaboration and Collective Self Defence）在短短两个月内就在布鲁塞尔谈判、缔结并签署。签署国承诺相互合作并致力于彼此的防御、经济合作并促进实现更高的生活水平。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CEEC）于3月15日在巴黎召开会议，计划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于次月成立，负责监督马歇尔计划的实施，此举紧随杜鲁门签署《对外援助法》使其生效之后。3月17日，比、法、卢、荷、英五国正式缔结同盟条约。^②

1948年7月中旬，法国政府垮台：法国两个月没有政府。德国在战后仍然处于动荡之中，没有中央政府。贝文成为唯一一位能够带领自己的国家，并在必要时代表欧洲利益与美国人对抗的西欧政治领袖。7月19日至20日，在海牙召开的布鲁塞尔条约协商委员会会议上，贝文进一步坚定了其战略判断：任何纯粹的欧洲组织都难以独立确保地区安全，英国必须在一个更广泛的大西洋框架下而非仅限欧洲范围内谋求安全保障。^③布鲁塞尔条约在华盛顿获得了积极回应，贝文乘势加紧对美加两国的外交努力，推动开启关于跨大西洋及地中海地区集体安全的正式谈判。1948年7月，美英之间开始进行初步接触，尽管双方在若干关

^① Bevin, E., Memorandum by Mr. Bevin for the cabinet of the first aim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4 January 1948, London: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roquest.com/government-official-publications/memorandum-mr-bevin-cabinet-first-aim-british/docview/1923012948/se-2>, 访问时间: 2025年4月24日。

^②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Ser.1, Vol.10, London: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roquest.com/government-official-publications/preface/docview/1923016452/se-2>, 访问时间: 2025年4月24日。

^③ Erica Peacock, One man's vision: Ernest Bevin and the creation of NA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4 April 2019, <https://blog.nationalarchives.gov.uk/one-mans-vision-ernest-bevin-creation-nato/>, 访问时间: 2025年4月24日。

键问题上存在分歧。贝文主要关注的是美国能否明确承诺为欧洲国家提供军事装备和支援，但美方坚持，欧洲各国首先必须协调其军事规划并实现标准化，美国方可考虑军事援助。美方明确拒绝在欧洲未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单方面承担安全责任。^①随着 1948 年 9 月美国总统选举临近，谈判被暂时搁置。杜鲁门于 11 月成功连任，并在竞选中强调遏制苏联扩张的必要性，将建立跨大西洋安全机制视为关键战略手段。随即谈判重启，最终谈判各方普遍达成共识：新联盟的构建必须超越布鲁塞尔条约原有的合作框架。12 月，北大西洋安全条约草案完成并分发各国审议。其中，第五条成为核心内容：“各方同意，在欧洲或北美对其中一方或几方的武装攻击应被视为对他们的共同攻击，因此，如果发生此类武装攻击，他们中的每一方，在行使联合国宪章第 51 条所承认的个人或集体自卫权时，将协助受到攻击的一方或几方，立即单独并与其他各方协同采取认为必要的行动，包括使用武力，以恢复和维持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②1949 年 3 月 8 日，贝文将条约的最终草案提交内阁审批。《北大西洋公约》于 1949 年 4 月 4 日由 12 个签约国的外交部长签署。

贝文本人将促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视为其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成就，甚至超越了他早年在运输业及工会运动中的贡献。^③他最终成功实现了将美国与西欧防务体系紧密结合的战略设想，同时巩固了英国与美加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随着北约的成立，贝文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其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构想。他成功说服美国对欧洲的重建与防御作出前所未有的承诺，这不仅增强了西欧对抗苏联压力的能力，也为维持东西方力量平衡提供了制度性保障。通过这一多边安全框架，英国不仅得以继续在大西洋事务中发挥关键作用，还以“特殊关系”的形式维持了与美国的战略亲密性，从而延续了自身在战后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与影响力。

^①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Ser.1, Vol.10, London: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roquest.com/government-official-publications/preface/docview/1923016452/se-2>, 访问时间: 2025 年 4 月 24 日。

^② NATO, Collective defence and Article 5,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topics_110496.htm, 访问时间: 2025 年 4 月 26 日。

^③ Erica Peacock, One man's vision: Ernest Bevin and the creation of NA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4 April 2019, <https://blog.nationalarchives.gov.uk/one-mans-vision-ernest-bevin-creation-nato/>, 访问时间: 2025 年 4 月 26 日。

第三章 英国工党右翼对外政策的原因

第一节 工党自我定位的变化

在传统的经济与地缘政治解释之外，政党对自身身份与历史角色的理解和重塑，是理解工党战后对外政策转向的不可或缺的深层变量。英国作为实行两党制的传统资本主义国家，随着自由党在两次世界大战间的持续式微，工党逐步填补空缺走向政治舞台中央。1945 年大选中，选民抛弃了在战争中领导国家取得胜利的丘吉尔及其保守党政府，转而将希望寄托于主张变革的工党，使后者首次以单独执政的多数党身份组建政府。作为一个在竞选宣言中公开提出“社会主义”理念的政党，工党在一个深厚资本主义传统的国家中赢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这一结果虽令人意外，却也说明至此工党在英国政治体系中的合法性初步确立。可以说，此时英国两党政治中曾经孱弱的一条腿正在逐步康复并壮大，两党竞争的机制重新得以均衡运行。在这样的背景下，战后工党政府在政治、经济与外交领域的执政表现，不仅关系到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更直接关系到英国选民对工党持续执政能力与国家治理能力的评估。所以战后左翼的工党政府却推行了右翼的对外政策这一看似矛盾的行为逻辑，实则折射出新生执政党对政治身份的再确认过程。当工党从体制外挑战者转型为体制内执政者时，其政策取向必然发生从“革命话语”向“国家理性”的位移。而在对外政策上呈现出的右翼现实主义色彩本质上是对“国家利益监护者”政治角色的主动建构——通过展现对苏联的强硬姿态，消弭保守派对其“红色嫌疑”的攻讦，巩固新生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可以做一个反事实假设：如果战后英国经济没有经历如此严重的衰退，或者贝文未成为外交大臣，那么工党是否仍会推动反苏政策、主导冷战初期的英美结盟来逐步推动冷战的形成呢？这一假设本身揭示了议会制政党生存发展的底层逻辑，工党对外政策的右倾化，恰是其完成从“工人阶级代言人”向“全民政党”身份转换的必然产物。

一、工党的“边缘性”起点与合法性焦虑

工党作为英国现代政党体系中的新兴力量，其成长轨迹始终伴随着深刻的合法性焦虑。与根植于英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保守党和自由党不同，工党诞生于十九世纪末的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其初衷是为了在既有议会制度中为工人阶级争取代表权。这一出身使工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视为体制外的挑战者，而非国家治理的自然继承者。

工党诞生于自由党与保守党长期主导、结构稳固的英国两党政治格局之中，成立之初便带有明显的“边缘性”特征。最初，工党以“劳工代表委员会”登上英国政治舞台，其政治参与方式也主要依赖于与自由党的合作。1903年9月，工党与自由党达成了麦克唐纳-格拉斯顿协议（MacDonald-Gladstone Pact），根据该协议，自由党承诺在特定的30个选区不与工党候选人竞争，并帮助工党候选人进入议会，而工党则在其他选区中对自由党表示善意与支持。^①这种安排为工党初步争取到了议会席位，但也使其政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由党的庇护，缺乏独立竞争全国性选举的能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自由党的持续式微以及英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工党逐步积累起独立的社会基础和政治能量。经过战时动员和党内重组，工党在1923年大选中获得191席，超过自由党的158席，虽仍落后于保守党的258席，但保守党未能取得过半优势。^②得益于自由党的支持，工党得以在1924年首次组建少数党政府，这也使得在实际施政中工党受制于自由党，没有推行太多的社会主义政策，走的是中间路线。

然而，尽管工党政府采取了温和的政策，但大多数保守党人对于工党的崛起本身感到了焦虑和担忧。仍然利用反共产主义情绪来攻击工党，特别是在工党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上大做文章，在国内先后掀起了反共的“红色恐慌”。第一次红色恐慌出现在1919至1921年间，其背景是俄国革命余波与英国国内工人运动的高涨。保守党与中右翼媒体有意识地将工人罢工、劳工激进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阴谋”相联系，将工党描绘为颠覆宪政秩序的潜在威胁。在这一语境下，布尔什维克被塑造成“民主制度的死敌”，而支持议会外“直接行动”的工会领袖也被指控图谋摧毁代议制政府。红色恐慌不仅是保守党的策略工具，更真实地反映了政界、工商界与主流社会对社会秩序失控的深层焦虑。到了1920年，保守党更将工党领导的“行动委员会”描绘为苏维埃政权的翻版，进一步强化了“若让工党执政，布尔什维主义将席卷英国”的恐惧叙事。^③这场恐慌不仅强化了保守党的反共话语霸权，更通过具体事件将“红色威胁”深植公共意识，为1924年的政治决战埋下伏笔。第二次红色恐慌则围绕1924年工党少数政府的外交政策展开。工党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两个条约，其中一个条约涉及英国向苏联提供贷款。保守党利用这一事件，声称工党政府正在向一个敌对的共产主义国家提供资金，威胁英国的国家安全；在处理坎贝尔案（即工党政府撤销对一名共产党人煽动罪指控的决定）时，工党进一步遭遇了“软弱纵容极左势力”的指责。更具破坏性的是，在1924年大选前夕，一封伪造的“季诺维也夫信件（Zinoviev Letter）”被公之于众，该信据称是

^① Andrew Thorpe, *A History of British Labour Part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p.16.

^② 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江南造船厂业余学校英语翻译小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59页。

^③ Jack Grimley Ward, “Bolshevik bogies: red scares in Britain, 1919-24,” *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y*, Vol.38, No.1, 2024, pp.149-155.

苏联共产国际领导人季诺维也夫指示英国共产党人加紧推动革命活动的秘密文件。尽管这封信事后被普遍认为是捏造的，但它在当时被广泛炒作，加深了公众对工党与极左势力关联的疑虑。^①在保守党利用红色恐慌情绪的攻势下，工党在1924年大选中遭遇惨败。这次短暂而失败的执政经历深刻暴露了工党在英国主流政治文化中的合法性困境：尽管工党在选举中取得突破，但作为一个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党，它在国家安全、对外政策等问题上仍被广泛质疑其“忠诚度”和“国家责任感”。

总体而言，工党的早期政治实践深刻体现了其在英国体制内“合法性焦虑”的基本特征。作为一个源自工人运动、带有鲜明社会主义色彩的新兴政党，工党在面对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政治文化时，始终难以摆脱体制边缘者的地位。1924年短暂执政虽标志着工党首次登上国家权力中心，但随之而来的红色恐慌、外交争议与选举失利也暴露了公众对其执政资格、国家忠诚度及治理能力的广泛质疑。这种早期经验不仅塑造了工党对自身脆弱政治地位的深刻认知，也种下了其日后在寻求更广泛社会支持、努力摆脱阶级政党标签、迈向“全民政党”转型道路的内在动因。

二、从“工人阶级代言人”到“全民政党”

1945年的大选中，工党赢得了戏剧性的胜利。有393名工党议员当选，以146席的绝对多数超过了其他政党的议席总和，首次成为绝对多数的政党。同时此次选举还有一个显著的新特征就是工党议会党团中的工会赞助成员不到总数的1/3，这意味着像律师、新闻记者、教师、医生等中产阶级工党议员增加，工党早已不是高度纯粹的工人阶级的党了。^②对于这次胜利，总结历史学家的看法来说一共有三个方面：首先，长期的社会基础变迁为工党的胜利奠定了条件。战前教育水平的提高、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觉醒，以及普通民众对自身社会地位和责任的重新认知，促成了工党在更广泛社会群体中的认同扩展。1945年的胜利被看作是数十年民众支持社会主义政策累积的自然结果。其次，战争经验催生了新的政治情绪。敦刻尔克之后英国社会出现了所谓的“左翼情绪稳步增强”。战争不仅激发了全民抗争意识，也加速了对社会正义、经济平等与国家干预政策的广泛接受，从而为工党的纲领提供了巨大的社会土壤。部分学者如米利班德和普里特进一步强调，战争催生了带有民主、反法西斯、亲俄情绪的“大众激进主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半成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后，民众对战后变革的明确期待成为工党胜利的直接动因。选民并非模糊地支持工党，而

^① Jack Grimley Ward, "Bolshevik bogies: red scares in Britain, 1919-24," *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y*, Vol.38, No.1, 2024, pp.160-163.

^② 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江南造船厂业余学校英语翻译小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98页。

是有意识地认同其提出的社会改革计划。这种认知上的主动性使得 1945 年的大选不仅是一场对现政府的否定性投票，更是一场对未来国家方向的积极选择。^①

1945 年，工党的社会支持基础发生了重要变化。从以工人阶级为主的政党，工党逐渐吸纳了大量中下层中产阶级的支持者，形成了一个以共同认可《贝弗里奇报告》中社会保障承诺为纽带的广泛社会联盟。为了弥合传统阶级分野，工党积极借用战时普遍流行的“人民”叙事，将自身塑造为代表全体国民利益的政党。通过强调战争中各阶层共同抗敌、共同牺牲的经验，工党淡化了阶级差异，宣称自己是“人民的党”，不仅代表工人，也代表所有寻求正义与保障的普通人。这一策略有效回应了战前保守党对工党“阶级偏见”的攻击，使工党能够以一种包容性的爱国主义语言重新进入中产阶级和郊区选民的视野。^②尽管“人民”概念在语义和社会层面上存在模糊性，且受到右翼批评，但在 1945 年的政治环境下，工党正是通过这种模糊性，成功将自身从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言人转型为国家整体利益的代表者，确立了作为“全民政党”的新形象。

纵观艾德礼政府整个任期，在国内政策方面，工党通过了一系列关键立法，扩大了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国有化成为重中之重：英格兰银行、煤炭、运输、电力、煤气、钢铁等重要部门陆续实现国有化，虽然钢铁国有化引发了一定争议，但整体推进顺利。这不仅改变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也通过保障就业与基本生活，为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提供了安全感。与此同时，政府以《国家保险法》全面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并推出国家保健服务 (NHS)，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标志着“福利国家”的基本轮廓正式成形。教育改革与住房政策同样着力于改善大众生活水平，尽管在住房建设上未能完全达成既定目标。^③这一系列政策超越了单纯工人阶级利益的诉求，意图打造一个跨越社会阶层、体现全民利益的国家治理体系。在对外政策方面，工党政府则展现出与其传统社会主义理想明显不同的现实主义取向。面对苏联在东欧的扩张与地中海、中东地区的压力，工党政府迅速抛弃了战时盟友的幻想，积极推动与美国的紧密合作，成为冷战初期“遏制政策”的重要一环。工党政府积极推动“马歇尔计划”，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创立的主要倡议国。这种外交现实主义不仅出于国家地缘战略考量，也是工党在新国际秩序中向英国公众展示其捍卫国家利益能力的重要姿态。通过在外交上展现强硬与理性，工党成功削弱了保守派对其“软弱”“亲苏”立场的传统攻击，进一步巩固了其执政合法性。

^① Steven Fielding, "What Did 'The People' Want? : The Meaning of the 1945 General Election,"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35, No.3, 1992, pp.624-626.

^② Ibid., pp.638-639.

^③ 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江南造船厂业余学校英语翻译小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第 100-103 页。

第二节 贝文的外交理念与政策推动

一、“左翼身份”与“右翼外交”

弗朗西斯·威廉姆斯在其为贝文所作的传记开篇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贝文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他最初在 20 世纪初的码头和运输业中，以报酬微薄的临时工身份崭露头角。然而，他天生具有乡村出身的特质，并在其整个职业生涯的重要阶段中始终保有“乡下人”的含蓄与忠诚。^①作为无地农业工人的遗腹子，贝文自幼深陷 19 世纪末英国农村经济萧条的困境。11 岁辍学后，他辗转于农场与布里斯托尔码头之间，从事低报酬的体力劳动，亲身体验工人阶级的贫困与社会不稳定。这段早年经历不仅赋予他对剥削性经济结构的直观理解，也激发了其对社会不公的深切反感。在布里斯托尔担任运货马车夫期间，贝文通过成人夜校与卫理公会的圣经学习班接触到社会改革思想，其政治意识逐步觉醒。1908 年，他加入布里斯托尔社会主义协会（社会民主联盟的地方分支），积极参与失业者救济运动。作为“工作权利”委员会的秘书，他不仅组织了面包分发活动，还策划了著名的“大教堂静默抗议”行动：通过非暴力方式动员失业者在宗教场所表达对社会冷漠的控诉。^②1910 年，他与码头工人丹·希尔曼（Dan Hillman）合作创立了布里斯托尔车夫工会，^③标志着其政治实践从个体抗争迈向有组织的集体行动。贯穿这一过程，贝文始终坚守对工人阶级“同志情谊”的忠诚，拒绝通过阶层跃升脱离自身的社会基础。他曾坦言，“我的人民”的福祉始终是其政治行为的核心坐标。^④可以说，贝文的社会主义信念并非源于抽象的理论建构，而是深植于码头贫民区的生活经验与非国教伦理中强调平等与公义的精神传统。他的政治理念是在现实苦难与宗教道德的双重感召下形成，并最终在工会运动与政党实践中实现了从“受难者”到“变革者”的身份跃迁。

正因其出身与成长轨迹，贝文可被视为英国工人阶级利益的真实代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说，左翼社会主义思想对他具有天然的吸引力，甚至可以认为他理应是左翼阵营中最为坚定的一翼。然而，历史呈现出了一种明显的悖论：随着贝文步入英国政坛核心，其政治实践却越来越多地体现出现实主义的色彩，甚至被视为偏向“右翼”的路线。这一“左翼信仰者推行右翼政策”的反差，构成了理解贝文政治实践的关键张力所在，也为探讨工党与冷战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线索。

弗朗西斯·威廉姆斯在其传记中指出，贝文具备“直率、好斗、自负与宽宏大量”并存

^① Francis Williams, *Ernest Bevin: Portrait of A Great Englishman*, London: Hutchinson, 1952, p.9.

^② Ibid., pp.25-26.

^③ Ibid., p.28.

^④ Ibid., p.20.

的性格特质。他“自信地接受权力”，在各种场合中常常“理所当然地担当起同辈中的首要角色”。^①同时，贝文早年在社会底层艰难谋生的经历，则锤炼出他极强的自立意识与固执意志。他成长于必须凭借个人坚韧与狡黠才能求得温饱的环境之中，这种境遇造就了他对依赖与妥协的本能抗拒。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空想者，而是一个在残酷现实中练就应对复杂局势能力的“实干家”。在工会运动中崭露头角后，贝文逐渐形成了一种近似“白手起家的工业巨头”式的行动风格。^②他具有卓越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实践理性，擅长强硬的讨价还价，能够在政治交易中保持冷静甚至冷酷的姿态。这种“工人资本家式”的性格结构，使他在捍卫工人权益的同时，也具备了经营国家与驾驭权力的战略心态与现实主义取向。从这一性格结构出发，贝文的“左右错位”并不难以理解。他的社会主义信念根植于底层经验与道德直觉，而非抽象的意识形态忠诚；他推行右翼现实主义政策，亦非价值观的背离，而是一种源于控制欲与责任感的战略抉择。在他看来，“道义”必须转化为可实施的政治安排，“信念”必须服从于国家生存与秩序稳定的优先逻辑。正因如此，当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时，贝文更倾向于“以现实维理想”，而非“以理想对抗现实”。

这种“左右错位”的实践基础，部分可追溯至其在丘吉尔战时内阁中的政治经历。在1940年5月，欧内斯特·贝文被任命为丘吉尔政府中的劳工和国民服务大臣。在德国闪电战压境、法国即将投降的危急时刻，英国政府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国家生存。在这一背景下，贝文承担起调动劳动力、保障军备生产、稳定工业秩序的重任。他需要压制罢工、协调劳资冲突、重组经济，^③这些任务要求其暂时放下阶级对抗的传统立场，转而以国家整体利益为优先目标。这种战时权力实践，不仅塑造了他对“国家优先”逻辑的深刻认同，也强化了他将“阶级正义”内化为“国家治理”责任的政治观。与此同时，贝文在战时联合政府中与丘吉尔及保守党高层的长期共事，使他脱离了传统工会活动的阶级视角，转而接触到大国政治与国际战略的运作机制。丘吉尔曾评价道：“欧内斯特·贝文……我和他在很多方面都很合拍。”^④在跨党派、以危机管理为核心的政治环境中，贝文参与高层战略决策，逐步形成了对国际体系、大国博弈与权力均势的敏锐认知。

1945年工党上台执政后，贝文本拟出任财政大臣，最终却被任命为外交大臣。尽管缺乏传统外交经验，但他在工会国际事务中的长期实践，早已使其熟悉跨国协商与制度性协调机制。作为英国运输工会（TGWU）领袖，他曾推动国际劳工协定、协调国际筹资事务，并在英联邦会议上提出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集体安全设想。这些经验虽来自“非官方”场域，

^① Francis Williams, *Ernest Bevin: Portrait of A Great Englishman*, London: Hutchinson, 1952, p.10.

^② Ibid., p.39.

^③ Alan Bullock, *The Life and Times of Ernest Bevin: Minister of Labour 1940-1945 (Volume 2)*,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67, pp.1-4.

^④ Ibid., p.4.

却使他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建构具有独到的实用视角。正如历史学者艾伦·布洛克（Alan Bullock）所总结的那样，贝文在战后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外交理念与政策取向。其一，他始终坚持将经济重建置于外交议程的核心位置，强调国际贸易与就业的联动关系，倡导区域经济一体化，积极推动马歇尔计划与 OEEC 的落实。^①其二，贝文对苏联始终抱有高度警惕。他的反共立场并非出于对资本主义的拥护，而是源自对工人运动被极权主义操控的深刻反感。在他看来，苏联式“左翼专制”背离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精神，构成对自由工会与社会权利的严重威胁。^②其三，贝文延续其工会生涯的实践风格，在外交上强调谈判灵活性与信息来源多样性。他不仅依赖官方渠道，也活跃于工会网络和私人关系中，以增强外交判断的现实基础。^③其四，在国际秩序构想方面，贝文并不幻想联合国可立刻承担全球治理职能，而是更注重以大国协调为基础、区域机制为支点的现实合作。他反对贸然撤出中东，主张以“伙伴关系”代替帝国控制，并提出通过经济发展提升不发达国家稳定性。他同样关注欧洲大陆对苏防线的构建，认为英国不应缺席欧洲安全架构。^④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就表现为对英国的国家利益、战后国际经济体系、国际安全体系、战后地中海和中东的殖民地以及欧洲稳定的特别关注。^⑤

总的来看，贝文的外交思想与实践结合了其工人运动出身、战时政治经历与对国家利益的现实判断。他所代表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右翼路线”，而是一种在大国权力结构中求生存、谋发展的“左翼现实主义”。他试图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构筑一套可执行的外交路径，在国家责任与阶级信念之间实现调和。

二、贝文在冷战形成中的关键作用

贝文作为工党政府的外交大臣，是冷战初期英国外交战略转型的重要塑造者。在 1945-1949 年这一冷战格局逐渐形成的决定性阶段，贝文通过一系列具体外交行动，推动了工党政府逐渐形成联合美国、遏制苏联的对外政策，构成了英国工党“右翼对外政策”形成的核心支点。

首先，贝文在战后极为迅速地对国际格局做出了清晰判断：美国正试图将其“门罗主义”扩展至中国、日本及南美，而苏联则谋求在欧亚大陆构建一个从吕贝克延伸至亚得里亚海，再到远东旅顺的广阔势力范围。在两大阵营加速分化的背景下，英国夹处其中，既面临帝国

^① Alan Bullock, *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 London: Rowland Phototypesetting Ltd, 1983, pp.104-105.

^② Ibid., pp.105-107

^③ Ibid., p.108.

^④ Ibid., pp.111-113.

^⑤ Ibid., pp.109-112.

版图的收缩，又承受盟友体系的瓦解和巨大的战略压力。正如他所言：“我们正迅速陷入三个大国势力范围的格局……英国被迫在两个对立集团之间选择一边。”^①在此背景下，贝文提出了对英国外交方向的初步设想，即走一条“第三条道路”——既不盲目卷入美苏对抗的两极格局，也不放弃对联合国及多边主义原则的信念。这一现实主义判断，尤其是他对苏联扩张逻辑的深刻警觉，构成了战后工党对外政策日益趋于反苏的思想底色。贝文的战略视野在这一阶段逐渐转向将“国家安全”置于社会主义理想之前，为工党外交立场的重大转变奠定了方向性基础。

其次，贝文在应对苏联扩张方面展现出极强的主动性和战略判断力。以1946年伊朗危机为例，贝文初期本希望通过双边谈判解决苏军驻留问题，避免事态国际化。然而，当伊朗将问题提交联合国时，他迅速调整策略，将联合国作为对苏施压的舞台，借助该平台争取美国介入，从而打破英国在中东单独遏制苏联的困境。这一策略不仅化解了英国在伊朗的外交孤立，也为后来的“遏制战略”提供了早期范式。在“杜鲁门主义”出台的过程中，贝文无疑也发挥了关键作用。1947年初，希腊内战加剧，英国因财政危机无力继续承担对希腊和土耳其的军事与经济支持。面对这一战略真空，贝文迅速认识到，英国已无法单独维护地中海和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而唯一可能填补这一空缺的便是美国。他没有被动等待，而是采取了极具主动性的外交策略：向华盛顿发出措辞严谨、目的明确的“精心设计”的电报，强调如果西方世界不立即对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苏联势力将趁势扩展，整个地中海防线将面临崩溃。无论贝文当时是否预见到这一战略转折的全部后果，他的确以英国的战略撤退换取了美国的全球介入，其推动作用不仅明显，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再次，在北约的缔造过程中，贝文堪称“制度设计师”与“推进者”。1948年1月4日，他在内阁中提交题为《英国对外政策首要目标》的备忘录，明确提出建立西方国家联盟以抵御苏联扩张的构想。在这一基础上，《布鲁塞尔条约》的签署，为北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此后，贝文乘着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月事件”、芬兰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苏联对挪威施加压力等一系列危机事件的东风，积极推动美国参与西欧防务。他明确意识到，英国在经济与军事实力上已难以独力维系地区安全，必须争取美国的安全承诺。在推动相关方谈判中，贝文虽感到现实压力巨大，但仍以务实态度寻求妥协，最终于1948年完成被称作“五角大楼文件”的磋商成果，为《北大西洋公约》的谈判确立了基本框架。与此同时，1948年6月爆发的第一次柏林危机，为推进联盟谈判提供了新的契机。贝文判断，危机将强化欧洲对美国介入的需求，因而加紧与美方协调。随着1948年6月美国通过《范登堡决议案》，

^① E. Bevin, Memorandum by Mr. Bevin on the foreign situation, London: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Ser.1, Vol.3, 1945,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roquest.com/government-official-publications/memorandum-mr-bevin-on-foreign-situation/docview/1923014683/se-2>, 访问时间: 2025年4月25日。

解除其参与永久性军事同盟的法律障碍，贝文与艾奇逊（Dean Acheson）等人迅速推进多边谈判进程。1949年7月，在华盛顿召开的多国磋商中，尽管美法之间就条约适用范围与第五条内容存在严重分歧，谈判一度陷入僵局，贝文以“中间调停者”的身份多方斡旋，最终促成各国在关键条款上的妥协。1949年4月，《北大西洋公约》正式签署，北约宣告成立，冷战格局的制度化成形。

最后，即使在工党内部尚存大量亲苏声音、舆论对美国政策充满疑虑的情况下，贝文依然以坚韧的政治意志推动对苏强硬路线的确立。他不仅在1946年伦敦外长会议上多次强硬反击苏联代表莫洛托夫的领土与外交主张，还在国内议会辩论中坚持强调集体安全与民主制度的重要性，明确反对对苏“同志幻想”的继续。他与党内左翼的分歧不仅反映了政策分歧，更揭示出冷战初期工党内部关于“和平主义理想”与“国家战略现实”的深刻张力。

第三节 工党政党结构与党内博弈

在解释战后工党政府对外政策右转的过程中，英国工党本身的政党结构所提供的制度性支撑不容忽视。1945年至1949年间的工党并非一个内部高度统一的政党，其意识形态版图从温和的渐进主义延伸至激进的社会主义，在外交政策上同样存在显著分歧。以“保持左翼”（Keep Left）运动为代表的党内亲苏派，曾积极推动更为左倾的外交立场。然而，最终工党政府形成并付诸实施的对外政策，却是外交大臣贝文所主导的相对保守路线。这一政策结果的产生，并非仅仅源于贝文的个人能力或主张的强势，更深层地植根于工党内部“内阁集权-议会党团主导”的制度性结构安排。这一政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党内左翼与群众派对外交政策的制衡能力，为高层主导的现实主义外交策略扫清了障碍。

一、内阁集权与议会党团主导的工党政党结构

英国工党政党结构中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悖论，这个悖论体现在其组织形式与实际运作之间的深刻张力：工党在形式上是一个群众政党（mass party），其组织架构和历史起源表明它应当强调基层成员与工会组织的意志，特别是在政策制定和党内权力分配方面具有主导作用。然而，自1945年以来，工党却表现出一种更接近传统议会政党的特征——即削弱群众对政党的实际影响力，赋予议会党团（Parliamentary Labour Party）和党的领导人高度的自治权与政策主导权。^①这一悖论的核心在于：工党早期曾努力强化基层和党大会对议会代表的控制权，试图通过党纲、决议与制度安排，来确保党的群众基础能够左右其领导阶层，

^① Gerhard Loewenberg,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Labour Part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52, No.3, 1958, p.771.

甚至在理论上规定首相的产生与内阁组建应受到党的全面监督。比如, 1933 年工党大会通过了一项关键性的决议, 旨在强化全国执行委员会 (NEC) 对工党领导人 (尤其是议会党团) 的控制, 以回应当时党内对领导层脱离群众意志的担忧。^①然而, 到了 1945 年以后, 尤其是在艾德礼担任首相时期, 这些理论上的安排被“事实性地放弃”, 党的议会领导层获得了实际上的自主权, 党纲与基层控制退居其次。这种悖论性结构源于工党在不同历史阶段角色的变化——从工会驱动的政治运动, 过渡到能够实际执政的议会政党。工党一方面保留了大量形式上的群众参与机制和民主集中制式的组织遗产, 但另一方面, 为了在议会政治中实现政策和政府稳定性, 又必须让渡更多决策权给议会党团领导人, 从而造成制度设计与实际运作之间的结构性矛盾。^②

这一结构性矛盾首先在 1945 年大选胜利后艾德礼的组阁过程中显现出来。与丘吉尔个性化、富有戏剧性的领导风格不同, 艾德礼力求构建一个简洁、制度化且高效的内阁体系, 以维持政治秩序并提升政府职能的执行效率。早在 1937 年, 他就在《工党的展望》中批评传统内阁模式将政策制定与行政管理集中于一体, 主张通过职能分化和委员会制度提高治理效能。^③在 1945 年工党执政后, 艾德礼确立了一个以“锥形结构”为特征的行政体系: 他位于顶端, 亲自主持经济、国防和殖民事务等关键内阁委员会; 在其下, 三位核心大臣——贝文 (外交)、克里普斯 (经济) 与莫里森 (内政) ——分别负责主要职能部门, 并因其在党内或社会中的独立影响力, 构成事实上的“首相亲信圈”。艾德礼通过设立委员会分担政策执行责任, 大幅减少全体内阁会议的议题数量, 从而提高政府决策效率。他掌控会议节奏, 通过设定议程和采用否定性提问来压缩讨论空间, 避免冗长辩论。^④然而, 在这一行政结构的确立过程中, 工党早期制度设计中强调的集体监督机制却被实质性忽视。尽管 1933 年党大会曾通过决议, 形式上赋予大会对议会领袖人选的认可权, 艾德礼却在组阁时完全绕过了全国执行委员会与党大会的参与, 依照议会传统和首相惯例自行任命内阁成员。

在工党执政后, 其党内组织在形式上保留了地区和主题小组、联络委员会与议会党会议等内部机制, 旨在维持党员参与和民主讨论的空间。然而, 这些机构在实际运作中被有效纳入政府掌控之中, 成为行政权力“向下沟通”而非“接受监督”的工具。比如由联络委员会主持的议会党会议通常每两周召开一次, 时长约一小时, 但部长们频繁出席, 更多是作为与党内保持“联系”的手段, 而非接受后座议员监督的渠道。政府领导层利用这些场合来解释政策, 争取“总体信任”, 特别是在国防与对外政策等敏感领域, 借此成功压制批评声音。

^① Labour Party (Great Britain), Conference, *Report of the 33r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Labour Party*, London: The Party, 1933, pp.8-10.

^② Gerhard Loewenberg,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Labour Part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52, No.3, 1958, p.790.

^③ C. R. 艾德礼: 《工党的展望》, 吴德芬、赵鸣岐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 第 95-96 页。

^④ John P. Mackintosh, *the British Cabinet*, London: Stevens & Sons Ltd., 1968, pp.493-497.

内阁集体负责制和保密规则进一步加剧了党内参与的制度性障碍：前者要求议会党团对政府方针保持一致，后者则使领导层即便愿意也难以与党内成员就政策内容进行充分磋商。^①正如莫里森总结所言，允许政党会议在政策制定中扮演更直接角色“不符合宪政原则，有悖于良好治理，并可能导致政府接受未经深思熟虑的决策”。政府的责任对象应是下议院整体，而非党内机构。^②

综上所述，战后工党政党结构中“内阁集权—议会党团主导”的制度性安排，在表面维持群众政党形式的同时，实际强化了领导层对政策议程的主导权。这一结构不仅削弱了基层组织和党内左翼对外交政策方向的影响力，也为艾德礼政府推行由贝文主导的现实主义外交路线提供了制度保障。正是在这一制度背景下，工党内部的不同派别虽有博弈空间，但其影响力和制衡能力受到显著限制，政策走向最终仍由高层少数人决定。

二、战后工党内部的博弈与妥协

英国资深外交官威廉·斯特朗（William Strang）曾如此评价工党政府的对外政策：“工党政府以及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始终值得称赞的是，他们绕过党派教条，制定出既符合战略现实又符合传统意义上国家利益的政策。”然而，自1945年末起，工党内部便不断有人批评政府的外交路线背离了社会主义理念，尤其是对贝文及内阁在重大外交议题上的立场，指责其放弃了工党原有的社会主义承诺，转而奉行保守的、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逻辑。回顾战后初期的政策走向，这些批评虽不无偏颇，却也并非毫无根据。的确，工党政府在对外政策上的诸多决定可被视为对社会主义外交理念的根本背离。正如斯特朗所言，这种背离体现的是对战略传统的回归，而在党内左翼看来，它则是一种理想的背叛。^③这场围绕国家利益与社会主义原则之间张力的争论，构成了战后初期工党内部博弈的核心内容——也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在冷战阴影下的典型碰撞。

战后初期，工党内部不少亲苏的党员对贝文的外交路线提出集中批评，他们认为贝文对美追随、对苏对抗的立场背离了工党的社会主义初衷，要求推行“社会主义外交政策”。其中，“社会主义外交政策”的倡导者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最为激进的群体是一小部分“亲共”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仅在议会内频繁挑战政府外交立场，而且在行动与言论上明显与苏联政策保持一致，代表人物包括柯尼·齐利亚克斯（Konni Zilliacus）、约翰·普拉茨-米尔斯（John Platts-Mills）、莱斯利·索利（Leslie Solley）与达根·哈钦森（D. N. Pritt/Hutchinson）；

^① Gerhard Loewenberg,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Labour Part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52, No.3, 1958, pp.778-780.

^② *Ibid.*, p.779.

^③ Michael. R. Gordon, *Conflict and Consensus in Labour's Foreign Polic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118-119.

其次，来自工党极左翼的议员虽未明确与苏共合作，但对贝文的亲美反苏立场持持续批评态度。他们强调反对帝国主义、支持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运动，对党内主流外交路线表达系统性异议。代表人物包括威廉·沃比（William Warbey）、悉尼·西尔弗曼（Sydney Silverman）、汤姆·布拉多克（Tom Braddock）与 S.O. 戴维斯（S. O. Davies）；第三个层级则是人数最多的“保持左翼”（Keep Left）集团，1947 年以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汤姆·德里伯格（Tom Driberg）与伊安·米卡多（Ian Mikardo）等为代表，约有 50 名后座议员，他们主张推进更为独立的英国外交政策，摆脱美国冷战逻辑压力，支持希腊、中东、印度尼西亚等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民主社会主义势力，是对贝文外交路线最具持续挑战力的党内集团。^①“保持左翼”群体在 1946 年 11 月提出“外交事务修正案”，公开挑战贝文的外交方针，要求政府缓和与苏联的关系，批评既有政策激化国际紧张，呼吁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以避免世界陷入分裂对抗。尽管该修正案在议会中未获通过，但在党内引发广泛争议，贝文在政策辩护中承受巨大压力，屡次被质疑“屈从美国”“激化冷战”。^②尽管“社会主义外交政策”主张在宣传中长期占据一席之地，但其实质内容始终模糊。不同群体在实际操作上分歧明显：既有呼吁英国采取孤立主义立场、避免卷入美苏对抗的声音，也有主张组建社会主义欧洲阵线者，甚至有将希望寄托于英联邦和印度等新兴国家支持的理想主义者。此外，部分工党成员延续 1918 年民主控制联盟传统，主张外交民主化、反对秘密联盟与军事扩张。这些构想共同构成了党内对现实主义外交路线的左翼抵抗框架。^③

贝文在担任外交大臣初期，曾一度向工党左翼表达善意，试图缓解党内对其外交路线的疑虑。他在 1945 年下议院的首次外交政策声明中表示，英国工党政府将致力于与苏联建立“左翼对左翼的同志情谊与团结”，这一言辞在当时赢得了《论坛报》等左翼媒体的积极回应。这种措辞既是对苏联在战胜纳粹战争中所扮演角色的肯定，也意在维系工党内部对战时盟友的情感认同。然而，这种姿态很快被证明只是象征性的让步。在随后的波茨坦会议上，贝文即表现出其对英国传统地缘战略利益的强硬捍卫，特别是在中东事务中，他坚决主张保留英国在苏伊士运河、波斯湾及东地中海地区的影响力，并公开反对苏联提出的扩张性主张。真正标志英苏关系破裂的，是 1945 年 9 至 10 月于伦敦召开的第一次外交部长理事会会议。在关于战败国和约安排的问题上，贝文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之间的对话几乎在所有议题上陷入僵局，无论是对意大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还是芬兰的和平条款问题，双方都互不让步，激烈争执。这一系列谈判的失败，使得外交部内越来越多高级官员意识到，战时

^① Kenneth O. Morgan, *Labour in Power: 1945-195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237-239.

^② House of Commons Hansard, Commons Sitting of Monday, 18th November, 1946, Volume 430, <https://parlipapers.proquest.com/parlipapers/docview/t71.d76.cds5cv0430p0-0005?accountid=13151>.

^③ Kenneth O. Morgan, *Labour in Power: 1945-195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235-240.

联盟已不复存在，而“合作”的幻想正迅速让位于对抗性的现实。早在“冷战”一词尚未广泛使用之前，贝文主导下的英国外交已事实上进入了冷战状态。^①

总体而言，1947至1949年间工党左翼围绕外交政策所发起的挑战，虽在理念上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原则与国际和平愿景的坚持，但在制度结构与政治现实的多重约束下，最终未能撼动贝文所主导的现实主义路线。尽管左翼议员在议会和党内年会中不断发声，表达基层对于对苏缓和与外交独立的期待，但由于工会掌握党代会投票主导权，领导层通过党纪处分和组织排斥有效压制异见，加之媒体舆论的配合与冷战恐慌氛围的助推，左翼政治空间日益收缩。1948年柏林危机成为关键转折点，在安全问题面前，党内普遍团结于贝文周围，联合国调解路线被边缘化，空运行动赢得广泛支持。随着齐利亚克斯、普拉茨·米尔斯等极左议员被相继开除^②，代表温和左翼的“保持左翼”集团亦失去组织动员力，最终走向瓦解。这一过程不仅宣告“社会主义外交政策”在工党内部的彻底失败，也进一步巩固了以内阁和议会党团为核心的政策主导结构，为政府继续推行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冷战外交战略奠定了稳定的党内基础。

第四节 战后英国的经济衰退与苏联的扩张

战后英国对外政策的右翼化，更深层地根植于结构性的国际现实：一方面，英国在战后所面临的严峻经济困境严重制约了其独立自主的外交能力；另一方面，苏联在欧洲大陆及周边地区的扩张则对英国传统势力范围构成了持续性挑战。二者叠加，迫使工党政府不得不在理念与能力之间作出现实主义的抉择，以确保国家安全与国际地位的相对维持。

一、英国相对实力的衰退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英国经济造成了系统性打击，其后果深刻且持久。战争期间，英国的军事支出高达250亿英镑，远远超过其财政承受能力。到1945年，英国国债总额从战前的72亿英镑激增至214亿英镑，外债总额达到35亿美元，财政赤字与国际收支逆差同时膨胀，仅战时的国际收支逆差便超过40亿英镑。^③此外，英国在战争中还不得不将价值逾10亿英镑的海外资产出售或转移，以支付军需物资，这些资产中包括其在加拿大、南美及远东的战略性投资。战火对英国本土的工业基础也造成了毁灭性影响。空袭摧毁了大量基础设施与固定资本，商船损失约占其原有运力的一半，3.5万名海员在海上战死。战争结束时，英国的

^① Kenneth O. Morgan, *Labour in Power: 1945-195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40.

^② Ibid., p.238.

^③ 弗·格·特鲁汉诺夫斯基：《英国现代史》，秦衡允、秦士醒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年版，第412-413页。

工业总产量仅为 1937 年水平的 90%，而出口贸易则较战前下降了 69%。殖民地体系亦因战争而遭受严重削弱。在美国垄断资本的强势渗透下，英国不得不将包括纽芬兰、牙买加、巴哈马等地的军事基地租借给美国，租期长达 99 年。^①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标志着英国殖民体系的被动收缩，也预示着其全球帝国战略空间的坍塌。战争也进一步促使帝国结构的瓦解，英国与其自治领之间的联系显著弱化。美国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的资本渗透，强化了自治领的经济独立倾向，加速了英帝国的离心趋势。与此同时，欧洲与亚洲的大批国家在战后脱离资本主义体系，使英国赖以获取原材料和市场的外围体系大幅萎缩，其全球贸易能力和经济扩张空间遭受结构性压缩。^②总的来看，二战不仅使英国丧失了“世界首富”地位，也动摇了其大国身份的根基。战后英国已不再具备维系全球帝国的资源与能力，其国际影响力在美国和苏联两大超级强权崛起的背景下显得日益边缘化。

1945 年工党上台执政后，财政状况成为其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难题之一。1945 年 8 月 14 日，财政大臣道尔顿（Hugh Dalton）向内阁提交了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起草的一份备忘录，全面分析了英国战后经济的困境。凯恩斯在文件中坦率指出，英国面临高达约 500 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而唯一可能填补这一缺口的外部力量便是美国。在此背景下，凯恩斯提出“金融敦刻尔克”（Financial Dunkirk）一词，意在比喻英国所面临的严重经济危机已如敦刻尔克撤退般危急。他指出，如果英国未能在短期内通过外援获得必要的经济缓冲，将面临多重后果：在国际层面，这意味着英国必须迅速而屈辱地从其长期承担的全球性责任中撤出，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声誉受损，并被迫接受类似于当时法国那样的“二等国家”地位；在帝国内部，英国将不得不转向向自治领和其他地区寻求任何可能的“慈善式援助”；在国内，则必须采取比战争时期更为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推迟新政府提出的社会改革议程，并可能引发政治上持续的挫败与不满。^③

正如贝文在多个内阁文件中所坦言，“没有资源支撑的世界角色”成为战后英国不可回避的矛盾。战后短短两年内，英国被迫放弃在印度、巴勒斯坦及东南亚等地的直接统治，并在 1947 年将中东事务中的部分责任转交给美国，象征着“帝国衰退”的事实性开端。然而，英国虽被迫在全球性义务上收缩，却不愿接受“中等国家化”的角色定位。工党政府试图在有限资源基础上重塑“责任型大国”的外交路径。这一矛盾心理决定了其必须依赖外部力量弥补自身能力缺口，而美国自然成为其战略依靠的首选。这种不得已首先在战后德国问题上被体现出来，根据波茨坦协定，英国获得德国西北部鲁尔工业区作为占领区，然而该区粮食

^①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35 页。

^② 弗·格·特鲁汉诺夫斯基：《英国现代史》，秦衡允、秦士醒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13 页。

^③ Keynes, “Our Overseas Financial Prospects”, Note by Mr. Dalton, Ser.1, Vol.3, Aug 14, 1945, London: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roquest.com/government-official-publications/note-mr-dalton/docview/1923016031/se-2>, 访问时间：2025 年 4 月 23 日。

严重匮乏，长期依赖东部产粮区供应。苏联拒绝履行向英占区输送粮食的义务，导致英国需独自承担 2000 万占领区居民的粮食保障。然而战后英国财政极度困难，根本无力应对这一巨额负担。在此背景下，英国一方面在盟国管制委员会内抗议苏联违约，另一方面则转而寻求美国援助。1946 年英美达成两占领区经济合并协议，由美英共同承担占区预算赤字，实际上由美国单方面提供支持。这一安排促成了英美占区的经济一体化，成为日后西德政府建立的起点，进一步加剧德国分裂与东西方冷战对峙。同时，英国在对德政策上的自主性大幅削弱，对美政策日益依附。贝文的公开表态强调“盟国权力优先”，实质上是认同了美国推行的分裂德国与苏联对抗的政策。^①

类似的逻辑也深刻影响了工党在中东的战略部署。中东在战后英国对外政策中占据核心地位，不仅因其战略地理位置，更因其资源与贸易通道对英国复兴具有关键意义。贝文甚至明确指出，英国在中东的存在是维系美英关系的关键纽带——“一旦我们在中东失去立足之地，美国也将不再支持我们”。^②因此，贝文在战后极力主张改革对中东地区的治理模式，以“伙伴关系”替代旧有的殖民控制，并试图通过发展型合作改善当地经济与社会状况，以缓解民族主义情绪与社会动荡。然而，这一政策构想最终被严峻的财政现实所压垮。英国在中东维持影响力所需的政治、经济与军事资源远超其实力承载范围，改革计划在执行层面进展缓慢，反而激化了本土反殖民情绪。英国未能与被视为中东战略支点的埃及达成持久协议，更无法确保苏伊士运河基地的续留控制权；与伊拉克签订的条约也在国内反英浪潮中迅速崩溃。^③随着 1946 年伊朗危机的发展，英国在伊朗的地位也被彻底削弱，其在波斯湾地区的控制力进入全面下滑阶段。

二、苏联的战后扩张

在一次北约筹备会议上，法国代表曾将西方大国所面临的安全挑战总结为三个层次：最终的威胁是德国，现实的威胁是苏联，而直接的威胁则是苏联在德国的具体行动。^④这一判断揭示出战后苏联在东欧及德国问题上的扩张企图，已成为西方国家普遍感知的迫切安全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当英国国内的许多左翼选民与普通工党议员仍沉浸于“左翼理解左翼”的情感叙事，寄望于实现一种国际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合作时，工党政府作为与苏联展开直接外交博弈的执行人，却最早意识到苏联的现实政策目标与其“社会主义国家”的自我标榜

^① 叶江：《战后英国工党政府与冷战起源（1945-1948）》，《史林》，1991 年第 1 期，第 70 页。

^② Alan Bullock, *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 London: Rowland Phototypesetting Ltd, 1983, p.351.

^③ William Roger Louis,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1945-195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737.

^④ Alan Bullock, *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 London: Rowland Phototypesetting Ltd, 1983, p.570.

之间存在根本张力，放弃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幻想。

尽管雅尔塔体系在名义上确立了四国共同占领及战后民主重建的原则，但斯大林早在1944年便表明了“谁占领，谁建制”的，其根本目标是以红军军事存在为依托，推动苏式政权模式在东欧落地生根。^①从1944年起，苏联在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国系统性地推行政治干预，强力重塑这些国家的政治结构。通过扶植“人民阵线”政权、操控选举结果、控制内政与秘密警察系统，苏联有效瓦解了当地非共产党政治力量的生存空间。在波兰，斯大林绕过伦敦流亡政府，秘密扶植“卢布林政权”，并通过镇压地下抵抗组织，对波兰反共武装实施清剿；在罗马尼亚，苏联通过“政治恐吓和军事部署”的双重手段，于1945年3月强行迫使国王任命亲苏政府；而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苏联虽初期保持表面上的政党合作，但在1947年后转向全面控制，并最终通过政变或选举操纵，确立共产党的一党主导地位。^②更具战略意义的是，这一地区在地理上构成了从波罗的海延伸至巴尔干的“苏联前沿缓冲地带”，将西方势力从中欧及东南欧全面排挤出去。对于英国而言，这不仅意味着其在传统势力范围内的影响力受限，更形成对英国控制巴尔干通往中东和印度洋生命线的战略压迫。例如，在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接近苏联化的同时，希腊爆发内战，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引发英国对地中海通道被切断的严重担忧。从1947年起，苏联政策更进一步“斯大林化”。通过在波兰召开的斯科拉尔斯卡波伦巴会议，成立共产主义情报局（Cominform）来对抗马歇尔计划的潜在威胁，明确“两个阵营”的划分，苏联放弃了此前的“人民民主”与“民族道路”论述，转而要求东欧国家全面效仿苏联制度，强化对意识形态、政党组织、警察体制与经济结构的集中控制。^③斯大林化的深层逻辑在于，东欧的苏维埃化不仅是对地区政治制度的改造，更是对其地缘战略结构的重构。苏联通过这一系列扩张行为，成功建立起一个政治、经济、军事高度依赖莫斯科的“安全缓冲圈”，并借此压制西欧国家在德国、奥地利、南欧的战略回旋余地。这一局势对英国而言，构成现实而迫切的挑战。作为战后仍抱有全球大国身份诉求的国家，英国无法接受欧洲“铁幕”将自己排除在外。

俄罗斯解密档案的研究表明，斯大林在战后初期的战略重心明确聚焦于巩固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他深知，在维持战时大国合作的框架下，确保苏联在中东欧的主导地位远比在地缘边缘地带的冒险扩张更为关键。因此，在1945-46年间，苏联在希腊、伊朗和土耳其等地总体上采取了较为克制的策略，避免直接军事对抗或破坏与英美之间的基本外交协调。^④

^① Milovan Djilas, *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 trans. Michael B. Petrovich,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62, p.114.

^② Melvyn P. Leffler, *Odd Arne Westa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ume 1, Origi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178-181.

^③ Ibid., pp.189-191.

^④ Geoffrey Robert, "Moscow's Cold War on the Periphery: Soviet Policy in Greece, Iran, and Turkey, 1943-8,"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January 2011, Vol.46, No.1, pp.59-60.

然而，这种“战术性克制”并不等于放弃扩展势力的战略目标。恰恰相反，苏联在这些关键地区持续推进政治渗透和战略布局，其政策变化日益对英国的传统地缘利益构成现实威胁。在希腊问题上，早在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期间，苏联代表团即提交了一份关于《解放欧洲宣言》执行情况的备忘录，批评希腊国内针对“民主力量”的恐怖统治，并呼吁组建一个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民主政府。这一立场表面上仍然温和，但实际上标志着莫斯科开始将希腊问题作为施压西方、争取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政府问题上让步的外交筹码。随后在1945年9月伦敦外交部长会议上，苏联进一步表态称“无法对希腊局势承担道义责任”，试图在舆论上保持距离，但留有干预余地。到1945年12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时，苏联对希腊的立场明显加强，正式要求英国从希腊撤军。这一要求表面上是回应西方要求苏联撤出伊朗、东欧国家的压力，但实际上也反映了苏联对地中海出入口的战略兴趣。1946年，随着希腊内战局势升级，苏联在外交上不断对英美支持希腊政府施加批评，并在联合国等场合发起舆论攻势，显著提升了希腊问题在东西方对抗中的地缘战略意义。^①与此同时，苏联在伊朗和土耳其的行动更为直接，暴露出其在南方扩展势力范围的真实意图。在伊朗，苏联起初通过1941年的联合占领获取北部地区的实际控制权，随后在1944年贝利亚向斯大林提议，应通过对占领区施加政治压力以获取石油特许权。1945年9月，苏联支持成立阿塞拜疆民主党（DPA），并推动其发动武装夺权，实质性地将伊朗西北部置于苏联势力影响下。^②在土耳其问题上，1945年6月，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正式向安卡拉提出领土要求，要求归还卡尔斯和阿尔达汉两省，并主张对黑海海峡实施国际共管。苏联的主张一方面植根于沙俄时期边界复归的历史叙事，另一方面则出于战略安全考虑——斯大林认为掌控海峡对于防止土耳其成为西方势力反苏基地至关重要。^③

综上所述，战后英国外交的右翼转向，在根本上源自现实结构的双重压力：帝国衰退下经济能力的收缩，迫使英国即使想要走贝文的“第三条道路”，但囿于现实必须依附于美国；苏联扩张引发的安全焦虑，迫使英国必须主动整合西方以构筑战略防线。在这种条件下，工党政府的外交选择虽偏离传统国际主义路线，但并非意识形态的背叛，而是国家能力与国家生存逻辑的体现。

^① Geoffrey Robert, "Moscow's Cold War on the Periphery: Soviet Policy in Greece, Iran, and Turkey, 1943-8,"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January 2011, Vol.46, No.1, pp.63-65.

^② Ibid., pp.65-67.

^③ Ibid., pp.76-79.

结论

在 1945 年至 1949 年期间,即北约正式成立之前,有着左翼背景的社会主义政党工党政府的对外政策经历了显著的右转过程。起初,工党仍延续战时合作氛围,对苏联抱有一定期待,支持根据《雅尔塔协定》推进欧洲和平秩序的重建。然而,随着苏联在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地扶植亲苏政权,红军占领区域的政治操控加剧,英国逐渐认识到苏联意图扩展势力范围,打破了原有大国合作的基础。1946 年的伊朗危机中,苏联拒绝撤军,加剧了西方国家对苏联扩张主义的警惕。1947 年,随着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出台,国际局势进一步分化,英国工党政府不仅积极响应美国援助计划,还在西欧一体化、经济合作领域发挥关键推动作用。特别是在经济困境与全球影响力衰退的双重压力下,工党外交大臣贝文坚定主张将英国外交重心西移,加强与美国的战略联盟,对抗苏联在欧洲的渗透。1948 年捷克斯洛伐克政变后,东西方阵营分裂进一步加深,工党政府明确支持组建一个以美英为核心的防务同盟。最终,1949 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标志着英国工党政府完全转向以反苏遏制为基调的外交路线,英国也成为冷战初期西方阵营的主要支柱之一。可以说,从 1945 年的对苏合作幻想,到 1949 年北约成立期间的坚决遏制政策,工党政府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外交转型。

要解释工党政府为何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从左翼国际主义到右翼现实主义的外交转向,必须综合考察多个层次的因素。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方法,从个体、国家与国际体系三个角度进行解析。首先,在个体层面,外交大臣贝文的个人认知与领导作用至关重要。作为资深工会领袖出身的政治家,贝文对苏联意图持有深刻怀疑,他坚信只有通过坚定抵抗才能维护欧洲自由国家的独立性。贝文不仅在政策制定中展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而且能够有效整合工党内部不同派系,压制党内左翼的反对声音,确保政府外交路线的统一。其次,在国家层面,工党的自我定位和身份转型需求成为重要推动力量。1945 年大选中工党以全民政党的新形象取得胜利,但要维持这种合法性,就必须在外交上摆脱单一阶级政党的印象,展现国家责任感。尤其在面对苏联扩张威胁、东欧局势恶化以及国内对安全与繁荣的高度关切时,工党政府不得不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不仅能治理国家内部事务,也能在国际舞台上坚定维护英国利益。对外强硬,事实上成为工党巩固执政地位、消除红色嫌疑、完成从工人阶级代言人向国家领导者转型的重要手段。同时,从政党本身来看,工党战后初期“内阁集权—议会党团主导”的党内结构安排,使得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决策权利集中在核心领导层,尤其是在贝文等主导人物手中。这一制度性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党内左翼与群众派对外交政策的制衡能力,为贝文所主导的现实主义外交策略扫清了障碍。最后,在国际体系层面,

全球力量格局的变化对英国决策形成了巨大外部压力。二战结束后，美国与苏联迅速确立为两大超级大国，传统的欧洲平衡体系瓦解。英国在战争中损失惨重，经济困顿，国力衰退，已无力独自维持全球帝国地位。因此，转向依靠美国，通过西方集体安全体系来对抗苏联扩张，成为英国不可避免的战略选择。工党政府在这一背景下，顺应国际体系变化，主动调整外交定位，不仅是对外部结构性压力的回应，也是对国内生存压力的理性适应。

综上所述，工党在 1945 年至 1949 年期间对外政策的转向，是在国内政治合法性塑造、国际安全威胁应对与国家利益再定义三重逻辑共同作用下完成的。它不仅体现了一个政党在从体制外野力量走向国家权力中心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身份调整，也揭示了战后初期英国在失衡的国际体系中重新定位自身角色的历史轨迹。通过对工党转型逻辑与外交实践的剖析，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冷战初期英美同盟体系的建构过程，以及英国政党政治与对外战略选择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

仅供学习和交流

参考文献

一、原始档案

(一) 英国议会辩论记录

- [1] House of Commons Hansard, Commons Sitting of Thursday, 16th November, 1939, Volume 353.
- [2] House of Commons Hansard, Commons Sitting of Thursday, 22nd November, 1945, Volume 416.
- [3] House of Commons Hansard, Commons Sitting of Friday, 23rd November, 1945, Volume 416.
- [4] House of Commons Hansard, Commons Sitting of Monday, 18th November, 1946, Volume 430.

(二) 英国海外政策文件 (DBPO)

- [1] Record of thirteenth plenary meeting held at Cecilienhof, Potsdam, on Wednesday, 1 August 1945 at 10.30 p.m. London: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 [2] Record of eleventh meeting of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 held at Lancaster House, London, on Wednesday, 19 September 1945, at 11 a.m., London: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 [3] Record of thirteenth meeting of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 held at Lancaster House, London, on Thursday, 20 September 1945, at 11 a.m., London: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 [4] British record of twentieth meeting of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 held at Lancaster House, London, on Tuesday, 25 September 1945, at 11 a.m., London: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 [5] Bevin, E., Memorandum by Mr. Bevin on the foreign situation, Ser.1, Vol.3, 1945, London: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 [6] Bevin, E., To Lord Inverchapel, Washington tel., No.1634, 1947, London: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 [7] Bevin, E., Mr. Bevin secretary of state, No. 89 European Reconstruc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fer: report on the Secretary of State's visit to Paris on 17-19, June 1947, London: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 [8] Bevin, E., Memorandum by Mr. Bevin for the cabinet of the first aim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4 January 1948, London: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 [9] Marshall, G. C., Extract from Speech by Mr. Marshall, 1947, London: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 [10]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Ser. 1, Vol. 10, London: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 [11] Keynes, "Our Overseas Financial Prospects", Note by Mr. Dalton, Ser. 1, Vol. 3, Aug 14, 1945, London: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三) 英国工党竞选宣言及年会记录

- [1] Dale, Iain, ed., *Labour Party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s: 1900-1997*,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2] Labour Party (Great Britain), Conference, *Report of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Labour Party*, London: The Party, 1906-1989.

二、中文文献

(一) 译著

- [1] [德]马克思·比尔：《英国社会主义史》（下卷），何新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
- [2] [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 [3] [苏联]弗·格·特鲁汉诺夫斯基：《英国现代史》，秦衡允、秦士醒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 1979 年版。
- [4] [英]贝弗里奇：《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组织翻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8 年版。
- [5] [英]比尔·考克瑟等：《当代英国政治》，孔新峰、蒋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 [6] [英]C. R. 艾德礼：《工党的展望》，吴德芬、赵鸣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
- [7] [英]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江南造船厂业余学校英语翻译小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二) 著作

- [1] 刘成：《理想与现实——英国工党与公有制》，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 [2] 倪学德：《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对外政策的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 [3]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年版。
- [4] 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
- [5] 张志洲：《英国工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迁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三) 中文期刊

- [1] 白建才、田华：《二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冷战史的研究》，《世界历史》，1999 年第 2 期，第 82-89 页。
- [2] 白建才：《论冷战的起源》，《陕西师大学报》，1995 年第 4 期，第 35-42 页。
- [3] 邓峰：《冷战起源研究的国际渊流与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12 年第 12 期，第 86-94 页。
- [4] 黄亚红：《试论英国冷战政策的形成（1944-1946）》，《世界历史》，1996 年第 3 期，第 34-41 页。
- [5] 姬文刚：《中东欧左翼政党发展 30 年：回顾与展望》，《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 年第 6 期，第 109-114 页。
- [6] 梁振丽、周海芳：《美苏文化差异对冷战起源的影响》，《知识经济》，2010 年第 13 期，第 92 页。
- [7] 刘成：《英国工党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和变化的原因》，《欧洲》，2002 年第 2 期，第 31-36 页。
- [8] 刘建飞：《从战后初期英国工党的对苏政策看冷战的起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8 年第 1 期，第 2-9 页。
- [9] 沈志华：《“无条件援助”：租借与战时美苏经济关系——关于美苏冷战起源的经济因素（讨论之三）》，《清华大学学报》，2021 年第 5 期，第 1-59 页。
- [10] 沈志华：《美国对苏贷款问题历史考察（1943-1946——关于美苏经济冷战起源的研究（之一）》，《俄罗斯研究》，2019 年第 6 期，第 31-59 页。
- [11] 沈志华：《铁幕落下：马歇尔计划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关于美苏冷战起源的经济因素（讨论之七）》，《俄罗斯研究》，2022 年第 4 期，第 3-47 页。
- [12] 滕淑娜：《试论二战后艾德礼工党政府的对美外交与“冷战”的起源》，《聊城大学学报》，2007 年底 4 期，第 42-47 页。
- [13] 叶江：《战后英国工党政府与冷战起源（1945-1948）》，《史林》，1991 年第 1 期，第 66-72 页。

三、外文文献

(一) 英文著作

- [1] Addison, Paul, *The Road to 1945: British Politics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Pimlico, 1994.
- [2] Anderson, Terry H., *The United States, Great Britain, and the Cold War:1944-1947*, Columbia & Lond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81.
- [3] Barclay, Roderick, *Ernest Bevin and the Foreign Office 1932-1969*, London: Butler & Tanner Ltd, 1975.
- [4] Brivati, Brian and Heffernan, Richard, *The Labour Party: a centenary history*, England: Macmillan Press Ltd, 2000.
- [5] Brooke, Stephen, *Labour's War: The Labour Part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6] Bullock, Alan, *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 London: Rowland Phototypesetting Ltd, 1983.
- [7] Bullock, Alan, *The Life and Times of Ernest Bevin: Minister of Labour 1940-1945(Volume 2)*,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67.
- [8] Callaghan, John, *The Labour Party and Foreign Policy: A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2007.
- [9] Cliff, Tony and Gluckstein, Donny, *The Labour Party: A Marxist history*, London: Bookmarks Publications, 1996.
- [10] Cole, G. D. H.,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Working Class Movement 1789-1947*,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48.
- [11] Davis, Jonathan, "Labour's political thought: the Soviet influence in the inter-war years," in Paul Corthorn and Jonathan Davis, eds.,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and the Wider World: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London: I.B. Tauris, 2008.
- [12] Djilas, Milovan, *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 trans. Michael B. Petrovich,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62.
- [13] Foote, Geoffrey, *The Labour Party's Political Thought*, UK: Palgrave Publishers Ltd, 1997
- [14] Francis, Williams, *Fifty years' march*, London: Odhams Press, 1949.
- [15] Gordon, Michael. R., *Conflict and Consensus in Labour's Foreign Polic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 [16] Henderson, Arthur, *Labour's way to peace*,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35.

- [17] Jones, Bill, *The Russia complex: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and the Soviet Un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7.
- [18] Jones, Tudor, *Remaking the Labour Party*, London: Routledge, 1996.
- [19] Leffler, Melvyn P., *Odd Arne Westa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ume I, Origi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20] Leventhal, F. M. *Arthur Henders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9.
- [21] Louis, William Roger,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1945-195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22] Lyman, Richard W., *The First Labour Government: 1924*, London: Chapman & Hall, 1957.
- [23] Mackintosh, John P., *the British Cabinet*, London: Stevens & Sons Ltd., 1968.
- [24] Mckenzie, R. T., *British Political Parties*, UK: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1963.
- [25] Miller, Kenneth E., *Soci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in Britain to 1931*,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1967.
- [26] Morgan, Kenneth O., *Labour in Power: 1945-195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27] Pimlott, Ben, *Hugh Dalton*, London: Jonathan Cape Ltd, 1985.
- [28] Thorpe, Andrew, *A History of British Labour Part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 [29] Thorpe, Andrew, *Britain in the 1930s: the Deceptive Decad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 [30] Vickers, Rhiannon, *The Labour Party and the world, volume 1 (The Evolution of Labour's Foreign Policy, 1900-51)*,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 [31] Wertheimer, E., *Portrait of the Labour Party*, London: Putnam, 1929, p.50.
- [32] Wevill, Richard Q., *Britain and America After World War II: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Cold War*, London: I.B. Tauris, 2012.
- [33] Williams, Andrew J., *Labour and Russia*,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9.
- [34] Williams, Francis, *Ernest Bevin: Portrait of A Great Englishman*, London: Hutchinson, 1952.
- [35] Wood, Neal, *Communism and British Intellectua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二) 英文期刊

- [1] Abdul Rahman, Zulkanain, et al., eds., "Brita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Iranian Crisis of 1946," *Middle-East Journal of Scientific Research*, Vol.18, 2013.

- [2] Ashworth, Lucian M., "Rethinking a Socialist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No.75, Spring 2009.
- [3] Fielding, Steven, "What Did 'The People' Want? : The Meaning of the 1945 General Election,"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35, No.3, 1992.
- [4] Frazier, Robert, "Did Britain Start the Cold War? Bevin and the Truman Doctrine,"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27, No.3, 1984.
- [5] Liepmann, Kaethe K., "English Housing Policy Since the War,"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27, No.3, 1937.
- [6] Loewenberg, Gerhard,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Labour Part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52, No.3, 1958.
- [7] Melissen, Jan, and Zeeman Bert, "Britain and Western Europe, 1945-51: Opportunities Lost?"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3, No.1, Winter, 1986-1987.
- [8] Newsinger, John, "War, Empire and the Attlee government 1945-1951," *Race & Class*, Vol. 60, No.1, 2018.
- [9] Robert, Geoffrey, "Moscow's Cold War on the Periphery: Soviet Policy in Greece, Iran, and Turkey, 1943-8,"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January 2011, Vol.46, No.1.
- [10] Ryan, Henry B., "A New Look at Churchill's 'Iron Curtain' Speech,"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22, No.4, 1979.
- [11] Schlesinger, Arthur,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Foreign Affairs*, Vol.46, No.1, 1967.
- [12] Shlaim, Avi, "Britain, the Berlin Blockade and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0, No.1, Winter, 1983-1984.
- [13] Smith, Raymond, and Zametica, John, "The Cold Warrior: Clement Attlee Reconsidere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1, No.2, 1985.
- [14] Sylvest, Casper, "Interwar Internationalism,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and the Histori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8, No.2, 2004.
- [15] Ward, Jack Grimley, "Bolshevik bogies: red scares in Britain, 1919-24," *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y*, Vol.38, No.1, 2024.
- [16] Weiler, Peter, "British Labour and the Cold War: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Labour Governments, 1945-1951,"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26, No.1, 1987.
- [17] Winkler, H. R., "The Emergence of a Labor Foreign Policy in Great Britain, 1918-1929,"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28, No.3, 1956.

四、网络资料

- [1] Erica Peacock, “One man’s vision: Ernest Bevin and the creation of NA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4 April 2019, <https://blog.nationalarchives.gov.uk/one-mans-vision-ernest-bevin-creation-nato/>.
- [2] NATO, “Collective defence and Article 5,”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topics_110496.htm.

仅供学习和交流

致谢

时间真的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就这样到了要写致谢的时刻了。明明在此之前的每一个毕业季我都有悄悄想过自己以后要写什么，但是真的到了这一刻，对于这四年的时光我却是写写删删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戴锦华老师曾经在一个播客节目上说过这样一句话：“生命这本账，最终会被平掉。”或许的确是这样，现在回头去看自己在北大的这四年，有焦虑、内耗、自我否定、偷偷抹眼泪的日子，也有很多个幸福、明媚、为自己骄傲的瞬间。时间就是如此残酷又仁慈，现在的我会觉得曾经那些不能接受的、感到痛苦的所谓的“失”，已经慢慢转换成了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得”。

最想感谢的人是裴巧玲女士，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最棒的妈妈。谢谢你成为我的妈妈，一直陪伴着我，你不懂什么是女性主义、什么是托举，但是你给了我特别特别多的爱，永远支持我的每一个决定，永远无条件的相信我。我时常会感慨我竟然如此幸运能有一个这么棒的妈妈！所以，请不要轻易否定自己的价值，你在我心中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女人！也要感谢我的爸爸和妹妹，谢谢你们成为我的家人、永远在我的身后！

也感谢我所有的好朋友们！感谢我的“引导型朋友”李心悦，谢谢你愿意接住我的所有情绪，总是会纠正我下意识说出口的否定自己的话，我大学四年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决定好像都有和你说，谢谢你一直都在！感谢提提、洁子、曼的陪伴，和你们一起玩耍的日子很幸福！感谢萱萱、蔡蔡和赵姐，一起吃海底捞和各种香香饭的日子也很美好！感谢美丽的怡宝，谢谢你成为我的舍友、我的朋友，和你一起在宿舍聊天、一起拍照、一起吃饭的日子我都会很想念！

感谢我的导师梅然老师！从选题到写作大纲，再到后续的初稿修改，您的耐心指导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在这个过程中，我收获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也感谢您精彩的课堂，《英国政治、经济与外交》与《国际战略分析》课程上，您的风趣幽默和博学广识，让我受益匪浅，不仅学到了许多专业知识，您热爱生活的乐观心态也感染到了我。

也感谢北京大学！虽然我真的很讨厌北京的天气，很讨厌在这里读书不得不承受的 peer pressure，但我也很感谢北京大学给予我的某些无形的东西！还有，在这里我真的有遇见好多好多很棒的老师！

最后也感谢一下自己吧！在家人和朋友的爱中，慢慢开始学会发现自己、感受这个世界，

开始勇敢地去尝试健身、跳 hip-hop、到处旅行，去做一些大胆的决定。慢慢地褪去了怯懦和自卑，成长为一个勇敢且自信的小大人。我现在也开始学着对自己满意，学着在拥有苹果的时候只在意苹果，学着感受一生仅一次的当下！

那就先写到这里吧！最后最后借用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来献给我这乱七八糟但也色彩斑斓的本科四年：

“어쩌다 보니 처음으로 마주하는 오늘이라서, 사무치게 아픈 말 한마디에 내가 더 싫어도, 신경 쓰지 말자, 우리 목소리로 어디서라도 부르자 청춘찬가”

“始料未及间初次直面的今天，尽管因为一句伤人的恶语而更讨厌自己，但不用在意，就让我们随处唱响这首青春赞歌吧！”

2025 年 5 月 13 日

北京大学

仅供学习和交流

北京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说明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或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论文查重网站：中国知网

论文查重率：2.2%

论文作者签名：

代娜

日期：2025 年 5 月 14 日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北京大学关于收集、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

- 按照学校要求提交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本；
- 学校有权保存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并提供目录检索与阅览服务，在校园网上提供服务；
- 学校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数字化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论文；

论文作者签名：

代娜

导师签名：

梅

日期：2025 年 5 月 14 日